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接軌國際的幻象:藉布赫迪厄共謀觀點 探討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動機」

The Cosmopolitan Illusio;
or, Why Are We Having an Exchange Study
Through a Loan?

指導教授:劉慧雯 博士

研究生:傅 威 撰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五月

這是一篇從自我除魅的嘗試中誕生的研究。

首先要感謝擔任指導教授劉慧雯老師,這不是基於以退為進的心態而說,我確實認為自己相當拖宕,也真的是需要花費心力督導的學生。從能否完成一篇論文的自我懷疑到確實完稿,我很感謝老師願意一步一步地陪我走完,且在適當地敦促下賦予我很大的揮灑空間。擔任口試委員的方念萱老師同樣助我良多,可以說是老師在碩一、碩二的幾門課,讓自己勉勉強強地能夠成為一名適格的碩士生。老師給我的許多觀念——特別是如何建立問題意識——幾乎奠定了我的學術思維。還要感謝同是口試委員的羅世宏老師,自大學便受教於老師,如今能在碩士的最後再次受指教,著實令人開心。另外,也希望能感謝交通大學的邱德亮老師,讓我擁有了布赫迪厄方法論最基本卻也最詳盡的認識,這是完成這篇論文的重要基礎。

這篇論文的起點有二,一是即將到來的開頭處提及的韓國瑜先生。正如毛澤東所說,「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韓先生的出現實有這種社會寫實主義作品的意義,十分感謝他能替我編織出如此完整的社會背景。另外,在研究所以前的數年大學光陰,是讓我從自身經驗構築出問題意識的濫觴,十分感謝林冠君陪我走過的那段日子,是他讓我看見了糾纏如毛線球般的幻象的線頭。

在研究所能遇到這麼多好友是我無法想像的,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什麼都能聊的王弦穩、體貼內涵兼具的潘雪、最好笑的張怡瑩,很遺憾不能跟你們相處更久。碩班第一個異男友陳尚君,真的有著崇拜之情的學長王悅,最佳音樂摯交杜俞蓁,幫過太多次數都數不清的龎袿方,沒有留我自己寫論文哭出來的曾怡凡,還有我的best-cool-kid BFF 黃珮蓁,你們都構成了本文的每一個字。當然還有,從學弟升級成學弟、雖然無緣一同體驗校園生活的尤显程尤哥。另外還要感謝來自瑞士巴塞爾的 Rita,Lin 他總是在午夜文思枯竭時,給出令人文思泉湧的提點。

作為一篇緊貼生活經驗的論文,學術場域外的助力也都應當納入謝辭中。為我帶來閒情生活的黃致誥、陳韋勳、黃筱媛、李佩欣,以及巴黎吳倧綸;包容我、教導我各種專業實務的 Jill、Jess 和 Vinci;讓我在異鄉體驗生活之甜蜜的張裝稅;在生活中能讓我隨時見到的在地人群:廖書逸、林齊品、童大維,還有黃紘志;以及,在其中完成論文大半的圈外咖啡與抹 More (特別是協助張羅口試用品的店長傅友)。飲水思源,沒有文中八位受訪者,不可能誕生出這篇論文,誠摯地感謝他們的參與!

必須要額外說,交通大學的陳韋勳是民間友人中提供最多學術幫助的一位,能和 他在同一個學期畢業我深感榮幸。我真心地將本作視為其畢業論文言說的另一種表現 形式¹。學術上,紀傑克、羅蘭巴特、阿圖塞這些學術界 meme 也都是我誠摯感謝的對 象,他們都是最棒的 gateway drug! (布赫迪厄自不在話下)

儘管作為一篇試圖解構場域象徵性的研究,但回到日常生活中,家庭的經濟條件對比自身投入文化場域的程度,始終令我慚愧萬分。我難以完整表達自身如何感謝家人的支持——無論是花費那麼長的時間在一篇碩士論文上,或所費不貲地前往海外交換。我確實是依賴爸爸、媽媽以及哥哥一家人的供養,才能完成這篇論文,這篇論文在所有意義上都是屬於他們的。最後的最後,葉雅婷親眼目睹並陪伴了論文本文的產出,我也希望能將論文獻給他。

在最後以後,儘管長於兩頁的謝辭總令人皺眉,但在謝辭這塊唯一能免除學術語言的空間,我仍希望以日常生活語言簡述這項研究。整體來說,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終極目標,是一套反正我很閒意義上的「反基因方程式」²。而對此,紀傑克說過的一則 笑話,最能總括這樣的努力:

·····數十年來,為了呈現出大寫他者 (the Other) 所知 (knowledge) 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拉岡派門徒間流傳著一個相當經典的笑話:有個認為自己是粒稻

陳韋勳(2021)。《國家/文化生產》:臺灣公共電視《通靈少女》之案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

² 反正我很閒(2020)。【七宗罪-暴食】抑制貪吃的慾望!解析人類的貪吃現象!不餓還是嘴 嚵!無法控制的食慾!【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33y-sqVss

殼的男人被送進精神病院,那兒的醫師們費盡心思,試著讓他知道他不是粒稻殼而是個人;不料,正當他痊癒(開始相信他確實是人不是稻殼)並獲准離開醫院,卻沒兩下就回來了,顫抖並害怕著——因為外頭有隻雞,他深怕被那隻雞當飼料吃了。「親愛的」醫師向他說,「你不是已經明白你不是稻殼而是個人了嗎?」「我當然知道」患者回應醫師,「但那隻雞可知道?」

精神分析療法的真正重點便隱含於此:單單向患者說清其徵候的無意識 真相是不夠的;無意識本身亦然必須被說服而承認這個真相。針對商品拜物 教提出的馬克思理論亦然:我們都可以想像一個布爾喬雅主體,參與一門能 受知有關商品拜物教的馬克思主義課程。在那門課程後,他跑回來找他的老 師,埋怨說他依然是商品拜物教下的受害者。老師會跟他說:「可是你不是 已經知道事物成立的本質了,已經知道商品們僅僅只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形 式,已經知道他們之中沒有任何巫術!」對此,那名門生會回應道:「這些 我當然都知道,但我所面對的那些商品們看起來還不知道這些啊!」這也就 是拉岡在他的主張中所欲表達的,唯物論的真正方法並非「上帝並不存在 (God doesn't exist)」,而是「上帝即是無意識/上帝是無意識的 (God is unconscious)」。3

_

³ Pp. 67-68. Žižek, S. and Momus. (2014). *Žiž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 (A. Mortensen,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摘 要

全球化發展令人們越來越重視參與國際事務的視野與能力,起碼對國人來說,「跟國際接軌」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想望與焦慮。本研究關注的便是這樣一種現象——或曰,這樣一種對「接軌國際」的趨之若鶩——從何而來,目的又在於將人們帶往何處(是帶領個體走向成功的投資,社會責任對個體的勒索,或純粹是個體的自我實現)。本研究選擇關注其中一種相對特定的實踐形式:貸款出國當交換學生。這樣的手段同時帶有經濟上的投資期待,卻又在缺乏穩定人力資本回報上,帶有純粹追求自我實現的意義。

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訪問八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探究形塑其等赴外理想的過往背景,以及遠赴他國的實際心路歷程。藉由布赫迪厄的生成性結構主義思維,及其場域—資本—慣習三位一體的解析方式,本研究欲理解實踐方式如何萌生於生命歷程,並瞭解這實際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社會意義。

研究發現,自幼浸淫於文化場域內無所不在的世界主義思維,實為「接軌國際」信念普遍存在於大眾心中的主要原因。其次,作為一種世界主義素養的追求,「接軌國際」實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追求,故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投資。然而,正因世界主義素養是為一種文化資本,並在社會上廣泛受到接納,這種特殊資本實有點石成金,換取經濟資本的能力。

關鍵字:文化資本、世界主義、交換學生、社會軌跡、結構與能動性

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the 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 others and navigate through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s is now without a doubt. And, the desire and anxiety of "becoming cosmopolitan" are – here in Taiwan at least – all-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This very phenomenon is the major concern of this thesis in which we explore what it brings on to us – be it an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social success,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just an actualization of one's aspiration to become a better self? We pay attention to a specific kind of cosmopolitan practice, "having an exchange study through a loan," as it signifies an economic expect of return – which is the nature of loaning – and the pure pursuit of self-actualization – as it lacks a stable human capital return rate - at the same time.

To this end,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8 then-students having their exchange study through a loan. We focus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drove each of their decision to go abroad and the stories of what was happening during their times away.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ierre Bourdieu, we examine how their aspiration of cosmopolitanism has been shaped through each of their social trajectories, and what are the social effects on them of what they have done.

In lieu of a conclusion,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omnipresent nature of cosmopolitanism within cultural fields is the reason why "becoming cosmopolitan" a desirable goal for the majority. And, we found that venturing on cosmopolitanism disposition is itself economical of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logic – rather than a traditional logic of economics kind.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cosmopolitanism disposition as cultural capital is widely recognized locally and globally, we believe the acquisition of it does make some hard money afterwards.

Keywords: cosmopolitanism, cultural capital, exchange study, social trajectory, structure and agency

目 次

第	壹	章	緒	革論	1
	前	言.	••••		1
	第	一 í	節	研究背景	4
	第	二	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14
第	貮	章	Š	文獻探討暨研究方法	18
	第	— í	節	接軌國際與世界主義觀點	18
	第	二旬	節	遊戲與利害的構成	29
	第	三角	節	佔位—策略的生成:如何對實踐進行分析	44
	第	四旬	節	研究方法	52
第	參	章	被	b輕忽的巧合:隱性共謀的基礎	58
	第	— í	節	潛在的同形對應關係	58
	第	二旬	節	步入幻象的足跡:社會軌跡的研究	64
					84
	第	一 í	節	實踐的生成本身	84
				佔位的後續效果	91
第	伍	章	結	5論	94
	第	一 í	節	研究發現	95
	第	二自	節	研究意涵	98
	第	三旬	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109
參	考	文届	騃.		112
附	錄	訪	該	&大綱設計	121

表次

表 1-1:教育部為學生規劃接軌國際的藍圖6
表 2-1:107 學年度全學年赴外交流前十大目的國26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57
表 4-1: 受訪者資本配置概覽61
圖 次 圖 4-1:親職場域圖繪及四種教養傾向腳本

第壹章 緒論

在這樣的情境裡,消費 [consumption] 可以說是傳播過程的一個階段 ——也就是破譯和解碼的作為。而這兩者都要求對於一套暗號或是符碼,有直覺或明白的掌握。(Bourdieu, 1979/1984, p. 2)

——皮耶·布赫迪厄《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我們是如何在不同的可能之中做選擇的?譬如說,為什麼買這一樣商品而不是那一樣?我們的判斷力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們又在選擇中看到了什麼樣的期待?

前言

(一)「勇敢地出走」就是你的超能力

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是毋庸置疑的人生進路?一直以來,我們會說教育是 翻轉人生的最佳機會;而在今天相似的看法是,似乎越是讓自己國際化,成功 就靠得越近。

體現出這種思維的最好例子,或許是「我們的孩子一定要跟國際接軌」(魏家良、唐鎮宇,2019年10月26日)這句話。此話典出時任高雄市長暨2020總統大選參選人韓國瑜,是他重要的競選政見之一:他主張大專院校學生每人都應該有一次一年出國交換的機會,由政府來負擔費用。因為他認為在現在這個時代,不能「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裡,不去往外看」(同上引),因此要透過政府輔助的交換計畫,讓每一位學生都能「走出去」,這樣才能跟國際接軌,才是台灣年輕人最好的歸宿。

誠然,努力地做到接軌國際,不僅符合全球來往越發密切的時代背景,也 承諾著更多的發展機會。畢竟世界無限寬廣,如果始終劃地自限、只看向周遭 的人事物,那麼損失的就是在彼方的無限發展可能。像是一篇刊載在天下雜誌 旗下、以青年國際觀點為主軸的雜誌《換日線》中,以交換學生經驗為主軸的分享就提到:

全球化的時代早已來臨,臺灣身處於四面環海的島嶼,缺乏對外交流而封閉。歐美國家有所謂的「Gap Year」,即學生在課間放自己一年的假期,出國進修、非學術相關課程以及背包客旅遊,可以理解是為將來進入社會而準備。可是亞洲地區呢?臺灣呢?我認為「勇敢地出走」就是一個最好的學習途徑,無論是赴外交換、出國遊學或是國際志工等等。(陳亭羽,2015 年 11 月 5 日)

的確,我們都該「勇敢地出走」,畢竟它要求的只是勇敢、包容與接納等等心態,不像升學考試一般,考驗著個人間差異化的能力。只要「勇敢」就沒有藉口,人人都可以一步一腳印地去追求。

而另一篇刊載在遊學機構部落格的文章,則更直白地點出這樣的趨勢:

外國大學很重視能夠走出自己舒適圈的學生,而國際學校經歷是走出 舒適圈的最好證明。他們有能力能夠進入更廣闊的世界,相較於其他 同儕也[sic],他們擁有能夠探索並接受新想法。(Clayton,無日期)

這樣看來,願意走出舒適圈本身,就象徵著一種更出眾的個人特質。而這樣一種可以說是揉合了大膽以及高瞻遠矚的特質,就是**一種能力、一種求之不得的競爭力**。它可以帶著你飛得更高、走得更遠,更可以預期將帶給你各種不同的精彩體驗,還有: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

(二)「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既然它可以被化作選舉政見,也表示不少人都看見也能理解這樣的趨勢, 但我們唯一欠缺的只有勇氣嗎?事實上,既然能夠當作選舉支票,就意味著以 出國交換為例的接軌國際並非毫無物質上的成本。針對韓國瑜的政見,一間留遊學中心便在訪問中舉例說,「因國內各校與國外學校合作方式不同,〔出國交換的成本〕一學期介於30萬到60萬元不等。」(魏家良、王煌忠,2019年10月26日)如是,除了走出舒適圈的勇氣之外,願意投下資本的勇氣在此也是無比重要。

除此之外,所謂接軌國際作為一種課堂以外的學習,它其實有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在。在鼓勵大家勇敢地出走的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認識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陳亭羽,2015年11月5日)。確實,無論是與異邦他者的相處方式、各式各樣幽微的國際禮節或風俗民情,本非刻意為之可以促成的,往往是在實際的生活體驗當中潛移默化而得一一而這畢竟也本是各個學校推動赴外交換制度的理由。然而正因如此,真的只要「走出去」就能接軌國際嗎?會不會只是白白「出去走一遭」而已呢?

誠如社會學家鮑曼 (Zygmunt Bauman) 在談及全球化時代裡,這個充滿著無限可能的現代社會時說到的:「我們在生命中都註定要去選擇,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有做選擇的工具。」(Bauman, 1998/張君玫譯, 2001, 頁 107) 更直白地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是否投下 99%的努力,但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擁有邁向成功的那 1%不在人為的條件。

(三)研究動機:如何理解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抱負

質言之,「越是讓自己國際化,成功就靠得越近」這樣的邏輯,以交換學生 為例,似乎不是那麼無往不利。

但回過頭來,除了這樣的想法隨處可見,這樣的實踐也並非無處可見。當 然,對於有餘裕的學生來說,赴外交換學習可以是純粹的休閒;但實際上不外 乎有貸下學生貸款,「勇敢投下資本」義無反顧地選擇逐夢的學生,筆者自身也 是一員⁴。這些學生們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得要申請十數萬的學生貸款才得以成行,此後數年也都將因此在債償中度過。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狀況下,是什麼讓我們仍願意相信接軌國際等於成功這樣的邏輯,而背債出國呢?

不禁令人好奇的是,在背後推波助瀾的,是說來有點捉摸不定的競爭力嗎?又或是,是為了勇敢出走後等待著自己的無限可能嗎?或說應該問的是: 我們是被動地受到這些成功論述的「招喚」,或是這每一個出走的案例其實都是學生們充滿個人色彩的選擇?

從顯明的潛在動機、誘因、推拉力等等因素,一直到實際行動出國甚至歸國,其間似乎有著貌似不言自明卻未被細思的**斷裂**存在。藉由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實際行動及其背景的考察,本研究欲探討實踐生成的客觀原因,並據此瞭解這樣的一種實踐其社會意義為何。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接軌國際的官方論述

(一)接軌國際的承諾

該如何理解「接軌國際」四個字?從「不能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裡,不去往外看」來看,接軌國際所意味的,其實不外乎是努力獲取國際範圍的視野,也就是擁有令大家「又愛又恨的國際觀」⁵。

⁴ 以筆者為例,參與的是由教育部指示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開辦,名叫「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的信貸,目標顧名思義是鼓勵青年人士赴外汲取國際經驗;貸款相當受到青年人士青睞,開辦後每年都吸引百餘名有志者辦理。見 陳國維(2018年1月22日)。〈青年海外專案貸款放寬申貸年齡與額度〉,《中央廣播電台》。取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91438。

⁵ 國際觀一詞長久以來始終有很高的討論熱度,晚近的例子可參見 張翔一(2015 年 12 月 14 日)。〈【讀者告訴我們的事】Crossing 換日線張翔一:讓人又愛又恨的「國際觀」〉,《換日線》。 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488&nid=5896;或其時李家同批評國內年輕人普遍缺乏國際觀而引起的討論,見 朱家安(2016 年 9 月 23 日)。〈李家同啟示:被說沒國際觀該怎麼辦?〉,《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780664。

拿教育部出版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1)來說,作為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的藍圖,其中便清晰地勾勒出了接軌國際的意涵,對於這個概念不失為一個恰當的整梳。以其中的說法來看,接軌國際可以說是一種成為世界公民的理想,而琅琅上口的國際觀則是成為世界公民的條件,這可以在其緒論的說法中發現:「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地球村觀念興起,人們體認到加強國際互動,增進人類福祉,是每個地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同上引,頁2)是此,國際觀不但是認識與瞭解、還包含心靈層面的接受與認同。質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是地球村的住民,而對於服務名為地球的社稷,我們每個人都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存在。也就是說,接軌國際還包含了體認到身為世界公民的身份。

這份白皮書的副標題——「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則回應了國際 化帶來成功的邏輯: 21 世紀的人才要求的條件是擁有世界公民的自覺與涵養。 有關當代理想的國際人才,可以再參考教育部另一份更聚焦中高等教育的文件 《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教育部,2016),其中提到:

世界經貿及企業經營亦趨於全球化,具跨文化能力及願意外派、移動的人……為此,世界各國及國際性企業(組織)莫不積極培育具「全球移動力」之人才。

我國青年學生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更須面對韓國、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等,以及東南亞各國及印度等新興國家之競爭,所以更須具備「全球移動力」,才能因應全球化之趨勢,而有更多發展的選擇與機會,並獲得更優渥的薪資。(同上引,頁1)

而此處所謂「全球移動力」——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與實踐力,不外乎就 是實踐層面上國際觀的具體構面,亦即做好世界公民所應有、面對著世界性的 市場與異邦他者(無異於同胞地)競合的能力。

在這份文件的最後,教育部實際將國際教育的藍圖畫出(見表 1-1)。從中

可以看到一幅接軌國際的路徑圖,也可以看到一步一步地成為世界公民,也正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如果沒有值得懷疑之處,這想必便是鼓舞學生們接軌國際的抱負之所在。

表 1-1:教育部為學生規劃接軌國際的藍圖

對象	圖像
國小	建立世界地圖全貌
國中	認識一位國際朋友
高中職大學	激發國際接觸興趣與勇氣儲備全球移動實力
研究所/教師/青年	成為國際一流人才

註:資料來源中原表格名為「各教育階段學生之圖像」

資料來源:《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頁20),教育部,2016。

(二)承諾中存而不論之處

但就算真的接軌國際了,就代表璀璨的未來了嗎?成為國際一流人才聽來十分吸引人,這建立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全球化的勞動市場會需要更多全球化菁英人才,需要他們發揮綜觀世界的國際視野這樣的背景上。但若參考柯司特(Manuel Castells)針對資訊時代下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狀況的分析所指出的,勞動市場本身未必會跟隨經濟發展一同全盤全球化:

專業勞動有逐漸全球化的過程……任何人能夠在任何市場上,擁有產生額外附加價值的能力,就享有在全球採購,以及待價而沽的機會 (Castells, 2000 /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 2000,頁 137)

.

資本是全球性的,核心的生產網絡也日益全球化,但大多數勞工是地域性的,只有具備策略性重要地位的菁英專業勞動力,才真正是全球化的。(同上引,頁139)

也就是說,勞動市場或許更容易全球化地被接近,但被需要的依然是有策略性重要地位的不同專才——並不是單單抱著接軌國際的理想就會被需要;資本市場在全球性地擴張的同時,一般勞動市場依然是相當地域性的。對照當下,這可以體現在如蘋果 (Apple) 或谷歌 (Google) 這樣的大型跨國企業企業上,體現在他們在各地不斷擴編約聘員工的做法。他們不像本來就以專業技術背景在勞動市場待價而沽的正式員工,並無想像中全球化菁英人才的完善福利,且往往委身於環境惡劣的工作環境,也無法在工作的聘僱上獲得任何長期的承諾6,而這才是勞動市場上被需求的大宗。

另一方面,在教育部提出的接軌國際藍圖(表 1-1)中,也可發現些許未加交代之處。舉例來說,要在國中階段認識一位國際朋友,其實在跨國傳播科技蓬勃發展的當下並不困難,肉身移動所要求、在經濟資本上的差異起碼已經不再那麼顯著,學童們都有機會仰賴科技在虛擬世界裡雲遊四海。然而實際上要達成這樣的願景,無論是要知道哪裡有交友機會(要在哪邊才能認識一位國際朋友?社群網站、交友軟體,或是電子佈告欄?),或是通訊軟硬體的使用,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於正規課程教授的能力。

回應開頭處的引文,實踐本身就是「傳播過程的一個階段」,它要求著對廣義傳播手段的理解與掌握(「一項暗號或是符碼在直覺上或明確地掌握」)。以傳播科技的例子來說,就算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也必須人們擁有相應的能力才能讓傳播開展。但傳播科技的掌握本身,卻也像經濟資本的分配一樣充滿差異:譬如 Jan van Dijk 便指出,將資訊/科技近用能力概念化成一種「資訊資本

7

⁶ 見 Brustein, J. (2019, February 11). What It's Like to Work Inside Apple's 'Black Site'. *Bloomber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2-11/apple-black-site-gives-contractors-few-perks-little-security

(information capital)」⁷,其分配的不均等實是產生「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 的濫觴 (van Dijk, 2005; as cited in Ignatow and Robinson, 2017)。

回到交換學生的場景中,不只虛擬世界要求資訊資本,現在連肉身的移動 也仰賴這樣的能力——無論是鎖定交換的國家,或是獲取安全抵達當地所需要 的資訊,而這同樣是令實踐開展的傳播前提。或許可以說接軌國際的理想,從 出發的起點便因人而有所差異了。傳播/傳播科技的使用能力在此也形成了人 與人之間的「區判 (distinction)」,能夠按部就班地走在接軌國際的藍圖上,首 先就已經預設了一個人擁有的資訊資本。

二、接軌國際的系譜

就像我們已經提到的,接軌國際這樣的現象可以連接到一些當代獨有的背景,有鑒於其試圖——起碼如此宣稱——回應當代的社會—經濟—文化景況 (譬如全球化)。不過另一方面也必須認知到,接軌國際的作為並非橫空出世, 這樣的實踐在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從過去到現在,這樣的概念發生過什麼樣 的流變?它原初的意義為何?

(一)關於博雅的壯遊

壯遊 (grand tour) 或許是最早的一種接軌國際實踐,而由 Richard Lassels 撰寫、在 1670 年出版的《義大利之旅》("An Italian Voyage, or, a complete

⁷ Van Dijk 將其定義為「換取電腦和網路的經濟資源、技術能力、評估能力、尋求資訊的動機,以及能藉其完成任務的整體能力。」(van Dijk, 2005; as cited in Ignatow and Robinson, 2017) 用詞相似但本意不同地,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也指出,他所提出的文化資本概念,可以更精確地被理解為「資訊資本 (informational capital)」(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藉此能更傳神地表達出區隔化源於廣義的資訊近用能力差異。Van Dijk 提出的資訊資本可以被視為專指數位資訊的狹義資訊近用能力,是布赫迪厄資訊資本的次級面向之一,資本的廣狹兩義俟第 2-2-2-2 節說明。

journey through Italy...") 則被認為是現存最早提出此一概念的出處 (Chaney, 1982)。作者 Lassels 是多名英國貴族的家庭老師,有幸與學生同遊義大利數次。他在書中提到,完整地遊歷法國和義大利,是任何一位在人文領域鑽研的嚴肅學子所應完成的。他並誠摯地建議,所有的年輕爵爺 (young lords) 都應加入行列,完成這種他所謂的壯遊,藉以瞭解世界的現況與本質。他指出,這樣的旅程將帶來智識上、社會上、政治上以及道德上的頓悟 (Lassels, 2016)。

Lassels 所描述的這種體驗,通常是年輕貴族完成學業後,在正式進入職場前的最後一場大冒險,也當作是學業的終點。這樣的一種學習,和我們在前一段中討論的方向大相徑庭。因為這種學習從來不是為了未來的具體發展,或什麼樣的投資回報,他純粹就像我們最初看到的接軌國際說法一樣,僅僅講求生活在其中,並孜孜不倦地獲取體驗。簡單來說,這是一種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它講究的是純粹的通識學習,而非哪一種特定、能直接轉化成勞動力的專業技能。就像一些藝術品為了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一般,這種學習追求的是一種「無目的的目的性(finality without an end)」,是為了學習而學習。不像全球移動力的說法一般需要講求務實、要切分成幾個實用的面向,它追求的純粹是形而上的頓悟。

但在此一個顯而易見的因果關係是,這種不追求回報且純粹看向形上價值 的實踐,有能力實行者確實非富即貴,遠非一般市井小民可以妄想的。那前現 代的壯遊是如何成為現代的接軌國際實踐呢?

(二)空檔年與當代壯遊

這樣的改變或許是一點一滴地發生,但起碼用一種較粗略的時間區隔來 看,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確實存在較大的社會環境差異,並足以為壯遊的內涵帶 來轉變。這使得現代壯遊一部分延續過往概念,另有一部分的全新意涵。

壯遊概念延續至當代,大致轉化成了我們認知中的空檔年 (gap year)。當代空檔年概念,普遍被認為起源於 1960 年代的英國,在文化上是古時壯遊實踐與

當時嬉皮想法的雜交之物,另也因為戰後往來各地日趨容易,使得這樣的實踐 擴及更多不同的社會群體 (Heath, 2007)。在嬉皮的實踐中,主要意義是踏上不 同的文化地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換彼此認識與想法,其中也帶有嬉皮式 的和平思想:希望以這樣的文化交流來避免未來再有戰事發生。

隨著時間更進一步地推展,這樣的實踐想像也逐漸在主流甚至是官方論述中蔓延開來,並開始擁有更多具體的實踐內涵⁸。一方面是在原始空檔年發展下,不同為了各國青年相互交流互助而來的組織,逐漸轉變為具有商業意義的空檔年產業,開始供應便於參與的套裝體驗行程。另一方面,打工度假形式的空檔年也開始出現在各國政府的政策規劃當中一一無論是鼓勵國民出走或友邦民眾來訪。除此之外,本研究欲探討的交換學生計畫,一部份也是源自於從壯遊到空檔年這樣的思想,在上個世紀的中後開始蓬勃發展。例如我國教育部交換學生計畫積極參考的對象,歐洲伊拉斯謨計畫 (Erasmus programme) 便是一例。該計畫名稱來自於一名有名的中世紀壯遊者,其一脈相承可見一斑⁹。

(三) 壯遊作為文化商品

然而,和這些轉變同時發生的,是壯遊體驗在當代的「文化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我們可以發現,某些接軌國際的實踐,似乎無異於花錢購買一種獨特的享受,彷彿品飲稀世美酒紅酒一般。誠如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所指出的:

如果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構成了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那麼還有什麼領域,可以比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和實踐,以及特殊環境品質(當然包括了營造、社會和文化環境),更適合提出這類宣

⁸ 有關以下所及,打工度假與交換學生計畫的發展,請同見《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 (教育部,2016)

⁹ Erasmus 交換學生計畫及其空檔年意涵可見 Kotkievicz, G., Keshelashvili, S. (2021, May 20). Why are gap years "a thing"?. ESN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esn.org/gap-year

稱呢?(王志弘譯,2003)

的確,以上體驗在今日都一個個被包裝成商品擺到架上了。一來,隨著空檔年實踐越來越有其固定形式後,便出現越來越多將空檔年體驗作為商品販售的公司:譬如說遊學團的出現,便是將「旅遊作為教育(travel as education)」變成「教育套裝行程(educational travel tour)」的一種倒轉。另外,研究者也指出,今日不少中產階級學生旅遊者,依然青睞往日的特定嬉皮征途(the hippy trail),他們會試著享受過往的那種雲遊奇遇刺激,但卻是在一種遠離危險——便也喪失了一部分傳統精神——的狀態下,透過消費旅遊商品的方式來進行(Cohen, 2003)。而僅管交換學生計畫看似不涉及商業行為,但在彼岸的體驗實難逃旅遊商品的魔掌,違論晚近教育商品化理解本身就能否定這種想像。

壯遊體驗的商品化是一個有點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壯遊體驗在過往,原來就是貴族或是少數有經濟條件的反文化嬉皮才能實踐的,是一種小眾而獨特的活動,且價值從來不在於某種經濟利益。然而卻也得益於這種獨特性,令其高度易於商品化,稍加包裝便能放入市場。更重要的是,作為商品也代表著它的消費性:隨著客觀條件改變,越來越多人有機會體驗這種過去只屬於少數人的活動,然而其要求經濟能力這點卻一點都沒有改變。

商品化現象或許指明了一些事實,卻也令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作為世 代現象,這或許可以是有閒階級的消費樣態,是中產階級的品味模仿,但這樣 一種有著交換價值但缺乏使用價值的奢侈品,為什麼會引人貸款購入呢?

三、抱負如何被合理化:以打工度假為例

回過頭來,令赴外交換學生願意投下資本的抱負,其成立僅僅在於對成功 論述的篤信嗎?又或是僅僅是一種陷於消費主義中的非理行為呢?或許可以參 照過往對打工度假者的討論來當作例子。雖然無論實踐內容本身或象徵意義 上,貸款赴外交換和打工度假兩者並非別無二致;然而,在經濟限制以及對國 際視野的追求上,確實有著相似的景況,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參考。

打工度假涉及兩國的簽證協議,同樣可說是政府推動國際接軌的一環,相關事務的主管機關之一外交部,便表示「推動打工度假制度是國際發展趨勢, 目的在協助各國青年朋友增進國際視野。」(外交部,2012年9月15日)值得補充說明的是,還原當時歷史脈絡,外交部的發言是為回應時年的「台勞爭議」:當時赴澳洲打工的台灣青年,有不少從事社會地位較低落的工作¹⁰。

打工度假和交換學生的相似之處還在於,論者同樣慣常以"gap year"、「壯遊」、培養獨立、挑戰自我等論述來詮釋。對此,不少的國內碩士論文都討論過打工度假的意義,特別是在 2014、2015 年間的幾篇論文(張慧慈,2014;譚心莛,2014;阮靖權,2015)不約而同地聚焦於打工度假者的認同與動機,也同樣試圖回應「台勞爭議」。在他們相仿的結論中可以發現,青年們選擇打工度假離開台灣的動機是「為了實踐現代性的想像,為了與歐美青年 gap year 取得類似的效果。」(張慧慈,2014,頁 103),而促成這種動機的抱負是,「想要透過『壯遊』,成為一個自己心目中更好的人。在與澳洲簽訂打工旅遊協定計畫後,打工旅遊提供了『自我變身』的機會。」(阮靖權,2015,頁 64)

也因此,儘管從客觀層面——特別是金錢得失的層面上——來理解他們的 抱負看似矛盾,但他們自身的主觀層面卻往往可以自圓其說;反過來說,這便 點出之所以有懷疑,僅僅是因為論者不明白他們所追求的利益為何 (what is at stake)。誠如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述,任何社會實踐都繫 於不同的特定場域規則,而不同場域都有屬於其自身的特定利益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270)。對此,布赫迪厄將人們對

_

¹⁰ 「台勞爭議」出自《今周刊》報導,見 楊紹華(2019 年 9 月 15 日)。〈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 澳洲屠夫〉,《今周刊》,821。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清大生淪台勞-網友爆-周刊造假-移花接木-164758679.html

於場域的投入稱為「幻象 (illusio¹¹)」,並將場域比擬為遊戲解釋:

幻象因此正是氣定神閒 [ataraxia] 的對立面;它意味著聚精會神 [being invested]、專注在介乎特定遊戲中的利害,並準備在幻象所帶來的競爭中賭上一切換取這些利害,這樣的競爭只有在迷上遊戲且擁有足以辨別其中利害的秉性之人眼中存在,而這些利害,相反地,對那些無法辨別其況味的局外人來說毫無意義可言。(Bourdieu, 1998, pp. 77-78)

這回應了張慧慈(2014)的研究發現,他指出:

澳洲打工度假從事的工作類型與勞動條件雖使他們經歷向下流動,但 藉由轉化這樣的經歷而獲得的文化體驗資本,使得他們在主觀評價上 認為自己向上提昇,藉以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歷程。(頁 104)

對照打工度假的例子來看,探討交換學生貸款赴外實踐的動機如何言之成理,便繫於他們視何為**利害所在**;而這樣的利害視其身處的場域不同,自然不能單單以金錢上的利益來定奪。按照布赫迪厄對幻象的闡釋,利害的存在建立在場域中人的「秉性 (disposition)」之上。秉性是由生命歷程中的不同遭遇形塑而成,它指的是一個人的實踐傾向;也因此,如果我們將秉性理解為一種默會知識,則慣於場域中利害競逐的默會知識,便是幻象成立的條件。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這就像非華語的使用者,或許無法理解、也毫不在意領車牌領到數字八的驕傲之處。因為這樣的驕傲不僅深深地鑲嵌在華語使用者長期使用語言造就的秉性中(對數字八的敏感度以及習慣性的追求),其成立也仰賴這些語言、數字規則,以至於相關文化在社會中的客觀存在。

_

¹¹ 關於 illusio 一詞的原意與翻譯,可參考蘇峰山(2002)的說法:「布爾迪厄[即布赫迪厄]常用一個詞來表示投注於遊戲中的狀態——illusion。illusion來自拉丁文的字根 ludus,ludus 即遊戲之意,illusion即 in-ludus,身在遊戲當中。illusio即英文之 illusion,中文通常譯為「幻象」。在此並非很好的譯法,但一時似乎也想不出更恰當的譯法。(轉引自廖育正,2019,頁 145-146)」

從這個角度看來,「接軌國際」本身就可以是一個場域中的成就所在。而只要確認同樣是為了接軌國際遂行的實踐,就算打工度假和出國交換並非如出一轍,卻可以說是在相關幻象下同一個場域內的不同做法。是此,打工度假、出國交換,甚至是出國留學,都可以放在同一個框架下討論,他們都可以視為邁向「接軌國際」的不同策略。而在其中,交換學生——特別是貸款的交換學生——便是特別值得思量的對象:一方面它排除了如同「台勞」刻板印象一般,打工度假對純粹經濟利益的直接追求;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出國留學一般,有變現效果堅實的文憑可以期待。它的經濟門檻較低,卻依然要求著不在少數的經濟性投入,於是交換可說體現出了接軌國際的純粹價值。

幻象的理論協助我們指出,真正重要的並非替國際化帶來成功這樣的邏輯 證偽,也毋須執迷於文化體驗商品化帶來的某種矛盾。真正重要的是,試圖瞭 解為什麼貸款赴外的學生們會投入其中——亦即他們重視的是什麼、他們賭上 的是什麼;以及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軌跡——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不同 遭遇——形塑了他們得以辨別此處利害的秉性。

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秉性如何來自於社會軌跡?實踐傾向往往是不自覺,並且由日常生活所形塑的,正像是品味的判斷一般。在貨架前看到商品,為什麼下意識地拿起的是印著外語的那件,而不是印著國語、能透徹瞭解內容的另一件;這可能就源自於過往生活中,對於外語代表舶來品、舶來品代表高品質留下的直覺反應。

就接軌國際的判斷來說,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近年來亦有高中生畢業後直接前往海外攻讀學位的趨勢,相關的新聞故事便指出其中多是傳統高中名校或是私校學生——「私立高中學生出國升學現象更明顯,私立明道中學副校長陳炤華指出,香港、京都、多倫多、東京大學都來台『長驅直入校園』招生。」 (馮靖惠,2019年3月20日)從引文可以發現的是,正因為這些海外頂尖 大學選擇進入傳統名校、私立學校招生,相比其他高中學生,名校生與私校生 也就更有機會在這種狀況下,接觸到這些資訊;而當身旁充斥著更多有關接軌 國際的資訊,自然而然就擁有了能看懂其利害之所在的秉性。正如布赫迪厄所說,這些影響在沈澱以後,就成了實踐上的傾向:

隨著這種和需求間的客觀距離增加,生活風格便逐漸成為韋伯稱為「生活之風格化」的產物,一種引導並組織大多數帶著變化的實踐的系統性投入。 (Bourdieu, 1979/1984, p. 55)

這便是一種讓人傾向在高中畢業就接軌國際的社會軌跡。

此外,正因為他們的實踐源自於對遊戲的投入,是為了競逐遊戲中的利害,實踐的動機便源於他們認為實踐將為他們帶來遊戲的利益。正如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中,有著可以轉化為文化體驗資本的壯遊經驗;在貸款赴外交換中,學生也必定追尋著能夠轉化為特定資本,幫助他更靠近國際接軌的價值(無論是某種經驗或某種顯性或隱性知識)。由此,便要藉由對交換過程的分析,去探問他們在其中獲得了什麼,這如何幫助他們更接近理想。

研究目的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接軌國際等於成功的想法,確實有其矛盾之處,卻依然無孔不入地出現在新聞、政見、政策,甚至於個人實踐當中。本研究想要理解的便是這樣的說法存在,並且被接受甚而實踐的理由。當這樣的幻象存續的同時,正如同布赫迪厄所指出的,實源自於一種「共謀 (collusio)」:

慣習是所有類似條件及狀態下的行為者間,一種*隱性共謀*的基礎……每一個行為者都從其同儕的舉措中,承認並合法化己身舉措,與此同時,這重又承認——且在必要之時糾正——他人之舉措。(Bourdieu, 1997/2000, p.145)

也就是說,接軌國際的遊戲之所以玩得下去,正是因為前仆後繼地不斷有人投入其中並承認其價值,令其得以運行不悖。

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標題中使用的「動機」一詞。它或許令人聯想到一種心理學上的描述,而心理學討論中的動機——基於其學科科學性的要求——往往有必要在嚴格的實驗室環境下施作,才較有可能滿足研究本身的可重複性。而描述性的討論,譬如中學課本中都會講述到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所闡述的,則往往難以自圓其說。以馬斯洛為例,他將人類動機描述為不同層次的刺激下產生的不同層次反應,惟其自始至終受到不同程度批評的牽制,對其所欠缺的堅實科學基礎提出質疑¹²。

但是,正如同對打工度假的研究所顯示的,對動機的研究並非不能以不同的客觀條件為基礎完成。在此,將動機一詞置人括弧,便是希望強調對該詞意涵的非心理學式使用方式。此處的動機實是採用其日常生活用語上的廣泛意涵,亦即造成實踐的一切原因。根據這種日常生活用語的用法,可以進一步帶來明確的定義,而這樣明確的定義則可以協助區分出欲研究概念的不同構面:根據《五南國語活用辭典》的詞語解釋,動機一詞可以是「廣狹二義:廣義指意志有所決定時的相關之意識要素;狹義指有且的之決意動作。動機能使人發生興趣,教育家對此最為重視。」(周何、邱德修編、2015)廣狹二義若置人布赫迪厄的幻象與共謀觀點中,便能夠將人們實踐的「動機」區分成兩種層次做探討:亦即該做什麼的準則(涉及廣義動機:形成為什麼這麼做背後的為什麼),以及在這個準則下為什麼這麼做(涉及狹義動機:為什麼這麼做本身)。一方面,前者指涉的更像是抱負(aspiration),在幻象的概念中,這源自於看出利害所在的秉性,是「生活之風格化」的產物;另一方面,後者則是抱負下的策略,亦即受到利害誘惑下,欲遂行逐利的手段。

_

¹² 原文題名即《人類動機之理論》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關於批評及相關歷史的討論,見 Brian Liu (2019年4月15日)。〈人生不是一座金字塔:需求層次理論騙了你〉,《CUP 媒體》。取自 https://www.cup.com.hk/2019/04/15/who-built-maslows-pyramid

本研究希望藉由以上觀點,透過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實踐的研究,瞭解在實踐中所體現來自他們秉性的影響,以及實踐所指向的利害為何。藉以瞭解接軌國際這樣的遊戲,為何能與學生們建立起一種「入迷關係 [enchanted relation]。」(Bourdieu, 1998, p.77)

為探究學生貸款赴外交換的實踐,從而探討學生與接軌國際之理想的相互 關係。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主要問題為:

- 一、這些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秉性——亦即實踐傾向,而視接軌國際為理想目標?什麼樣的社會軌跡形塑了這樣的秉性?



第貳章 文獻探討暨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藉由「世界主義」概念,來理解接軌國際的 抱負。第二節則藉由布赫迪厄的場域與資本概念,解釋作為幻象的接軌國際, 及其體現的利害。最後,第三節將整梳以上討論提出佔位概念,並據此在第四 節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方式。

第一節 接軌國際與世界主義觀點

接軌國際要求的是國際觀。儘管如同緒論中提到的,國際觀一詞可說琅琅上口,但具體意涵卻是一定程度的曖昧不明。若參考英語的用法,語意上較為相近的說法可能是"global/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global mindset"等等,但使用上通常侷限在商業管理領域,也不像國內是約定俗成的詞彙¹³。

不過,對接軌國際的嚮往,並非國內才有的現象。不同的研究者,越來越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發現,人們身上勇於對他方人事、文化表現開放心態的傾向(Beck, 2006; Saito, 2011; Szerszynski and Urry, 2006) ,便借用哲學概念將之稱作「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素養。並將這樣的現象,歸結於(一)人事與文化跨越國界的流動增加,使得日常生活不同習俗的眼界橫跨國家地擴張;

(二)世界各地將人權言說體制化——也就是將人道視為先於國籍的標準——的結果(Igarashi and Saito, 2014)。

世界主義素養會帶來「世界主義觀點 (cosmopolitan outlook)」——一種具體的國際觀。以下藉世界主義素養概念,來討論接軌國際所需要的國際觀,藉此理解接軌國際所追求的利害。

18

¹³ "Global perspective" 是國內不少教育研究採用的英文說法,但這樣的用法不僅甚少出現在一般英語新聞報導中,大多用處也較為特定,不若「國際觀」一詞使用的普遍性;這些研究共同引用的來源皆是同一篇 1982 年的英文文獻,見 Hanvey, R. (1982). An Attainable Global Perspective. *Theory into Practice*, *21*(3), 162-167.

一、世界主義觀點:一種特定國際觀的浮現

(一)接軌國際所需要的國際觀

再次回到研究背景中提到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全書開頭處是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的序言,他透過 2010 年佔據國際新聞版面多時的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爆發來破題,點出白皮書欲推廣的國際觀是何樣貌:火山爆發本是一國,甚至是一個行政區內部的事,但由於大量的火山灰籠罩歐洲大陸,導致大量來往歐洲或歐洲內部的航班被迫停飛;當時國內新聞也曾經報導,不少台灣旅行團因為班機取消滯留當地,或歷經多次轉乘才由中歐或土耳其搭機返台。

其中重要的是序言中提到:「在這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變動,都可能會影響我們周遭的生活。」(教育部,2011,頁序)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亟須透過國際教育來培養國際觀,其背景就源自於世界各地早已是休戚與共的狀態了。如果接軌國際是「全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那接軌國際的方式便是知悉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想法,其實吻合了德國社會學者貝克 (Ulrich Beck) 所描述有關晚期現代的特徵,也就是一種「風險社會 (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的狀態 (Beck, 1992);及其據此發展的一套「反身世界主義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學說 (Beck, 2006)。參考貝克的論述以及其中疑義,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所欲研究的一種特定的**國際觀**,其成立的背景以及理論意涵。

(二)風險社會:休戚與共狀態的背景

所謂的風險社會,指的是現代工業社會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其在生態上、 技術科學上衍生的風險,逐漸具有舉足輕重之社會影響性的狀態。同時,在這 個由核能、化學,基因工程技術所定義的年代中,經濟發展所衍生具有高度潛 在破壞力的不同影響因素,也逐漸地不受傳統工業社會固有控制與保護機制 (譬如國家體制)的。因此,也讓人們對社會狀態的認知有了全面的轉變。 貝克將處於這種狀態的社會,視為現代性或現代化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這樣的第二階段,按貝克自己的說法,「建立在一種全面的科學化 [scientization]之上,這樣的科學化進一步地將科學的懷疑精神延伸到科學自身的基礎,以及科學可能造成的外部後果之上。」(Beck, 1992, p. 155)這樣的描述至今依然有一定的詮釋力¹⁴。貝克在後續的論述中,進一步地將這種社會狀態定義為一種「反身的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過程,或是「第二現代 (second modernity)¹⁵。」(Beck and Lau, 2005)

風險社會概念對人們世界觀的理論意涵,可以體現在德文原版書籍出版後不久發生的車諾比核災事件——除了恰如其分地體現出如何風險社會下,世界各地如何進入了休戚與共的狀態,當時也讓該書一時洛陽紙貴 (Blok and Selchow, 2017)。車諾比的核災在當時,不僅造成了環境本身跨越國界的影響,也間接導致世界各國開始研擬核災相關政策;或許更重要的是,它間接影響了蘇聯國力,使其最終走向瓦解並結束冷戰局面¹⁶。建立在這樣的詮釋力上,貝克進一步發展出了「世界主義化 (cosmopolitization)」,或稱「反身的世界主義化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這樣的概念,力圖聚焦於這樣世界休戚與共狀態的研究,以及人們對此的認知 (Beck, 2000, 2006)。同時,世界主義概念亦逐漸成為社會學的一門重要研究區塊 (Delanty, 2012)。

-

¹⁴ 譬如近年工業 4.0 的發展中,物聯網作為重要的硬體技術發展,最受矚目的應用之一,是藉其自動化風險控管工作(像是在煉油廠這種高風險工業生產場域中,將過去難以聯網卻高度敏感的鑽油機具等部位聯網以利監控)。更重要的是,作為達成風險控管自動化的軟體技術發展,像是大數據等資料科學概念,更加體現了我們急於對自身直接或間接的產出能有全盤掌握。 15 這樣的定名,反應了這項概念的重點之一,在於回應後現代思潮:第二現代認為後現代思潮中對自身根基的懷疑、解構的傾向,並非現代性的結束,而是現代性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Beck,

中對自身根基的懷疑、解構的傾向,並非現代性的結束,而是現代性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Beck, 2000)。相似地,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在立論其「高度現代 (high modern)」概念時,亦曾援引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做解釋,且同樣亟欲和所謂後現代劃清界線 (Giddens, 1991)。

¹⁶ 見 吳凱琳 (2020 年 2 月 2 日)。〈天下國際週報:武漢肺炎,能撼動習近平的權力地位嗎?〉,《天下雜誌》(網路版內容)。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820

(三)主動的世界主義化作為一種國際觀,以及它的解釋力

貝克借用了哲學性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一詞,來描述世界主義化作為具體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社會狀態 (social scientific cosmopolitization) (Beck, 2006)。世界主義一詞最早發源自希臘哲學,但近代的理解則大多源自於康德 (Immanuel Kant) 在《論永久和平》 ("Zum ewigen Frieden") 中的見解¹⁷,貝克的思想亦以此為參照。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意義上的世界主義化概念,貝克指出,因為各地往來愈趨平凡、跨國金融流動越來越自由,甚至人為災害越來越跨越國界,我們不僅越來越容易受到彼此影響,也越來越容易一一就像是面對作為風險的工業生產副作用一般——在決策時考量到彼此,這也是他指出世界主義化具有反身性的理由。因此社會科學有必要進一步思考超越國家範疇的現象,告別傳統中將國家視為社會基本單位「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在這樣的討論中,儘管看似可以歸屬於全球化研究的範疇,但貝克認為全球化研究更著重於物質現象的討論,相較之下世界主義化研究則關注這種現象如何令人們在認知與決策上更具反身性。據此貝克強調,相較於全球化,這樣的討論有必要使用不同的詞彙¹⁸。

進一步,藉由分析世界主義化現象,貝克區分出了主動的世界主義與被動的世界主義化。被動的世界主義化被他稱作「隱性的世界主義」、「被動的世界主義」,甚至是「無意識的世界主義」;這種狀態是國際貿易或諸如氣候變遷、恐怖主義等國際威脅的副作用,它使得「個人生活、身體以至於『個體之存在』,都在未察且並未明確表態意願的情況下,成了他方文化、信仰、歷史、全

21

¹⁷ 康德的世界主義可以被簡述為,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有身為世界公民的權利義務,並由一個義務性的國際聯盟達成這種權利義務的法制化及落實。見 周家瑜(2014)。盧梭、康德與永久和平。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4),621-657。

¹⁸ 貝克在全球化研究外獨立出世界主義研究的主張,始終被批評理論意涵含混不清且缺乏實證基礎,此部分俟本節第二段討論。

球相互依賴性的一部分。」(Beck, 2006, p. 19)

相形之下,所謂主動的世界主義不僅更符合哲學傳統上的世界主義價值,也被貝克視為一種理想的「世界主義觀點 (cosmopolitan outlook)」,亦即一種理想的「國際觀」。所謂的世界主義觀點,指的是能夠主動地認知到正在發生的世界主義化現象,並善用這些現象賦予在社會與社會科學意義上賦予自身的反身性,積極主動地參與在休戚與共的跨國界現象當中。

貝克指出,這樣的理解方式其實正類似於更常被提及的「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Beck, 2002),是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 (rooted cosmopolitanism)」。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理解我們自己的國際觀,就像是《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的同一篇序言中提到,國際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國人瞭解自己、社會及國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與科技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能覺察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與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來「加速國際接軌的腳步」(教育部,2011,頁序)。這便是在意識到當代全球的休戚與共性後,以正視自身根基、自身在全球中的位置的態度,理解世界主義化所帶來反身性影響的一種國際觀。

而這樣的國際觀,也確實是強調著勇敢地走出舒適圈的重要性,所謂走出 舒適圈就是將他方的他人納入自己的關照,所謂的勇敢就是對他方人事物的開 放心態,這回應著研究動機中所提到的不同論述。

二、世界主義觀點的內部矛盾

(一) 理論前提的內部矛盾

但檢視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論題,確有不少可受公評之處。首先,多有論者認為這樣的研究始終模糊不清,缺乏社會學研究應有的完整論述基礎 (Calhoun, 2010; Saito, 2011)。譬如 Hiro Saito (2011) 便指出,貝克與其同僚進行的世界主義研究,始終停留在對於現象的描述式分析,卻未曾提出現象明確的

發生機制;同時,在區分全球化研究與世界主義研究的同時,僅僅是為前者貼上全球主義的標籤,認為前者單單聚焦於跨國經貿自由化等現象,卻忽略大有探討全球化文化面向的研究存在。而 Craig Calhoun (2010) 更指出,世界主義研究的含混之處在於,世界主義一詞同時用於指涉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的規範性內涵,以及世界正如何轉向的實證論述,使得世界主義研究大有一廂情願的成分。

此外,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最大的疑點之一,在於它對於現象的詮釋往往難以在實證研究中驗證,有過度推導式理解的嫌疑,無論是作為基礎的風險社會理論 (Dingwall, 1999; Jarvis, 2008),或是世界主義主張本身皆然 (James, 2006)。譬如 Paul James (2006) 指出,貝克的說法與近年來不斷出現的(現象上的)國族主義浪潮,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發現的新部落主義 (new tribalism) 現象失之交臂,「方法論上的世界主義 (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這樣的主張並非不證自明。

在此,理論的含混性或許並不減損世界主義觀點作為理想的效力,但卻使 得它成為理想的立論基礎看來問題重重。

(二)理論前提的侷限

貝克的世界主義觀點以及世界主義計畫本身,一定程度上的理論假設來自 於國家無論在主權或實質影響力上的減退後,世界各地皆不斷地走向世界主義 化。儘管未言明,但其立論某種程度地假設了世界各地共同地經歷其所謂的第 二現代狀態,或起碼忽略了可能的差異。

其中,南韓學者 Chang Kyung-Sup (2010)以「壓縮現代性 (compressed modernity)」概念,來補強在第二現代、反身世界主義的相關討論中,對於非典型的第二現代狀態缺乏的關注。壓縮現代性是 Chang 根據南韓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在(相較於歐洲的)極短時間內取得的現代性狀態,並指出這可以在後近發展的東亞國家、中國,或是前蘇聯國家發現。藉此他指

出,走入第二現代狀態後,世界主義化對於世界各地確實造成了不均等的影響,譬如前殖民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可能深受原殖民者遺留的體制影響。儘管如此,他依然強調影響並非單向的,先行現代國家同樣會在世界主義化的過程中,受到晚近現代國家的影響,諸如生產業外移等。他援引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所指出的,現代性無法自給自足,一定是放在全球範圍內做詮釋才能產生意義;而壓縮現代性的觀察,則進一步指出一種「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存在的可能。

然而,正如 Calhoun (2010) 提出的批判,世界主義的相關討論本身就弔詭地帶著相當重的歐美色彩 (Euro-American)¹⁹,而第二現代這樣的論述也很大程度地建立在歐洲現代性之上。此外,儘管貝克與其餘投入世界主義研究的研究者試圖修正這樣的理論缺陷,但譬如貝克所提出「第二現代性的不同變體(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或是前述 Chang 的壓縮現代性概念,都依然無可避免地將歐洲現代性用作核心參照。

(三)無可避免的東西方二元

實際上,無論廣義的東方或是西方討論²⁰,都難逃世界主義的西方中心色彩。誠然,張君玫(2006)便指出,從康德世界主義理想中,以西方理性主體作為預設的對象,便是對於非西方(未受過文化烹煮的)生人的一種**提前取消**(foreclosure)。

不僅如此,藉由對西方世界主義討論的言說分析,並檢視中文世界對西方 世界主義思想的譯介,張君致區分出了兩種相依而生的世界主義觀點。對於貝 克世界主義計畫的分析,張君致指出其呼籲的是西方向非西方的傾聽,並總結

24

¹⁹ 意指多數論者有著歐洲或美國的背景。事實上身為曾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的美國人, Calhoun 自身也在這樣的指涉當中;參見另文中對自身世界主義性的反思 (Calhoun, 2008)。 20 此處「東方」和「西方」二詞的使用無意強化兩者的本質化理解,而是參考張君玫的做法, 以論述詞彙來「再現全球化五百年以來慢慢形成的文化權力佈局」(張君玫, 2006, 頁 101)。

貝克的觀點為「『世界社會』將是一個透過『客觀的世界主義』過程(即全球化),進而邁向『反省的世界主義』²¹的進步歷程。」(同上引,頁 70) 象徵的是一種「歐洲發言位置才可能鋪陳的慈善世界主義」,是一種「包容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of tolerance)」。另一方面,以中國譯介世界主義的歷程來看,其中無可避免地持續將「西方」類同於「世界」,並將「西法」視作「新法」,將接軌世界/西方類同於走向進步的唯一道路,相對形成一種「參與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of participation)」。也因此,

強勢者要學習包容,弱勢者則努力參與(進入「世界」,而這「世界」 其實往往就是「西方」的換喻)(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as metonymy of the "West") ——亦即,透過把「世界性」定義為「西方」的核心屬性,從而把「西方」悄然轉換成「世界」。(同上引,頁70)

儘管兩種世界主義似有區別,視為圭臬的卻同樣是西方,正如同第二現代的不同變體無可避免地參照著歐洲現代性。

三、兩面並陳出的接軌國際理想

在論述其有根的世界主義理念時,貝克提到:

談到帝國主義批判,有根的世界主義會指出,在一個後殖民的世界中並沒有純粹、前殖民的國度能夠復歸。唯一一條前行的路,便是走入超越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者世界。(Beck, 2003, p. 27)

在不同論述中,貝克始終對於後現代、後殖民等後學有一定程度的敵意,認定 這些論述缺乏廣闊的視野。然而,對照不同的批判,貝克所提倡的世界主義 觀,確實忽視了世界主義思想成立的條件,不僅難成真正注重個體根基的世界

_

²¹ 貝克此處原文為 "reflexive cosmopolitanism",即前述的「反身世界主義」,惟張君玫應是重視此處強調的反省面向作此翻譯。

主義,也意味著這種世界主義觀某種程度地成了自身口中的「敵人」(Beck, 2006)。在此,除了進一步理解接軌國際理想值得深思之處,也透過兩面並陳來 理解接軌國際理想所建構的幻象——遊戲本身與投入的重點。

(一)與貝克世界主義計畫的對照

事實上,以上的批判性閱讀,確實解釋了國內交換學生的一部分現況。譬如以 2016 年的資料來看,從 101 到 103 學年度的趨勢,前五大目的國家分別是中國、日本、美國、韓國、德國,除了中國牽涉到文化相近性等文化歷史背景而成為首選外,學生普遍傾向選擇已開發國家(林佳賢,2016 年 5 月 5 日)。以最新的資料來說(如表 2-1 所示)107 學年度(2018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上半年)的趨勢,除了南韓超過美國以外,整體趨勢未發生改變。當然,或許一部分來自於新南向政策的鼓勵,近年來前往東南亞地區交換的學生連年翻倍成長(林健生、彭煥群,2019 年 5 月 10 日),但依然無法跟前述國家相提並論。

表 2-1:107 學年度全學年赴外交流前十大目的國

國家(按人數排戶	人數
中國	Chengchi 1542
日本	1125
南韓	756
美國	574
德國	570
法國	361
荷蘭	214
捷克	209

表 2-1 (續)

國家(按人數排序)	人數
西班牙	183
新加坡	134

資料來源:「日間學制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一以「系(所)」統計」22

正如研究背景中所提,張慧慈(2014)指出,在模仿歐美青年的"gap year"上,這就是一種對西方現代性的追求,顯見這樣的趨勢同樣也出現在以打工度假為形式的接軌國際上。如是,我們的接軌國際依然是一種參與式的,就算同意 Chang (2010) 所言,交流並非單向式的,卻依然有一定的傾向。

(二) 理想背後的社會條件

而世界主義觀點作為一種特定的心態,或以布赫迪厄的語言,將其稱為一種特定的身體傾向,確實非能一蹴即成。Calhoun (2008) 便指出

世界主義素養並非僅僅是一種毫無阻礙的文化品味、個人態度或政治選擇;其實際上賴於自身形成的過程。這些看來自主的個人選擇,往往奠基於個人的資本——無論社會、文化或是經濟資本。(p. 433)

舉例來說,當我們對接軌國際的態度是一種參與式的世界主義時,要能開始參與,便要有參與的門票——要參與,也要人家願意讓你加入;正如一篇談論國際交換學生學習的文章所點出的,接軌國際不若想像中容易、文化交流也從來不會自動發生:

交換學生能交到的當地朋友很有限……去到美國大學校園,聽課跟不

/SirdContinuingEducationAndExchangeStudent/Index,由筆者自行輸出、統計。

²² 取自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學生類

上、與同學溝通不良的 trouble 很多,對一般的美國人而言,一兩次的請教可能沒問題,次數多了,一定有人會開始閃避你。(張立蓁, 2016 年 3 月 28 日)

當然,並不是所有旅居他鄉的交換學生都不懂得與人相處的份際,這或許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這個例子卻也點出:交流不會是平白無故地發生,其中往往是有許多隱藏的要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首先就需要足夠的文化資本供使用,亦即合宜的互動姿態。除此之外,隱藏的要求也包含了更多隱藏的經濟成本,無論是建立跨國人際關係的社交活動,或是為了作為談資,儲備文化資本、增廣見聞的四處遊歷,這些背後都是額外的成本,也便是各種隱形的門票。於是,適當的禮貌就已經需要學習,有禮貌卻也不代表能交流到更多。

(三) 小結: 世界主義觀點帶來的洞見

正如 Saito (2011) 所言, 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 鼓勵了我們對於全球化的物質現象以外, 有關世界主義這樣個人素養、傾向的關注;此外或許略帶諷刺地, 就以上批評來說, 也成功匯聚了不少批判性的討論。恰如張君玫(2006)所說的:

貝克確實道出了一個確切的趨勢,儘管情況並不見得像他說的那麼樂觀。不過,我們可以說,Cosmopolitanism這個「西方」符號的意義視界,已隨著「單純的全球化」²³的多樣化過程,播撒到西方以外。這種播撒,是一顆「種子」的傳播,連同其他許許多多來往與交易的種子,改變了當地的生態。(頁71)

之所以要從批評的角度來理解世界主義觀點,正是因為透過與之相對的立場, 才能更誘衛地理解世界主義觀點的內涵 (Bourdieu, 1979/1984)。

_

²³ 貝克原文為 "simply globalization",接近於前文所及的(被動)世界主義化。

第二節 遊戲與利害的構成

如果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共謀得以遂行的利害,那它運行的機制是什麼? ——也就是說,怎樣才算是投入其中,其中的遊戲規則又是如何?以下藉布赫 迪厄的場域與資本概念,來討論世界主義觀點如何發展成利害關係的標的,以 及其後續帶來的效應。

一、「遊戲」的形塑

(一) 浮現的幻象: 從客觀的世界主義化到世界主義觀點

純粹愉悅 [pure pleasure] ——意味著拒斥著愉悅的、禁慾而無色的愉悅,將愉悅淨化後的愉悅——這注定成為一種道德卓越的象徵符號,而藝術作品便是倫理優越性的試煉,對定義了何謂真人 [truly human man] 的昇華 [sublimation] 能力所進行的一種不容質疑的評量。

.....

藝術性「創造」製造出來的世界不僅僅是「另一種自然」,更是「反自然」。(Bourdieu, 1979/1984, p. 491)

〈跋:邁向對純粹批判的通俗批判〉(《區判》)

在《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中,當布赫迪厄考究品味的社會性由來時,他藉由對純粹批判的一種通俗批判——亦即對康德式的判斷力批判(該書標題也是由此而來的雙關)進行批判提出,所謂審美無非就是建立在對於直觀愉悅的拒斥,從來不是一種超驗甚至是先驗的人類條件。正如昇華一詞所象徵的,這是一種社會性理性的倫理要求,而非對不證自明、超越性的某種內在之美做出回應。

同樣地,從世界主義化走向世界主義觀點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相似 的情況。布赫迪厄對康德提出的批判是:「康德對品味判斷力的分析,事實上 有一系列的審美原則做依據。這些審美原則由特定秉性的普世化形成,而這些秉性又繫於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 (ibid, p. 493) 而從風險社會、反身世界主義,再到世界主義觀點的形成,其試圖建構的不證自明,正如前文所論證的,無非也是基於一種特定的觀看視角——而且這個視角從來不是毫無客觀基礎的視角——所得出的結果。或許正如布赫迪厄所指出的,「《判斷力批判》其實比想像中來得更接近《普世歷史理想》²⁴,後者無非是將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的旨趣昇華後的表現形式」 (p.492) 。在此,世界主義觀點和品味判斷這兩種同樣可以溯源至康德的「判斷力」,因為同一種對「昇華」的信仰,將特例給普遍化成為了通例。同時,這種昇華也就製造了一個不是現實世界的現實,亦即幻象。質言之,世界主義觀點最初誕生於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卻被武斷地普世化;無論那原本是西方自我中心的文明大業,或是被殖民者令自身現代化的手段,今日剩下的只有他們被化約後的普世計畫功能。

在這樣的邏輯中,客觀的世界主義化是怎麼成為世界主義觀點的?原本被稱為客觀的世界主義化的這些現象可能並不帶有特定的意圖,或特定的意義,但在世界主義的觀看下不僅提供了他們意義,也剝離了他們(儘管或帶隨機性)的原初由來。這同樣可以藉由審美與品味的建構來類比:

就像博物館一樣,其目的無非是讓人觀賞一些經常是為了其他用途而 生產的作品(像是宗教畫、用於舞蹈或者典禮的音樂等等),所帶來的 結果就是建立了社會截斷,藉由將作品抽離它們原本的脈絡,就剝除 了它們的各種宗教或正式功能,並透過一種行動中的懸擱 [épochè],將其化約成單純的藝術功能。(Bourdieu,1992/石武耕、 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443)

與國際上的不同人來往,或許本來是為了——甚至更像是一種貝克口中被動

30

²⁴ 該書標題原文為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全稱即為「世界公民理念下的普世歷史理想」,同為康德宣揚世界主義理念的著作。

世界主義化的狀態——一樁生意、一次興趣相投的交往,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各種目的;然而,在無論是緒論之初所及的政見發表,或許更是在教育過程中重複操練使然,它漸漸地產出了接軌國際的意義,不同的實踐開始有了積累世界主義宏觀素養的意義。就像藝術品一樣,我們依然可以也總是會溯源去探討原初的使用價值,但我們卻已經無法迴避地陷入對其象徵價值的相信與服從。也因此,我們當然都知道生活只是為了生活,但現在我們開始會相信在他方「生活(就是獲得國際觀),最好的方式」。

因為教育、因為各種不同文化使然,建立起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這種習俗,也就連帶建立起了對藝術品的純粹觀看;而正因為譬如在教育中,我們會被帶著嘗試「認識一位國際朋友」、「激發國際接觸興趣與勇氣」,也就建立起了以國際觀思量日常生活事務的觀看。或許正如教育團體所指出的,在中小學教育中的國際化推動,有**許多流於表面的努力**,譬如「建置學校的雙語網站、設置雙語校園標示」(章凱閱,2020年9月17日);然而恰恰是這些浮面的推動,在日常生活中令學生不斷地生活在國際化的環境中,不斷地以國際化的方式看待日常生活,令學生潛移默化地學到國際觀一一一種特定的世界觀。

(二) 利害的形塑:對非經濟邏輯的闡釋

利益就是一種歷史上的任意武斷性,它根本不是什麼人類學意義上的恆定因素,而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頁185)

資本運作真正的邏輯,無論是從一種到另一種的轉換,或是掌管這些的轉換法則,只能在我們替換掉以下兩種對立但各自都只說了部分事實的觀點後理解:一方面有所謂的經濟主義 [economism],將所有資本都可以被化約成經濟資本當作立論基礎,忽視讓其餘資本各自產生特殊效應的原因;另一方面有所謂的符號主義 [semiologism] (在今

日以結構主義、符號互動論、俗民方法論為人知),他們將所有的社會性交換歸納為傳播事實,忽視了經濟學 [economics] 的普世可約性這種無情事實。(Bourdieu, 1986, pp. 252-253)

幻象就是一種暫時或永遠忘卻遊戲外利益的狀態,完全以遊戲內的狀態來理解世界,而遊戲內的利益純然是由遊戲所構築的。在此,布赫迪厄所要強調的是,當今天我們廣泛地用金錢利益來衡量一切時,我們忽略了這是資本主義長久以來建立的思維模式,實際上在前資本的社會中,利益並不見得要以金錢的方式來認知、交換,甚至是存在。布赫迪厄強調,無視這種歷史的建構便會陷於西方思想中大寫人類 (Man) 的各種先驗假設,與其背後的人類中心主義想像(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正因為不同貿易活動的研究其實只是經濟學的其中一部分,主流經濟學的狹隘理解其實阻礙了一種「實踐經濟通論 (general science of the economy of practices)」的誕生 (Bourdieu, 1986, p.241)。實際上,透過和資本主義建構起金錢為主的利益觀一樣的方式,國際觀也可以建構出利益觀,也就一樣可以透過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而經濟學思維所提供最好的洞悉之一,正是如上引文指出的一種普世可約性 (universal reducibility) :

因為每個人在遊戲中占據不同的位置(支配與被支配,正統與異端)以及獲得這一位置的軌跡也各不相同,因此對他們來說,利益也同樣是千差萬別的。人類學和比較歷史學告訴我們,制度的社會巫術 [social magic] 只要得當,就能把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建構成一種利益,而且是一種現實可行的利益,也就是說,將它建構成一種投入,在客觀上可以由某種特定的「經濟」給予回報(投資 [investment] 這個詞,在此處有經濟學和精神分析上的雙重含義)。(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85)

正如引文所述,無論是審美與品味的判斷,或是國際觀的追求上,每個人看來

都可以有千差萬別的理由,可以藉不同實踐追求千差萬別的利益。為了要建立 起統一的原則、建立起經濟學的科學性,普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假設人類一切 行為可以化約為狹義的經濟行為²⁵——亦即採取理性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假設——,並藉此作為以(金錢上的)經濟利益分析人類行為的合理性來源。 與此相對的,布赫迪厄所希望建立的另一種經濟學,並非拒絕看向事物的利益 層面,而是強調利益的分析不該只以背後的金錢考量為準繩;譬如人情往來可 以積累,也可以換取利益(廣義上的互相關照),但就算後續可以產出金錢利 益,也應該以它自身的方式理解——並不是因為要賺錢而與人來往,而是因為 你知道與人來往對你的社交關係是好的,你是在社交關係的框架下,而非金錢 往來的框架下做如是考量。

同樣地,當考量國際觀——特別是站在追求世界主義觀點的位置上——時,考量的就不一定要是接軌國際以後的金錢利益——無論是一官半職或是其它將經驗轉換為金錢利益的作法,所考量的僅僅是如何地更有世界主義的宏觀。一旦如同貝克所描寫地,從被動的世界主義化走向世界主義觀點,正是從幻象外走進幻象內,開始以幻象內的利益——亦即宏觀與否——來思維處事。

(三)作為資本競逐的遊戲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無論是以其物質化的形式,或其「具現化 [incorporated]」、身體化形式存在)當它在私有的,亦即寡佔的,基礎上為不同行動者或不同行動者組合佔有時,令其等得以藉由具體化或直接勞動的形式來佔有社會能量。它是一種*慣性力* [vis insita²⁶],一種

²⁵ 譬如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為例,見 Von Mises, L.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²⁶ 此處布赫迪厄藉物理學名詞作解釋,按其後續於《帕斯卡式沈思》 ("Pascalian Meditations") (Bourdieu, 1997/2000) 的解釋,此處用法特別是哲學暨物理學家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意義上的用法 (p.144)。

銘刻於不同客觀或主觀結構中的力,但它也同時作為一種*慣性定律* [lex insita],社會世界之固有規律所仰賴的基礎原則。它使得社會的遊戲——特別是經濟遊戲——並非單單只是每分每秒都有可能發生奇蹟的純粹機率遊戲。(Bourdieu, 1986, p. 241)

最後,就像是經濟學以資本概念來看待積累活動,布赫迪厄的思維也以資本來定義被積累起來的可獲利性,以資本來定義幻象形塑的遊戲之進行。前文提到,動機的形成事實上繫於特定場域中的特定利害所在。追求這些利害所產生的不同實作,可以看作資本的積累過程;而場域中的鬥爭則被布赫迪厄視為一種**資本(capital)的競逐**,將資本的多寡視為場域中人能否位處支配地位的判準。

如同引文所述,布赫迪厄的定義大致延續馬克思的傳統。但不同的是,在布赫迪厄的定義上,資本並非只有一種形式,而包含了廣義上不同實踐所積累的不同勞動。若對社會做通盤探究,布赫迪厄認為大致可以區分出三種最典型的資本形式:譬如最為人所知的「文化資本」概念,指涉的便是藉由積累具合法性和象徵資本的文化實踐素養所得來的資本(譬如每天晚上都上館子,所潛移默化得來的餐桌禮儀和美食品味),此外還包含「社會資本」——擁有且有能力活用的人脈,及最符合一般理解的「經濟資本」。這些資本之間不僅可以相互匯兌,也影響著彼此的積累(譬如每天晚上都上館子背後要求的經濟資本)。

除了上述三種普遍性的資本外,在不同場域裡,根據不同場域所重視的價值,還可以定義出專屬於該場域,且決定該場域成敗的資本。事實上,若按照布赫迪厄的定義,「場域的結構——亦即位置的空間——其實正是掌管場域裡所謂的成功,以及場域中所重視之利害的特定性質資本 [the capital of specific properties] 其分配結構。(Bourdieu, 1983, p.312)」如果將身在幻象的遊戲當中,想像成身在賭場,那麼這樣的特殊資本就像是賭場中的代幣——這種代幣象徵著不同賭局結果的積累,它只能在賭場中交換、只適用賭場內部的資本規則,

它也因此無法**直接**在外當成現金使用。這種代幣成立的前提,延續前述共謀的 邏輯,便是賭場中的玩家都同意並認得它是代幣(想像一個誤入賭場的孩子, 將鉅額的塑膠代幣當作尪仔標亂扔),而這也同時成為賭場順暢運作的前提。

最後,在布赫迪厄的術語中還時常以較為抽象的²⁷「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來代換不同的描述,這樣的概念對於理解布赫迪厄口中的資本同樣至關重要,他如是定義:

象徵資本的展示(這要以物質形式達成永遠是所費不貲的),正是(毫無疑問通盤適用地)讓資本成為資本的機制之一。(Bourdieu, 1980/1990, p. 120)

象徵資本——區判 [distinction] 的另一個名諱——事實上就是任何一種資本……只要它為人知曉,且被視為不證自明。(Bourdieu, 1982/1991, p. 238)

象徵資本,亦即只要是在其與知識的關係中被再現,或更準確地說, 在其與要求(作為一種社會建構認知能力的)慣習介入的誤認或辨認 的關係中被再現——無論以任何形式呈現——的資本。(Bourdieu, 1986, p. 255, n.3)

事實上這便是他對於不同形式資本最核心的定義,也就是說資本成立的條件在於它所積累的勞動被認可;而越具備象徵資本的資本形式,便越能不受質疑地發揮其效力,正像是一張毋需搬出現金便能簽下一台飛機的黑卡,源自於黑卡或是持有者本身帶有的、不證自明的信譽。這樣的不證自明會在日常生活中各種不經意之處發生,就像是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皆享有盛名時,我們一般都會讚許地以「家學淵源」來解釋,而不會因為中間文化資本的傳遞而形

-

²⁷ 與布赫迪厄緊密合作的社會學家華康德 (Loïc Wacquant) 曾指出,象徵資本是布赫迪厄最為複雜難解的觀點之一(李猛、李康譯, 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容做「階級世襲」;這正是因為他們傳遞的文化資本具有高度的象徵資本意涵, 且這樣的象徵資本是在整個社會中被承認的。

而之所以說這不是一種純粹的「機率遊戲」,正因為遊戲並非去歷史的,並不會在每分每秒重新洗牌;而是在每分每秒都以既有的結構、部署狀態來繼續展開。這個意思是,不若我們一般對於公平競爭,或是「勇敢地出走」,甚至是「在天涯的盡頭,歸零」這種措辭的想像,場域內的資本競爭——或說整個社會遊戲的不同競爭,都關乎社會從太初至近不斷改變,進而形塑出來的資本分配結構,以及資本競逐規則。這正像是代間流動的困難一般,源自於一參與遊戲²⁸(一出生)就被迫接受的遊戲規則(譬如文憑社會),以及身處遊戲的位置(名門後代、書香門第,或偏鄉之子)。

是此,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動機,從來不會是憑空而生的想法,而應該是來自幻象與其個人歷史所產出的**可能性**。要理解世界主義觀點如何構成交換學生,甚至其他追求國際觀的個人或團體眼中的利害,並理解實踐的客觀意涵,便必須透過將世界主義觀點的追求,在不以金錢利益思考下化為經濟邏輯。

二、遊戲的利害

(一) 作為文化資本的構面

回應第一節所點出世界主義觀點的諸多問題,對於作為現象存在於各地、這樣一種對接軌國際的嚮往,亦即一種世界主義素養,不少研究者發現原有討論中匱乏之處,便開始採納布赫迪厄的方法修正,改以較為批判性的眼光審視 (Igarashi and Saito, 2014; Kim, 2011; Lindell and Danielsson, 2017; Weenink, 2008; Weiss, 2005)。

engchi

36

²⁸ 正如布赫迪厄所說,「遊戲只允許一種絕對的自由,也就是從遊戲中離去的自由;而從遊戲以及幻象的視角看來,這必須透過一種壯士斷腕般的放棄宣示達成,藉由社會性的死亡換取不受打擾的安寧——除非該人想辦法建立了另一套遊戲。(Bourdieu, 1981, p.316, n.6)」

而其中,Igarashi 與 Saito (2014) 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最廣泛且系統化的洞悉。他們認為此前多數援引布赫迪厄資本思維的研究,對於系統化此一範疇的研究框架尚力有未逮,便根據諸多相關研究進行後設分析,以替世界主義觀點的運作模式提出更為完整的描述。簡單來說,他們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在世界範圍中,人們文化資本的重要構面;人們透過跨國教育、跨國移動、跨國交流等實踐(勞動),便能逐漸積累這樣的素養、形成文化資本。

鑑於布赫迪厄的理論,視教育為文化資本賴以運作的重要基礎 (Bourdieu, 1970/1990),他們透過研究全世界的教育體制,來探討世界主義觀點發生作用的機制。在過去,教育體制往往是國家機器打造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而今日截然不同地,根據各國比較教育研究顯示(黃文定,2018),各國的教育體制多已將世界主義觀點放在國族認同之前,並將理想的受教者定義為:

他需要知曉一種世界語言——幾乎毫無疑問是英語。他應有能力以一名超國家公民的姿態生活,並且從一種更加普世的觀點來反思地方與國家歷史。換言之,個別學生會成為一種名喚「人道」之新興認同的成員。(Meyer, 2007; as cited in Igarashi and Saito, p. 226)

這樣的現象,自然也體現在前文所提到,表現在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的世界主義觀點。

他們進一步強調,要以布赫迪厄的資本思維思考世界主義觀點,其分配和取得管道應呈現不均等的狀態——正如財貨要有稀缺性才能成為財貨、才能成為資本 (Bourdieu, 1986),並會因此導致按照資本持有多寡排序的階層化。他們以世界大學排名為例,一旦多數大學認同了世界大學排行,並以名列前茅為要務,則榜上有名的大學便取得了更高的象徵資本,令就讀不同大學在象徵上的視野廣度有了不同——就讀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名列第一的牛津大學,就比就讀排名 97 的台灣大學顯得更有世界性的宏觀。而也正因為有排名存在,便建立起了價值上的差異,也劃分出了有價值的少數。

而事實上,這種邏輯之成立恰如張君玫(2006)所指出、參與式/包容式世界主義觀點的區隔,當教育部以至於台灣各大學越發在意期刊論文數和世界大學排名,這些判准對我們施加審判的效力便越發顯著²⁹;越是承認前段大學的象徵資本,也就越發顯露自身象徵資本的匱乏。這樣的理解,同樣也指出貝克式的世界主義觀點矛盾之處,畢竟教育體制點出「作為文化資本的世界主義觀點才看性的本質,亦即同時作為包容性的象徵,卻也同時是排他性建立的基礎。」(Igarashi and Saito, 2014, p.223)

(二)自身的經濟邏輯:將其視為文化場域的子場域

具體來說,什麼是文化資本的構面?可以單單以文化資本來思考嗎?以世界主義觀點在文化資本上發揮的形式,本研究認為可以將其定義為**廣泛文化場** 域裡的一個子場域。

前述 Igarashi 以及 Saito (2014) 研究立論的重要基礎之一,是 Weenink (2007, 2008) 的研究。他先是藉由對荷蘭既有的英語學制與荷語學制進行比較提出「世界主義資本 (cosmopolitan capital)」(Weenink, 2007),並藉由對英語學制的家長與學童進行深度訪談,來論證世界主義觀點能夠作為資本形式,且資本的傳遞能夠達成階級再生產的效果 (Weenink, 2008)。在 Weenink 的定義中,世界主義資本無非就是一種在「各種跨國社會競逐 (transnational social arenas)」中,能拔得先機、位居領先的能力:

世界主義資本是由各種能協助人自信地參與在這類 [有關世界性互動的] 競逐中,不同身體性及心智的傾向與(默會知識意涵上的)能力所組成。(ibid, p. 1092)

2

²⁹ 見 陳至中(2020年9月3日)。〈世界大學排名台38所入榜教部:深耕等計畫有成〉,《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30220.aspx

如是,Weenink 將世界主義素養的積累**獨立為一種特殊資本看待**;就此, Weenink 的定義便與前述 Igarashi 與 Saito 的定義有所區隔。實際上,後者認為 前者的定義過於籠統,傾向將世界主義觀點簡單地與文化資本掛鉤 (Igarashi and Saito, 2014)。這樣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文化資本構面的看法確實簡單而易於 明瞭,但卻也相對產生理論上的矛盾性:

正因為「資本」與「場域」在布赫迪厄的概念框架中相依而生,要討論世界主義觀點如何作為世界性的文化資本運作的問題,就不能不去討論如是定義的場域是如何被形塑的。(ibid, p. 225)

Igarashi 與 Saito 在引文中提到的框架,事實上反而點出兩人論點的問題。兩人的研究始終聚焦於世界主義觀點,或是廣義的世界主義素養如何被形構出經濟的結構;從未廣泛討論全球範圍內的人們,對整個文化領域有什麼樣共同的幻象,能致使他們在文化資本經濟上有可以討論的一致性(而這似乎也是研究實務上幾近難以窮盡的討論)。

如果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明,Igarashi 與 Saito (2014) 和 Weenink (2007, 2008) 在立論方式上的差異,可以藉音樂的文化資本來比擬。譬如,我們大致可以想像通曉古典樂是更有文化資本的行為,相較於爵士樂次之,敬陪末座的或許是流行音樂。但同時,這樣的排序是經過音樂場域的鬥爭後所產生的結果30——最早由古典音樂建立起場域的體制,接著再相對映照出缺乏體制內資本的流行音樂;而爵士樂則在興起後,藉由創作者不同的策略形塑出專殊性,獲得足夠象徵資本後,取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在最後,音樂場域中安頓好的階序,便體現在文化消費的區隔上,形塑出文化資本的高低差異31。

³⁰ 譬如 Lopes (2000) 藉布赫迪厄理論做的當代爵士研究,便指出相似的事實。

³¹ 若嚴格按照布赫迪厄的概念框架定義,則應進一步區分出文化生產場域跟文化消費場域,此處討論的文化資本與後者更加相關。在此,什麼樣的音樂消費更具象徵價值,體現在音樂消費行為的區分上;但一旦音樂本身的象徵價值提升,消費的象徵價值也更有機會連帶提升(譬如消費場所的改變)。前註所及的研究亦提出相同結論 (Lopes, 2000)。

布赫迪厄始終拒絕為場域理論作一種中層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式的明確定義(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而堅持場域的具體定義只能藉由不同實證場域提出,正如布赫迪厄自身描述:

每一個子場域都具有自身的邏輯、規則和常規,而在場域分割的每一個階段(譬如說文學創作的場域),都需要一種真正質的飛躍(譬如說你從文學場域的層次降至小說或戲劇的子場域的層次)。每一個場域都構成一個潛在開放的遊戲空間,其疆界是一些動態的界線,它們本身就是場域內鬥爭的關鍵。(同上引,頁167)

這裡所點出的是,在世界主義觀點的討論上,有必要將其視作子場域的運作,不能將其與更大範圍的文化資本等而視之。甚至可以說,忽視子場域等於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特殊場域鬥爭後的結果,而不能具體而為地對其進行分析——亦即,同意世界主義觀點作為文化資本的合法性,擱置在接軌國際的承諾中存而不論之處。更重要的是,僅僅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文化資本的構面,便無法辨明追求接軌國籍、追求世界主義觀點的人們,背後魅惑著的幻象為何。恰恰是要透過將其概念化成一獨立而特殊的資本形式,才能瞭解投入其中的場域中人所看重的「況味」,也才更有能力協助我們瞭解驅使貸款赴外交換學生行動的理由——亦即幻象的產生。

(三) 利害下的行動

最後,一旦定義出場域的範圍,便能藉此針對世界主義觀點做經濟邏輯的探討。譬如,以 Kim (2011)探討韓國學生選擇赴美深造的研究為例,這項研究同樣是 Igarashi and Saito (2014)立論的參照,且以參與式的世界主義所關照的東亞學生為研究對象,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這項研究針對 50 名赴美深造的韓國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羅列出學生選擇赴 美的不同動機,譬如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或在更好的學校進修等等。儘管不同的 動機看似變化多端,但在這些動機背後,形塑赴美深造的考量都並非出自這些看似可歸於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的動機,而是**如何在世界主義的宏觀上做出區隔**。對於這些學生來說,要能找到好的工作或想要有更好的學習,都不是實際針對不同工作或不同學校進行「強弱危機分析」,而是建立在認為「留在韓國唸書常被比擬為沒見過大風大浪、見識淺薄的人。但相對地,在美國唸書就被認為是見多識廣、見識廣博的人。」(Kim, 2011, p. 120) 這樣的想法上。

而在針對世界主義素養的研究裡,Cheng (2018)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相對獨特的關注點,也就是非菁英的學子如何接軌國際,而這可以做為 Kim (2011)的一種對照。Cheng 的研究透過對新加坡在地的私校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來探討相對缺乏出國深造資源的學子,會在哪些實踐上體現出屬於他們的世界主義觀點。研究指出,這些青年自有一套協商屬於自己的世界主義認同的方式,不同的實踐無論是全球在地化——試著積極參與國內接待外賓的機會,或是在地全球化——發揚自己通曉新加坡市井文化的一面來展現文化獨特性,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展現世界主義觀點,研究結果似乎相當樂觀。然而,正是在這些實踐中,點出了這些青年不知不覺中,不斷地將自身與具有豐厚國際經驗的菁英做比較,以厚植世界主義觀點的邏輯來規劃實踐,深深地陷入在場域的幻象當中。無論工作、對未來的想像,以至於生活模式的實踐上,都透露出了他們處在氣定神閒的對立面,在不同實踐中皆以世界主義觀點為看中的利害。

由這些案例所體現的,正是在動機的考量上,不能單就**利害的理性判斷**來想像,而要先瞭解到所謂的利害指的是**哪一種利害**。這樣的區別正像是布赫迪厄所比喻的,「一種是『取決於慣例』的行為,像是在走進會客室時應該要脫帽,另一種行為則是『邏輯推論』的結果,像是收購大量小麥」(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55)。

三、利害跨越場域的效應:策略的社會流動意涵

(一) 利害造就的不同策略:維持舊有利益等效果

若能將世界主義看作一種資本的形式,理當也能經過換匯,轉變成經濟資本或是文化資本,產生我們一般認知中的「利益」;而經濟、文化資本也能介入世界主義資本的積累。

甲、在類似的經濟條件下做不同選擇

首先,抱持世界主義觀點與否便會在實踐上產生差異。Weenink (2007)分析荷語學制與英語學制的差異時曾指出,傳統(經過一代以上世襲的)上層中產階級,往往傾向令自身後代入讀荷語學制中的菁英學校"gymnasium"(類似於英國社會的菁英預備學校);而有更多國際化經驗的新興中產階級,則傾向為後代選擇更加國際化的英語學制學校,也在身教、言教中傳遞世界主義思想,為後代準備更多的世界主義資本。儘管作為具有豐厚資源的世襲上層中產階級,客觀上同樣可以擁有豐厚的世界主義資本,但正因為在實踐中對於利害擺放的重點不一,便作成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乙、另闢蹊徑:在其他場域缺乏差異下凸顯自我的管道

而在 Börjesson 與 Broady (2016) 針對瑞典教育體制的研究中則指出,因為瑞典嚴格排除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介入教育的空間,高社會階層家庭往往會藉由將孩童送往海外來確保競爭的相對優勢,並進而產生階級複製。這便是在國內的文憑價值差異有限,無法有效影響文化資本稀缺性時,令子場域中的世界主義資本擁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成為突顯區隔的王牌。

丙、再換匯手段

另一則同樣來自瑞典的研究,則間接回應了另闢蹊徑的手段。Lindell 與

Danielsson (2017) 指出,正因為世界主義資本可以來自媒體觀看等文化資本會帶來差異的管道,在世界主義資本逐漸取得優勢地位的同時,具有高度文化資本的優勢階級,依然可以仰賴世界主義資本的相對可近性來維繫自身地位。這種手法被布赫迪厄稱為「再換匯 (reconversion)」,正如他所指出的:「在階級社會發生變革時,人只能夠透過改變來維繫[自身地位]。」(Bourdieu, 1979/1984, p.157)這發生在某種資本的定義(或說成功的定義)發生劇烈變化時,透過其他不同形式資本的高度儲量,來確保自己能快速取得新定義下的資本。這樣的情形較常發生在整體社會結構有較大變動的時代,如果要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子,或許就像是台灣早期土地改革時,有些中小地主因為沒有看出股票未來的價值,在草草出清後便引來家道中落;卻也有具備足夠眼光(文化資本)的地主,搖身一變成了新時代的資本家。

(二) 小結: 世界主義觀點的競逐是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

經濟權力首先是一種遠離經濟需求的權力 (Bourdieu, 1979/1984, p. 55)

——〈文化的貴族〉(《區判》)

透過針對這些策略所做出的不同分析看來,世界主義觀點只要經過適當的換匯,理當也有不同的好處可以期待,那為什麼接軌國際並非穩賺不賠?若看向個人的整體客觀條件,便會發現獲利的機會並非對每一個人敞開。

事實上在以上這些案例中會發現,世界主義資本的分配上,往往複製了以 經濟資本衡量的固有階級結構。不僅因為要取得足量的世界主義資本要求著一 定程度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也因為不同經濟/文化/社會資本影響下換 得的世界主義資本並不等值,實際上就是有些地點比較具有世界主義的宏觀。

世界主義觀點誕生自社會變遷過程中相對的「新遊戲」,新遊戲往往可以為 人帶來新的機會,卻也同樣可能帶來限制。而在社會流動的研究中,有許多類 似的例子可以參考,譬如翁康容、謝雨生(2018)的研究便指出,在生命事件 (意指就學、結婚、生子等傳統人生印象的事件)發生年齡普遍後推的時代,來自高社會階層的男性,有更充裕的時間彈性地向成人轉銜,能有更多發揮空間;而低社會階層的女性,則往往維持舊有、較短促的生命歷程,加深了自身的相對弱勢。而在名為《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的研究中,李易駿、古允文(2007)針對 Yo-yo 族(意指較晚進入職場,或介就業年齡依然從事非典型、非正職工作的青年人)的現象進行研究,並指出這樣的現象來自勞動市場限制及就業方式的彈性化;而在兩項因素影響下,一方面提供家庭資源充足者更彈性的選擇,卻相對令家庭資源不足者被迫走入次等的勞動條件中。

這似乎都呼應了布赫迪厄在場域分析中指出的,「一般而言,擁有最豐富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人,是第一批選擇新位置的人(這提議似乎在所有場域,不管是經濟和科學場域中,都獲得證實)」(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397)。正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承擔風險,有足夠的文化資本瞭解時局,也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將他們引向機會。

第三節 佔位一策略的生成:如何對實踐進行分析

行動者的秉性(他們由社會軌跡所形塑的慣習)和其在場域——一個位置所構成、由一種特殊形式資本的分佈所定義的場域——中的位置交會之下,佔位應運而生。(Bourdieu, 1983, p. 311)

——〈文化生產場域——或,經濟世界的倒置〉

若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幻象中的利害,並將這種逐利行為視為場域中的遊戲,包括貸款赴外交換學生在內的這些場域中人會如何行動?本節藉布赫迪厄的「策略 (stratégie [strategy])」與「佔位 (prises de position [position-taking])」概念,說明社會軌跡等客觀條件可以如何詮釋學生們的實踐緣由。藉此也說明緒論中廣狹兩種「動機」如何同時發揮作用,從所謂抱負走向策略本身。

一、作為策略與佔位的實踐

(一)以「策略」理解實踐

在緒論的引文中提到,接軌國際的實踐來自於對「勇敢」的發掘,而從《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到世界主義觀點,也都明示或暗示著接軌國際與否,實是取決於個人的心態。這種心遠地自偏式的想法當然十分樂觀,但也正如前文不斷指出的,這種樂觀源自於對客觀條件的忽視。而這種唯心的理解也阻礙了對其進行客觀分析的努力。但如果說將實踐貶為社會結構下的傀儡,視之為意識形態中介下的純粹產物,無非又太藐視人們的主體性,且無時不刻都將遇到需要額外解釋的種種例外。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布赫迪厄建立在場域與資本等概念下的行動觀點,正因 為它提供了一種非此非彼的選擇:

策略的概念可以令我們與客觀主義觀點,及結構主義(譬如透過無意識這樣的概念)所假設的那種缺乏能動性的行動進行決裂。此外,就算不將策略視為無意識過程的產物,我們也不必將它歸於一種有意識且理性的計算。它可以是一種特定社會遊戲中實作感的產物。

.

優秀玩家採取的行動,可說是最自由也是最受限的。他讓自己順其自然地出現在球的落點,就好像是球在控制他一樣。但也藉此,他控制了球。(Bourdieu and Lamaison, 1986, p. 112)

場域中積累的實作感)。而正因為越是照著場域的要求越能玩出好的成績,而越是優秀的玩家越是在生活中積累了更多順應場域的實作感,他們便總是能做出更好的實踐。在此,布赫迪厄用「策略」一詞來做描述,正是希望在保留主體性的同時,強調實踐發生在劃定的場域中,並且源自於場域的遊戲方式。

前文不斷提到「逐利」、「競逐」等說法,其中的「逐」字似乎暗示了行動者的主動性。但從策略的說法來看,一如前文所描述「邏輯推論」與「取決於慣例」之間的差異,所謂看中利害的逐利其實是發生在無形之中,是由一個人的實作感所自然帶出的,如布赫迪厄所自陳:

我所言及的策略,指的是客觀地指向目標的行動,而這些目標不見得是主觀追求下的目標。而慣習的理論意在探索一種實踐科學的可能性,其有望逃離目的論與機械論的二元選擇。(……儘管如此,社會學依然不能忽略利益原則,這項原則應該被理解成對於利害的特定投入[specific investment],而這不僅是作為場域一員的條件,也是作為場域一員帶來的效應。)(Bourdieu, 1992/1993, p. 76)

也因此,利害、資本的概念一方面可以是協助概念化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卻不應直接理解為場域中人有意識地追求的目標。實際上,人們僅僅是基於他們擁有的世界觀,在每一刻中做出他們覺得最順其自然的實踐。

或許最重要的是,正因為實作感產生自遊戲的遊玩當中(無論是廣義的鉅觀社會結構或是特定場域的內在必然性),實作感始終受到遊戲的景況所調控、受到在遊戲中的客觀位置所影響。正因為這樣的客觀位置分配——無論是比喻中在球場的位置,或是一名行動者在廣義社會中的階級位置——繫於不同資本的含量,也因此無可避免地不是公平的。這也正是 Calhoun (2008) 在批判世界主義觀點時所指出,各種形式的資本得要納入考量的原因。布赫迪厄提到:

畢竟人們只需要讓他們的*慣習*順著直覺走,就會合於場域的內在必然性 並滿足其中的各種要求(其實也就是每個場域中對卓越的定義),他們 一點都不會察覺到他們正在履行一件義務,更不會去想著要最大化他們的(特定)獲益。但也因此他們可以自詡為大公無私,並預期其他人也會這樣看待他們,這部分則是額外的獲益。(Bourdieu, 1992/1993, p. 76)

就是因為實作感如此不假思索,往往令我們忽略背後的客觀條件。而忽略背後客觀條件並且順勢順應場域內在必然性時,我們便也產生了場域的幻象。

(二)實作感的由來:社會軌跡形塑了什麼?

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依然可以說有些人正因為更勇敢,所以勇於踏出舒適圈,勇於面對無盡的挑戰(或說勇於讓自己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如同貸款作為投資帶來的風險)。但重要的是,無論是勇敢或是其它不同的心態,其實都來自於這些人不同的實作感。

如同先前提到的,實作感來自生活中的積累,也因此某些人的生活遭遇會讓他們富有勇於挑戰的秉性,有些人則否。前一小節提到了「慣習 (habitus)」一詞,正如字面上可以推斷的,慣習就是一個人實作感的總稱。回應緒論中提到的「生活之風格化」,慣習是基於客觀處境,在長久生活後所沈澱下來的行為傾向,可以說是秉性的系統。就此,我們也可以說慣習就是銘刻在身體上的社會,讓身體有辦法產出銘刻在遊戲中的無限種可能作為。正如布赫迪厄所言:

這種歷史的重新演繹可說是慣習的作為,而慣習即是歷史性吸收學習的產物,慣習使我們得以檢視和運用歷史的產物 (Bourdieu, 1981, p. 305)

從中會發現,個人/社會歷史與實踐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就蘊含在慣習中。反 過來說,我們也可以透過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來理解其實作傾向的由來。

(三) 兩個歷史的交會: 從策略到佔位

最後,將策略以場域位置的觀點看待,便形成布赫迪厄所謂的佔位概念。 佔位的定義,照布赫迪厄重複使用的說法,首先是「兩個歷史的交會 (la rencontre de deux histoires [the meeting of two histories])」(Bourdieu, 1981, 1983)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個人的歷史亦即慣習,與場域歷史的交會。

如同前一小段提到的,慣習——亦即人們的實踐傾向——是在生活中因為不同的客觀需求、客觀處境所形塑,這也造就了生活中看到不同的階級再生產案例。當生處在特定階級(或社會空間)位置時,人們的慣習不但更習慣這個位置會有的不同遭遇,也讓我們打從心底更融入這個社會或場域中的位置。布赫迪厄在討論時,引述了沙特(Jean-Paul Sartre)同樣談論實踐的論述,藉此指出我們對實踐開放性的誤認:

就算我達成咖啡侍者的功能也是徒然。我不過在一個中性的模式下是他,就像一名演員是哈姆雷特那般,我不過是機械化地在我的狀態下做出*合理的動作*。我只不過是將自身想做一個想像中的咖啡侍者,來「模仿」出那些動作。(Sartre, 1943; as cited in Bourdieu, 1981, p.310)

沙特認為,咖啡侍者有所有的機會選擇放下工作,去追尋其它更自由、更富自 我實現意義的可能,這是回應其哲學中所謂虛無中之自由的概念。對此,布赫 迪厄形容沙特想像的行動者,「是一個哲學家腦袋裝在侍者身上的怪獸。」 (Bourdieu, 1981, p. 310) 與沙特相反地,他認為這些服務生的應對進退,恰恰是 來自成長過程中形塑的慣習,也是這些慣習令他們選擇並適應於這個位置。而 這也是佔位字面上所顯示的,我們如何主動地佔據、並活化這個位置。

這其實回應了前文提到「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的對比,藉此解釋就算存在位置上的流動可能,也只有在行動者的生命歷程能恰好配合時會發生。在同樣的場域景況下,某些在生命歷程中培養出患難傾向的行動者(因為無後顧之憂,所以被鼓勵多方嘗試的行動者),可能採取更激進的策略,進而獲得好壞差異更大的場域位置(或廣義上的社會位置),這讓他們在機率上更有可能爬到更高的位置——畢竟就算位置沒有改善,他們也有更多的機會重新嘗試。

無獨有偶地, Igarashi 及 Saito (2014)的研究中也指出,最有機會在實踐中積累世界主義素養的,便是上一代對異國文化抱持開放態度,甚至固定有跨國互動的人。他們藉由耳濡目染建立起了世界主義者的實踐傾向,令他們在接軌國際的實踐中如魚得水,做出最符合場域要求的實踐。這兩者都是慣習與場域位置交會的最好例證,也說明了「勇敢地出走」的社會再生產條件。

在幻象的作用下,行動者們無不致力於維繫或提升自身場域位置,所謂兩個歷史的交會,正是演繹行動者們如何仰賴自身慣習,在面對歷史造就的場域規則中,產出最好的策略、玩出最好的結果。而實踐看來無限的可能性,便是由這兩個歷史共同劃出範圍。

二、結構性限制下生成的實踐

一旦瞭解到佔位是由慣習內在的秉性生成其策略,並依照場域競逐邏輯產生效果,儘管非以機械論看待實踐,也能以社會軌跡、客觀位置(資本存量),以至於場域中的規則等結構性限制 (structural constraints) 來判斷行動者的實踐從何而來。

(一) 佔位的運作: 以多元入學政策為例

以一個實際的實踐來說明,可以看向我國高中多元入學政策對學子升學選 擇的影響。陳建州與劉正(2004)的研究指出,

家長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及「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者,其子女會選擇(或被選擇)參加推薦甄試的方式並成功升上公立高中的機會,相對於家長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無顯著的差異。但家長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及「研究所」者,其子女會選擇(或被選擇)參加推薦甄試的方式並成功升上公立高中的機會,相對於家長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有顯著的優勢。(頁 137)

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家長,對於不同的 升學管道有較高的敏感度,也會花費更多心思在子女的升學策略上。

此外,學子本身在實踐中也並非全然被動的角色,譬如研究者在訪談中就發現,身處資優班或普通班的不同學生³²,會因為接受到的資訊有所差異(學校往往花費更多心力為資優班學生提供多元入學資訊),以及同儕間對於多元入學管道的討論熱度,致使對考試、直升以外的入學管道有志向上的高低落差。 遑論成績較落後的學生,因為客觀上要面對更大的課業壓力,導致他們根本無暇關注考試以外的訊息。

這樣的研究就顯示出:一方面,家長的文化資本所帶來,積極瞭解教育制度的傾向會發揮作用,進而間接產生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二方面,這樣的結果也來自社會軌跡形塑的慣習,一個客觀上對教育制度有更多關注的學生,更有機會發展出會另闢蹊徑的秉性,並在學業能力相仿的同學中脫穎而出;最後,正因為不同位置更適合特定秉性的行動者,資優班的學生便更有機會在往後繼續發展出走向良好位置的秉性,並藉這樣的慣習實際上維繫或走向更好的位置。另外,資優班或承繼了較高文化資本的學生,經由其慣習自然而然地投入了多元入學方案的競爭,便產生了對多元入學制度的利害關注一一亦即幻象;但這些競爭對其他學生來說,似乎就毫無利害可言,甚至可說不屑一顧。而這樣的例子,似乎也能類比緒論中所提到的那些傳統名校或私校高中生,以及他們選擇海外名校的趨勢。

(二)由可能性來分析接軌國際

按照這樣的做法,並整合前文所及的不同理論概念,在分析貸款赴外交換的實踐時,可以先從接軌國際的各種可能中建構出意義,並交互地關注社會軌

³² 該研究指出,「雖然教育部規定不得有能力分班的做法,但資優班仍是存在的,有些以「數理資優」為名,有些以「才藝資優」為名,但大多數仍以課業成績為資格的標準。」(陳建州、劉正,2004,頁134)

跡與實踐本身來探知「動機」——實踐的客觀緣由。

為什麼是選擇貸款赴外交換,而不是客觀上能有的其它選項?——無論是 打工度假或貸款留學等等同樣服務於接軌國際的作法。從場域的角度來看,佔 位所能帶來的效果,實是在與其它可能實踐的對比下建立的 (Bourdieu, 1983)。 正如同就讀排名第一的學校之所以有優勢,是其它排不上名的學校所烘托出來 的;要瞭解佔位的意義,便需要從場域的觀點來判斷它與其他佔位可能間的關 係,正如同世界主義觀點下的世界大學排名造就的差異。

與此同時,研究也不能將實踐按其樣貌視為鐵板一塊,「貸款赴外交換」僅 僅是研究者所劃定的研究範圍,並非這些實踐者本身或是場域觀點賦予意義的 範疇。能夠被透過以上種種理論概念分析的,只有做出的實踐本身——亦即構 成交換事前、期間與事後的種種實際行動。也因此,恰恰是要在分析出原因 後,才能依照這些原因去判斷,是否能在所有的貸款交換者身上歸納出具有一 致性的「動機」因素。從這個層面來看,不僅要細細考究這些學生做了什麼, 也要思考在每一個行動座落在什麼其他可能之中。

回過頭來,這些選擇也會在這些學生的慣習中被解釋,而這就仰賴對每一個時間點之社會軌跡的理解——這個行為來自於怎樣的慣習?那樣的慣習來自於什麼樣的生命經歷?而擁有的資本和試圖累積的資本,則是分析時能使用的工具,協助我們概念化這些學生的狀態,將其以廣泛社會及特定場域運作的邏輯客觀化。與此同時,也將從這些客觀化的分析中,判讀他們對利害的投入以及投入的緣由,藉以理解幻象的產生。

第四節 研究方法

若要「由可能性來分析接軌國際」,並且細細地考究實踐本身,便需要種種不設前提的資料來協助。也因此,本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以深度訪談法獲取資料。

一、研究途徑——深度訪談法

(一)深度訪談法所避免的先入為主

為了瞭解形成抱負的理由,並對策略的形成進行分析,本研究將採用深度 訪談的方式搜集分析資料。深度訪談法的優勢,在於其**由受訪者推動訪問的彈** 性。儘管訪談本身一定程度受限於訪綱的擬定,然而受訪者回答的內容與方 式,則能夠進一步提供追問的線索,有機會形成富受訪者主觀詮釋的資料搜 集。吳嘉苓(2012)就提到,深度訪談注重受訪者對於意義的建構方式,並可 以探知賦予意義的變動性與情境性。

深度訪談法在這方面的長處,可以回應到布赫迪厄所謂的「生成式結構主義(generative structuralism)」思維(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儘管獲取的資料在後續分析中受研究者分析,但藉由拒絕對研究資料預先的錯誤化約,便能避免研究者主觀假設造就的「學究謬誤(scholastic fallacy)」33(同上引)。舉例來說,Steven Threadgold (2018)在研究青年求職活動時,便指出曾參與龐克 DIY 場域的行動者,在這些實踐中建立起的世界觀往往流用於求職中,進而展現與其他求職者不同的企圖心。也就是

^{33 「}說起來,這種謬誤就表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評之中:『將邏輯的事物錯當成事物的邏輯。』……用這種視角解釋出來的行動者,不是別的,只是學究本人的一種虛構投射罷了,即在行動主體 (acting subject) 裡面投射了一個認知主體 (knowing subject)。這是一頭怪物,它有著行動者的身體,裡面安裝著思想者的腦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94) 這樣的學究,布赫迪厄認為存在主義思維的沙特在前文提到的想法,就是很好的典範 (Bourdieu, 1981)。

說,一名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的幻象,實有可能產生交互性的影響(或說這樣的社會軌跡形成了意料之外的慣習)。在此,深度訪談法便為這些不可預期的內容,預留了豐富的彈性。

(二)對實踐本身的重視

在過去對國際交換動機進行的研究,往往將實踐當成鐵板一塊,並未對實踐的細節一一探討。諸如莊春暖(2013)、陳麗安(2019)以問卷統計方式進行的研究,不僅有相較深度訪談更難打破的框架;更重要的是,獲得的資料對部分決定性因素缺乏解釋力,誠如陳麗安(同上引)所言,儘管研究結果可以應證研究者假設的交換動機,但「無法排除其他項目如:個人特質、就讀學校、家庭教育背景、工作經驗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頁 46)

實際上,實踐的佔位意義仰賴對實踐內容——無論是牽涉的資本交換,或是特定舉措的慣習意義——的詳加分析,而這些資料的搜集都高度仰賴深度訪談法的使用。

(三) 訪綱擬定的準則

最後,要能夠在對受訪者言談保持開放性的情況下,同時維持研究的客觀性,根據其過往執行人類學研究的經驗,布赫迪厄提到:

向報導人 [informant] 提問時,不可避免也是要求他們採用一種準科學式的態度應答。而從這些提問中得到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是由不同既有傳統中匯集來的知識形成的一種混合物。而這些傳統——除非是機械式的再製——往往是在慣習的基模下、在這個基模所*臨時做出*的再現裡,經過選摘且常常經過二度詮釋而成。

(Bourdieu, 1972/1977, p. 98)

此處所突顯出的是,從受訪者口中獲得的資料不可能是不帶任何色彩的「原始

資料 (raw data)」,受訪者同樣是在慣習的影響下做出回應。譬如,當詢問有關世界主義觀點的看法時,並不能直接假設不同受訪者吐露出的資料,皆是受到完全一致、毫無差別的幻象驅使而成,尚且還會依照提問方式產生差異。

實際上,在分析時有必要嚴謹地將經由社會軌跡所辨識出的慣習,與受訪者的回應內容建立連結,來辨別資料代表的客觀意涵。布赫迪厄始終對阿圖塞式 (Althusserian) 的意識形態分析頗有微詞,他強調意識形態帶來的並非是一體適用的影響(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如果將所有的研究對象過度單一化,譬如直接假設他們受到一種「時代精神」的感召(Bourdieu,1983; 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270),就會減損研究的客觀性。

當譬如陳麗安(2019)的研究,預先假設了交換實踐對往後求職兩者間的關係,預先將交換動機視作是看中人力資本積累下的產物,所探得的動機就僅僅會在人力資本積累的面向上有所差異。也因此,以世界主義觀點為名構成訪綱,必須要能夠保留個別受訪者的個別理解空間,而非單單像譬如問卷研究常常做的,形成特定價值觀的條件反射。

最後,針對各項資本的定義,訪談大綱參考布赫迪厄在《學術人》("Homo Academicus")(李沅珈譯,2019/Bourdieu,1984)中,以及第二章第二節中所提及 Börjesson 與 Broady (2016)的作法,將父母職業納為承繼之文化、經濟資本的判準之一。此外,參酌 Igarashi 及 Saito (2014)的研究,將家中成員的跨國關係納入重要的訪談面向,並考量受訪者的文化商品消費習慣。另外,部分有關世界主義觀點的題綱,發展自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8第七期第四次:全球與文化組〉(傅仰止,2019)。

二、研究說明

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是曾參與校內交換計畫並以貸款方式支應期間開支 的大專院校學生。由於不同社會軌跡所帶來的影響亦為本研究所關注重點,在 訪談對象的選擇上並未限制科系,並涵括包括研究所的不同高等教育學制。

赴外交換學生的定義為,以交換學生 (exchange student) 為名義,前往與原就讀學校存有交換協議的國際姐妹校就讀,並停留一學期以上的國內學生。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其他形式的短期進修或私人遊學行程長短不一,且實踐規劃方面的自主性較低,並未納入本研究考量範圍。以貸款支應期間開支的定義為,旅外期間開銷其部分來自任何形式之銀行借貸。在訪談對象的挑選上,並未侷限是否有其他經濟來源支應相關開支。

在對象的蒐集上,為避免交換後的社會軌跡對慣習及相應而生的幻象產生 過多影響,主要以一年內學成歸國者為主。惟因 2020 年全球受 COVID-19 疫情 影響,致赴外學生銳減,或成行但在外交換生活受影響,故將對象蒐集跨大到 107 學年度下學期(含)以後參與交換計畫者。另外,礙於研究母體數據涉及 個人隱私資訊取得困難,無法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本研究主要藉各學生社群 平台公開資訊方式招募自願樣本。招募來源如下:

engchi V

(一)電子佈告欄「批踢踢實業坊」相關看板

批踢踢實業坊 (ptt.cc) 是流量最大的大專院校電子佈告欄 (BBS),其中將以其上相關主題看板「留學版 (studyaboard)」、「研究所版 (graduate)」為主要散佈目標。由於沒有交換學生的相關專版,交換學生相關資訊也會在「留學版」討論;另外,儘管亦有其他以不同學制為名的看板,惟大多使用率低下,故僅納入「研究所版」。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在2018年9月1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間,該站點 曾經停止帳號註冊,肇因於「浮濫註冊情況日趨嚴重」(鄺郁庭,2020年3月4 日)。而在重新開放帳號註冊後,目前僅開放擁有國立台灣大學信箱的帳號申請 (批踢踢實業坊為台大學生設立,且伺服器架設在台大學術網路下)。但如上所 述,不僅在招募志願者時將注重多樣性,且尚有其它管道招募志願者,故依然 可以避免人數不足或抽樣偏誤的狀況產生。

(二) 社群網站 Dcard 相關看板

Dcard (https://www.dcard.tw/) 則是同樣面向大專院校學生的資訊、社群平台中,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後起之秀:「相較於 1995 年推出的 PTT,在年輕世代的大學生裡,Dcard 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每月不重覆訪客超過 1,500 萬人,用戶分享的熱門文章經常被大眾媒體引用,每月吸引過 15 億次瀏覽量」(孫文彬,2020 年 4 月 16 日)也因此,在搜集大專院校的志願者時,批踢踢與 Dcard 兩者應能發揮相當好的互補作用。與批踢踢相似的,儘管沒有專屬交換學生的看版,但大部分相關資訊會在「留學版」中討論,另外亦有論題相對廣泛且海納各校各級學生的「閒聊版」,故主要以此二看板為主要散佈目標。

(三) 社群網站 facebook 相關社團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INC) 研究,知名社群網站 facebook 依然是目前全台使用率最高的社群平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 其中人數最多的相關社團為「留遊學生交換學生交流園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XCHANGEHIGHSCHOOL/)。此外,亦納入「台灣歐洲交換學生 Taiwanese Exchange Students in Europe」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8048249394045/) 為散佈目標,在各地區中 唯歐洲有人數達千人以上的交換學生社團。

(四)受訪者描述

最後,本研究根據以上原則及招募來源,總共募得八名受訪者進行訪談, 基本資料如表 3-1 所示。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目的國家分佈大致符合前文討論,卻沒有第三大目的國美國出現。可能的解釋是,多數美國學校不像其他目的學校一樣,只需支付國內學雜費,尚須另外支付一筆當地學費且多所費不貲。這可能是這些目的地——特別是對需要貸款的學生來說——較不受青睞的原因。

表 3-1:受訪者基本資料34

		TAT X	1	
編號	赴外當時學級	貸款方式目的地	日的抽	訪問時間
			ППУЛЕ	(mm/dd/yy)
A	大眾傳播學群碩士	挪用 就學貸款	中國	11/24/20
В	管理學群大三	挪用 打工度假信貸	斯洛伐克	12/14/20
С	法政學群大三	挪用 就學貸款	中國	12/28/20
D	大眾傳播學群大三	教育部海外 生活體驗貸款	韓國	01/06/21
Е	外語學群大四	挪用 就學貸款	辑图 日本	01/06/21
F	外語學群大三	雙親 勞工貸款	日本	01/12/21
G	工程學群大三	家中房貸增貸	瑞典	01/17/21
Н	工程學群大三	挪用 就學貸款	捷克	03/1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³⁴ 由於就本研究分析而言,並未在各部分發現受訪者性別具顯著性,故不在此表列。另,本文中出現的所有第三人稱代名詞,無論指涉性別為何,皆使用中性的「他」字表示。

第參章 被輕忽的巧合:隱性共謀的基礎

有人會說的「進入人生」,就是願意進入其中一種在社會上被認可的社會遊戲,並且願意進行這種既是經濟層面也是心理層面的起始**投資**,才能參與那些組成了社會世界的**嚴肅遊戲**。(Bourdieu, 1992 / 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 2016,頁 42)

一一皮耶·布赫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提出了幾種鼓吹接軌國際的說法,或許可以將它們稱 之為一種名為「勇敢地出走」的**言說**。若要說這些說法之間存在著什麼關聯性 的話,那便是他們都熱切地以個人主義的觀點提倡出走,將之視為一種個人範 圍內的**選擇**,並形容為一種自我超越的嘗試。藉此所點出的,是我們將要進行 分析的第一個切入點,而那也是我們早已提出的大哉問:「每一個出走的案例都 是學生們充滿個人色彩的選擇」嗎?或者換一個說法提問:這些個別的個人選 擇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的**內在必然性**嗎?

按照勇敢出走的種種事蹟所描繪,「出走」是一種創造性的超能力,是一種個人能動性的展現,它被形容成像是活力充沛地在一面純白的畫布上揮灑。但相反地,根據第貳章討論所發現的卻是,這一切的實現與否,都遷就於一個人的社會設定是否符合要求。

因此,起碼我們有義務為創作的畫布與畫材等,建立起完整的產銷履歷。

第一節 潛在的同形對應關係

(一)出身背景上的相仿:對受訪對象的初步描述

實踐的枝枒是從何萌生的?猛然一看,恰似回應沙特的侍者比喻,不同的 受訪者就像被拋擲進存有一般,在無情的絕對開放性之下,靠著某個時刻的靈 光乍現,做出和其他同儕有所不同的選擇,進而走上了貸款赴外交換的道路。 被問到選擇出國交換的原因,其中一位受訪者這樣說:

那時候跟大學老師打個招呼說我上了研究所了——就是跟老師聊聊天 ——當時就有一個老師跟我們講,你進研究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把 英文弄好、第二程式語言,第三去交換。

其實這個老師對我來說,在我心中的份量沒那麼重……只是一個禮貌性去跟老師打聲招呼而已,僅此而已。不過其實他那句話我是記得的,當初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他跟我講這個東西,有播種一個種子在我那邊。我不知道那個種子是不是來自於他,但確實有這段。

然後接下來在研究所期間,好像是碩一下吧?我那時候就是剛好坐在那個自己租屋處裡面…… [平時看到] 系所裡面會有很多陸生,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去、好像可以有一些交流。然後某一天我就突然覺得,我不應該只待在這裡——就是那個小房間嘛,就是租屋的房子——我就覺得我不應該待在這裡,覺得我應該要出去。(受訪者A)

正如同這段引文中受訪者 A 所描述的經驗,這樣的決定可能迸發自經歷的隨機性,也可能來自於想法上突如其來的斷裂,從而便產生了與當下生活決裂的慾望。無獨有偶地,受訪者 G 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說法:

因為我想要——這其實有點久遠——因為我的個性不太適合台灣的教育系統,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出國唸書。可是出國唸書就算你是獎學金,但是機票啊那些我們家還是付不出來,所以我就放棄、就繼續臺灣的升學系統。那唯一剩下可以出國的,就是交換。

.

我就是很吵吧、很有想法,然後我都會直接講出來,所以老師會覺得 我比較討厭……我每一個階段都會有老師針對我。(受訪者G) 天生反對權威、直言不諱的他,自幼便與國內相對保守的教育體制多有衝突, 在偶然間得知了歐美國家教育體制的相對自由後,種下了遠走海外的念頭。

也確實,綜觀本研究訪談的受訪者,從廣義的文組到理組,再從狹義的傳播學群到外語學群,這些不同群體在校園中遭逢的生命經驗,以至於專業旨趣上對於出走國際的想像,直觀想來並無特別值得一提、可能具有具顯著性的相似性。拿受訪者 D 的經驗來說:

主要因為我唸 [這間學校的] 這個系的話, [課程安排上] 可能到大三、大四才會學到比較多專業、實務上的東西,那我就會覺得說,這樣未來就業是不是不夠?是不是跟別人比起來的話,還要再多準備一些能夠給人家看的東西? (受訪者 D)

他有感於就讀科系難以提供完整的專業技能,便決定以交換作為替自身加值的 方式,這並非舉世皆然的一種遭遇。

這些分別做出的選擇,真是如此地從虛無中誕生嗎?這些決定之間並沒有任何關聯性嗎?事實上,若往前溯源至這些受訪者的出身背景,便能開始發現到一些幽微的相似性。一方面,他們的父母大多從事勞力密集的職業,或是以自營的小型實業維生,普遍學歷則以高職、專科為主。相應地,在這些受訪者的自述中都能發現到,源自於父母工作的型態,以及這些父母對學校課業的相對陌生,大多數家庭都是採取放任的管教方式。另一方面,沿著成長軌跡來看,他們卻也大多能在這樣相對平庸的社經背景下,取得中等以上的學業表現、順利進入公立中學,再往國立或私立前段的大學就讀。

最後,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相似性是,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第一批有機 會進入大學的家庭成員。在他們的自述中,這樣的背景一方面強化了他們為自 己積累文化資本(或說更實際地,應被描述為前文所提過的一種「人力資本」) 的決心,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他們規劃往後人生進路時的彈性:比起第二代以 後的大學生,他們往往將現實經濟考量放於更多的發展可能性之前,而這部分

(二) 同形對應關係:資本配置的意涵

前文曾經提到,在不同的社會遊戲中,倘若先不論特定行動者的特殊資本 存量,則三種最基本的資本形式便限定著(也奠基了)行動者能做及會想做的 策略(就像是進入一局遊戲的開局狀態一樣)。也就是說,相似的出身背景(社 會性開局狀態的給定)確實有可能影響著他們在未來的行動。若藉由父母雙方 的教育程度定義承繼的文化資本,並以雙親從事的職業類別定義來定義承繼經 濟資本,這些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可以歸納出表 4-135

承繼的文化資本 承繼的經濟資本 編號 (父、母學歷) (父、母職業) 共同經營 Α 皆為高職畢 小型印刷業 共同經營 В 皆為高職畢 小型實業 共同經營 C皆為高職畢 小型店舗 hengchi

表 4-1: 受訪者資本配置概覽36

³⁵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社會資本之所以並未在此處被討論是因為,一方面,社會資本較常是一個中介變項也較難被量化,故往往難以在社會位置空間的圖像中顯明,也因此無法歸納進前述的討論中;另一方面,儘管社會資本可能會一定程度地影響世界主義場域的幻象構成與實踐實務(譬如旅居海外的親友為其帶來吸引人的海外印象,或提供跨國資訊、經濟上的資助),但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的家庭並未擁有任何與海外連結的社會關係存在,故並無可供進一步分析之處。只能說,相較於社會資本優渥者,他們並沒有能夠錦上添花的關係存在。最後,根據劉若蘭與林大森(2012)的研究,以國內的狀況來說,社會資本對於大學生的生命歷程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³⁶ 因較少統計方面的介入,本研究無法像正統布赫迪厄研究一般,對比社會母體狀況、計算量 化的數值指標 (index),來定義各項資本的百分比位置。在此,本研究暫以描述性方式呈現他們 繼承的資本配置。

表 4-1 (續)

編號	承繼的文化資本	承繼的經濟資本	
	(父、母學歷)	(父、母職業)	
А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百ल向峨華	小型印刷業	
В	比为之政用	共同經營	
	皆為高職畢	小型實業	
С		共同經營	
	皆為高職畢	小型店舖	
D	父:高職畢	父:保全	
	母:大學畢	母:業務	
Г	父:專科畢	父:零工→計程車	
Е	母:高中畢	母:工廠工人	
F	皆為高職畢	父:白領受雇職員	
		母:白領受雇職員	
G	皆為高職畢	父:白領受雇職員→零工→技術工人	
		母:褓姆	
**	皆為高職畢	父:零工	
Н		母:會計事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僅管家戶所得或是雙親各自的年薪等資料難以取得——大多受訪者不願或無法明確告知——但藉由參考綜合了不同參數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黃毅志,2003),我們可以略以社經地位的第等,發現這些家庭的經濟資本存量會集中在五等分中的二、三等間³⁷。而相近的教育程度同樣意味著相似的文化資本存量。

典型的布赫迪厄研究中,時常會藉由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存量及比例,

37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部分父母職業難以完全套入此量表中。首先,部分父母是自營小型實業

者,由於他們都以特定技術傾向為主、未僱有員工,加上並未掌握產權等生產資料,將其歸於第三等中。另外,對比受訪者的描述,以零工謀生的幾位父母,其薪資水準並不似「生產體力

來描繪出不同個體在社會場域中的分佈狀況,並將個別位置稱為**社會空間位** 置。社會空間位置的意義在於,它能藉由資本配置的相近性,來歸納出不同的 社會群體。而這樣的社會群體歸類方式,在許多不同場域中都能產生具有顯著 性的**對應關係** (Bourdieu, 1979/1984):

簡單來說,如果「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統治階層裡的每一個次集合都有自己專屬的藝術家及哲學家、報刊與評論——就像他們都有各自的髮型師、室內裝潢師與裁縫師;又或是,如果像藝術家往往會說的那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市場」,風格再怎麼邊緣的畫作最終都能找到買主,這並不是什麼刻意為之的結果,這不過就是兩個基於差異的系統產生交會罷了。(Bourdieu, 1979/1984, pp. 231-232)

布赫迪厄將這樣的現象稱為「同形對應 (homology [homologie])」關係。他認為在不同的社會遊戲(亦即不同場域)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分佈位置時常是高度的趨同。換句話說,不同群體在特定場域空間裡所佔據的位置,彼此之間的相對關係時常與其它場域的樣態有所關聯——甚至重疊。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他在調查職業類別與消遣娛樂間的關係時,便發現消遣上的品味與個別職業類別(以及階層位置)有著高度的正相關性。布赫迪厄之所以看重不同形式的資本及其存量,正是因為想藉此瞭解社會的階層化是否源於這多重因素的影響。而這些不同場域中的同形對應狀態,一方面穩固了階級結構,另一方面也建立起階級結構的合法性。

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一方面這些家庭在社會空間中佔據著相鄰的位置; 另一方面,當他們在一個世界主義實踐場域中,因為相同的實踐做法帶來相鄰 的座標時,便指出了兩個場域間同形對應關係存在的可能性。

這層關係如果確實存在,最容易被預期的理由之一,或許在於以貸款者作為研究對象的設定,預先圈定出了特定經濟條件以下的對象。然而,如果單單貼上缺乏經濟條件的標籤,非必要的貸款理當並非上上之選。實際上,經濟能

力的侷限並非扁平的,應該可以更細微地討論什麼樣具體的經濟程度(再加上其它場域的交互影響),促成了實踐的誕生。我們要探問的是,這樣一個恰好而特定的社會空間位置(既非富裕亦無法稱為真正的窮困,既非書香世家亦非文化上的無產者),將賦予這些受訪者什麼樣的特性(來自於什麼樣的社會軌跡的哪一種實作感),來做成這樣的實踐。而這便是此前被輕忽的巧合。

第二節 步入幻象的足跡:社會軌跡的研究

布赫迪厄指出,在出身背景與社會軌跡交織下,實作感於焉而生。我們在緒論中提到,不少傳統明星學校或知名私校學生,在高中畢業後就直接往國外發展、攻讀海外學歷。這樣的例子除了讓我們感受到,社會軌跡上的遭遇(譬如就讀的學校)會為他們帶來**生活風格**,也令我們思索出身背景可能賦予他們對患難更高的容錯率:「機會開放」(或描述為經濟資本對文化資本換匯的空間)。循此,兩個歷史在他們身上交會,讓他們主動地佔據,並活化這個位置。

對比早早獲得向外發展秉性的「天之驕子」們,這些出身相對平庸的受訪者,他們的出身背景與社會軌跡是如何隨後創造出選擇赴外的秉性的?出國是合理的這種想法是如何「長出來的」:出國是值得的、合乎經濟考量的,以及出國是好的——遁入世界主義的幻象,這將是兩個相互影響的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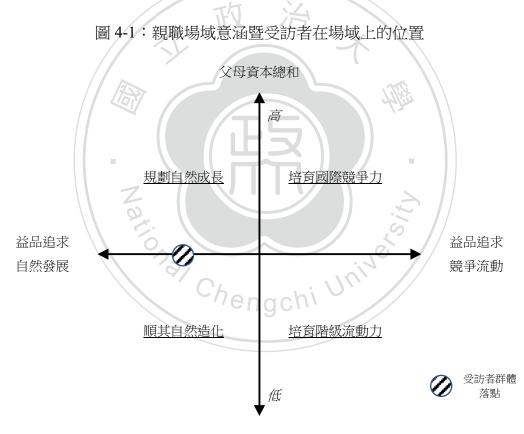
一、出身條件的整體限制

(一)教養方式的社會意義

我們已經討論過實作感是如何地受到社會軌跡影響。而自然地,出身背景的設定大幅地影響著社會軌跡,儘管不若函數一般有著絕對的輸出值,仍有劃定發展**傾向**的效果存在。父母親對子女的教養方式——甚至是家庭共活的方式,是形塑實作感十分直接的一種媒介。同時,這樣的一種「傳播方式」,令父母在自身位置上發展出來的實作感,也將多多少少往下傳承自子女,進而令後

代有機會獲得相同/相似位置的秉性,進而對該位置產生認同。

在社會位置空間的不同位置上,教養方式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存在?或說這些教養方式為社會位置空間的結構維繫或變遷,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藍佩嘉(2014)針對教養方式進行的調查性研究發現,不同社會位置的教養方式確有不同的特定傾向存在,並一定程度地影響著階級複製。在此研究中,藍佩嘉抱持著和布赫迪厄相近的理論假設——即教養會帶來階級複製效果,但發展自策略的不同實踐,亦確有其隨機應變的空間³⁸。藉由實際進入田野搜集資料,藍佩嘉歸納出四種具有普遍性的不同教養腳本(見圖 4-2),可以供我們參照。



資料來源:參考藍佩嘉(2014)架構並由本研究自製

結構主義。此外,對社會軌跡的重視,也會在布赫迪厄進行特定個案探討時被發現。

65

³⁸ 該研究者強調對「個人生命史(即本研究所指的社會軌跡)」的重視,可以幫助我們察覺存在於代間傳承的慣習演變。在這個面向上,他對布赫迪厄的結構主義傾向提出批判,認為其未能關注到相同社會位置實有可能做出不同實踐。然則,正如我們在第 2-3-1-1 節做過的說明,藉由策略的方式來彈性地理解實踐,布赫迪厄一向採取的是生成式結構主義思維,而非教條式的

如表所示,這些腳本分佈在由「父母的資本總和」,以及「參照之益品概念的傾向」兩軸構成的四個象限裡,藍佩嘉並將此稱為「親職場域」。在此,藍佩嘉所使用的「益品 (goods)」概念,指的是**選擇什麼樣的標準作為好的、良善的參照**:他區分出兩極的「外部益品」和「內部益品」,前者服膺於社會普遍價值、視社會認定的生涯發展優劣為標準,後者則傾向令孩子自適地發展出屬於自身的價值。而在資本總和的限制之下,第一與第四象限、第二與第三象限之間的差異,在於是否能提供孩子積極的幫助:無論是要積極輔佐孩子飛黃騰達或適性發展,在上方的兩個象限都有更多資源能夠順應地施展。

(二)放任與協作之間的教養:特定的教養方式場域位置

對比藍佩嘉所提出的四種腳本/四個象限,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受訪者們座落在一個有待定義的位置。

如前所述,當談到成長過程中和父母親的互動時,受訪者不外乎以「放任」來形容自家的教養方式。談到教養,其中一位受訪者是這樣講的:

就其實家裡開店,爸媽平常大概也沒什麼時間管我們吧。一方面也是 自己,自己唸書成績大概都在中上,所以算是偏放任吧。(受訪者C)

他們也都以彼此相似的邏輯解釋,認為受限於技職教育背景,父母往往無法在 普通高中(甚至是國中小的基礎學科)的課業上,給予太多的幫助與督促:

因為可能我爸跟我媽學歷都不算高,但我跟我姐都是讀一般高中體系上來的。然後他們對這些課業內容比較沒有太大的概念,所以我們從小就都是靠自己,但至少高中考到的算是蠻前面的學校(受訪者F)

連帶地,因為對孩子所屬教育體制的陌生,這些受訪者的父母也較少介入他們 的升學進路選擇,甚至是出國交換的決定:

他們其實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我想去他們就支持。唯一會

唠叨的反而是說,他們就覺得我是一個講話很大嘴巴的人,然後覺得中國那邊環境可能比較要注意——大概也是因為前幾年有李明哲的事情——他們就會叮囑我說講話要小心一點。(受訪者A)

乍看之下,他們的親職樣態會被歸屬於第三象限中——是一種「放水流」的教養方式。但教養並不只限於進學方面的互動,還要包括整體的親子溝通方式以及其它課題。或許是較看重教養二字中的教育部分,讓這些受訪者在回應上以「放任」兩字來簡單表述。但實際上,我們受訪者 A 所提的分享中,其實顯示出父母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以一個提點或協助者的角色現身。在他們描述的不同生活細節中,我們還會看到更多親子互動上「不那麼放任」的部分。

藍佩嘉指出,文化、經濟資本高度缺乏的勞工階級在教養上往往是消極的
——是以不要失敗為前提進行的。但相對來說,本研究的受訪者所描述出的親子互動,卻充滿著積極的互動,在許多教養的細節上實是帶有中產階級家庭的「協作」特性。最具體的特徵之一是,在問及家庭是否帶有威權特徵時,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否定這樣的描述方式。儘管是其中家庭經濟狀況最為困頓、領有低收入戶證明的受訪者 D,也表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能跟父母進行對等、理性的溝通(「家裡有什麼事情大都是用討論的吧我感覺,其實我做這些決定他們也不太會有太多反對意見。」)。在談到家裡「管教方式」的時候,受訪者 E 給出這樣的回答:

其實算是不太會管我們吧,頂多就是作業寫完之後才能看電視這樣 ……而且其實從小我是跟著我爸在打電動的,所以他大概也不太好管 我吧!(受訪者E)

談到父母鮮少介入他們的生活選擇,他們會把這樣的親子關係形容成像朋友一樣。對比藍佩嘉所指出的,勞動階級父母往往複製上一輩的教養腳本,而中產階級的父母則有更多的折衷與辯證在其中。這些受訪者的家庭事實上呈現了一種相對摩登的親子關係,恰似林文瑛、王震武(1995)所提出,晚近父母世代

在教養上選擇的一種「類平輩關係」。

子。(受訪者F)

此外,在呈現出趨於內部益品的樣態時,父母採取的態度更具體地來說其實是介於上層象限與下層象限所代表的勞動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藍佩嘉對於勞動階層父母的內部益品式教養,是這樣描述的:

在光譜的左端,父母採取「順其自然造化」的態度,期待小孩可以完成基本學歷,將繼續升學[與否]視為個人資質的自然發展;如果小孩被體制認為是可造之才,父母便會支持繼續升學(台語所說的「可以讀就讓他讀」)。(藍佩嘉,2014,頁129-130)

一方面,文化資本的相對缺乏,讓他們不見得有辦法為孩子自由發展出來的秉性提供建言或指引,但他們卻有著相較之下足堪支出的經濟資本餘裕(這甚至可能是指信貸的信用額度),來讓孩子做他們想要的發揮:

我其實沒有上過什麼課外的才藝班耶,像人家學鋼琴什麼的其實沒有

——啊有啦,我小時候、國小的時候,我媽有花錢讓我去學相聲。可能就也是覺得我蠻會說話的吧,那時候就有學了一陣子。(受訪者 A)那時候學校是[宿舍的]整筆錢要先匯過去,總共要 30 萬、台幣。然後那時候就沒辦法,那時候我爸跟我媽是去貸勞工貸款——一個人好像最高 10 萬的樣子——就貸了 20 萬,然後剩下 10 萬再湊一湊這樣

那時候是我媽用房貸再增貸,其實是跟學業是完全無關的[貸款方式],然後我媽幫我借了70萬出來。[研究者:所以你爸爸媽媽也是很支持你出國?] 我媽那時候就是說,你確定要去、你確定的話趕快跟我講,因為我辦這個也要時間。(受訪者G)

無論是受訪者 A 提到自己國小時母親支持他參與相聲才藝班,或是受訪者 F、G 利用了父母的貸款能力讓自己的交換計畫得以成行。這樣的態度不僅是「可

以讀就讓他讀」,更是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就大家一起讓這個「可以」的可能性實現。

這部分也點出了最能讓他們與勞動階級教養腳本拉開距離的特性,也就是他們「並沒有呈現出台灣勞工階級父母主要朝向智育為主的『單食教養』(univore cultivation)」(同上引,頁128),不會只重視學校要求的智育。某些時候,他們或許受文化資本侷限,有著不同於上層象限家庭的想像,譬如受訪者H提到的經驗:

當初有一點——是從來沒有到爭執,他們從來對我未來沒有過意見——但是他們有一點、有一點疑問就是,我那時候交換回來也有做專題,那專題教授就希望我可以繼續在他那邊——在理工科這蠻常見的——然後很希望我直接進博,就大學直接跳博士。

然後我就回家跟我媽講,其實那時候我有考慮過,那我媽就說為什麼你不念博士——因為我那時候就想一想我還是想出國念碩士,因為我不想要念博士——然後他們好像還是覺得唸越高越好。[研究者:所以最後還是以你的意見為主?] 對啊還是以我意見為主,因為書是我在念的啊。(受訪者 H)

儘管在規劃往海外繼續升學的時候,父母曾想說服他把握教授提供的碩博合唸機會,穩定地取得傳統認知中的高社經地位,但他們依然終極地保有對孩子的完全尊重,在受訪者 H 做出決定後,給予百分之百的支持。

當然,在這份關於教養的研究中,還有一個能為我們提供洞悉的重點是, 他點出了一個完整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如何提供出外秉性的優勢:

中產階級區辨秀異的方式在於,他們在教養上追求多元發展,而不只 是獨尊智育,期望或想像子女的未來目標是國際競爭,而不只是國內 流動。(藍佩嘉,2014,頁135) 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存量,讓他們足以洞察社會趨勢,並有機會活化社會趨勢 所提供的機會。這自然也可以在前述受訪者 H 的例子上看到,儘管不盡然形成 阻力,但確實無法帶來助力。

也因此,一方面這些受訪者受到的教養風格,大抵趨於親職場域的左側,以內部益品為主。另一方面,在縱軸上呈現出的態樣,則可以說是對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教養模式的一種雙重否定:落在一個透過與這兩者顯示差異,所定義出的位置。這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受訪者的實作感如何產生。可以補充說明的是,部分受訪者提到了曾發生過的家道中落,父親或母親的職業曾發生過階級上的向下流動(譬如從白領變成藍領勞動者),抑或是因為失敗的投資等不同原因削弱了他們的經濟權力:

我們家有輝煌過,就是我爸 [那個時候] 是業務嘛。然後就是有賣球證,高爾夫球證,然後他就有做得很好。所以的確有一陣子是,我們家還有一起出國,我們家四個人一起去韓國,大概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就那次。但後來就,因為我們家其實是國共內戰過來的,在這邊是沒有祖產,就都得要靠自己賺……那現在其實就,也算是親戚的問題不少,就你賺多少就全部都得付出去。(受訪者G)

或許可以推測在這樣的轉換中,產生了不同秉性的嵌合體,進而造就出他們獨 特的教養方式場域位置。整體來說,這些家庭都無法實現財富自由,卻也不像 藍佩嘉所觀察的勞動階級家庭一般債台高築。

最後,關於文化資本承繼與進學路徑的關聯性,在布赫迪厄研究中的許多 實例都指出,承繼的文化資本落差會導致學生進學路徑的差異。幸而,至少直 至大學以前,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並未在國內傳統升學制度中 扮演重要角色。無論國中升學面臨的基本學力測驗,或是高中升大學的指定學 科考試都有相對明確的課綱範圍存在³⁹,因此限制了文化資本能造成影響的效力。而在升學路上保留的空間,也為他們在往後獲得向外發展的秉性——走入幻象——留下機會。

(三)逐夢的犬儒:出身背景的禮贈與詛咒

這樣一種特定的出身背景,為他們的實作感——特別是在逐夢海外的層面 ——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出了什麼樣的秉性?

什麼是對於兩種典型階級教養模式的雙重否定?也就是既非總是單單以活下去為考量,亦非總是能毫無限制地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一般來說,對文化場域與經濟場域的投入時常呈現對反關係 (Bourdieu, 1983),也就是說以文化場域內的經濟邏輯處事,時常會與主流經濟學式的經濟邏輯產生矛盾。起碼,總是需要有孰輕孰重或是孰先孰後的思量——無論這源自於機會的有限性(有限的資金要投資汽車工業還是電影產業),或是象徵資本上的有效性(淡泊於名利更顯其高度)。

而在前述上層象限與下層象限的對比中,無論是場域的左側或是右側,都可以看到文化與經濟場域間的取捨不斷發生——選一份能安定、飛黃騰達的工作/選一份未來可能有前瞻性的工作;讓著孩子從事一些不用花錢的消遣/帶孩子培養他有興趣的才藝。這同時也是機會開放與結構限制的對反,令中產家庭更有機會贏得文化場域中的機會。

回過頭來,拿受訪者 D 來說,確實可以在他身上觀察到一種非此非彼的秉性。一方面,儘管父母從未有過外部益品式的要求,但如同我們在前文提過

71

³⁹ 必須額外說明的是,隨著近年來教育制度的持續變遷,課外活動的影響力確實不斷增加。一方面,「一綱多本」的做法進一步模糊了考試範圍的邊界;另一方面,學科能力測驗的錄取員額比例,近年來持續趕超指定科目考試,而其所要求的備審資料和面試表現,都不存在同一的標準。這兩個因素雙雙加大了文化資本介入的空間,但起碼對研究所及的受訪者來說,他們得以在變遷加劇以前,完成升學的關卡。

的,他時常思量著就讀科系賦予的技能,能否有效地讓他在社會上謀職,能否 為他帶來穩健的下半輩子。但另一方面,他從不排斥對文化場域的追求,他願 意在報酬並不直觀的出國交換上投下資本,以探索的方式尋找為自己加值的可 能性;他廣泛的興趣還包含著撰寫部落格,以及一般來說進入門檻較高的專業 人像攝影。

在此,自幼適性發展的空間確實為未來將獲得的不同幻象(無論是影像創作或是接軌國際)保留可能性。但儘管並非時時捉襟見著,經濟上的顧慮依然在許多時候為他們設下限制,最好的例子或許是,不少受訪者都需要在一些時候捨棄文化場域的可能性,投入時間成本、仰賴自身的勞動來維持生活所需,作為父母微薄資助外的補充(誠然,「經濟權力首先是一種遠離經濟需求的權力」)。他們始終在經濟思維與非經濟一經濟思維間擺盪。

或許最殘酷的狀況是,父母有意願資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願意避免他們陷入經濟場域思量的流沙中,但正因為孩子深知這樣的做法,會帶來超出了家裡經濟能力應有的負擔,便婉拒了父母的善意。受訪者 E 在談到自己的哥哥選擇去唸警專時,曾說到:

他大概有80%是因為家裡經濟因素,所以這麼決定的。

.

其實我爸媽當初是很反對的,畢竟大家都知道當警察真的很危險,也 一方面他的課業成績其實算是中上。(受訪者E)

hengchi

在種種因素調控下,這些受訪者呈現出了一種「犬儒式的認同」:他們都理解文化場域的投入能帶來豐碩的報酬,不僅對純粹文化資本的報酬有所認同,也知道這樣的報酬時常是可以在未來被兌現的;但他們也都認為經濟上的限制無法輕易突破,不如以眼前的安身立命為首要目標。儘管前半段的訪談中,受訪者 E 興高采烈地說著在彼方見聞的圓夢回憶,並說希望還能有機會繼續探索

更多,但一旦問到畢業後的打算,也便收起玩心、直白地說:「就是想要趕快去工作」(受訪者 E)。這些受訪者也會認為,某些狀況如果出身背景不同,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發展,但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能夠做的有限,所以做了折衷。就算是受訪者 G,他不斷地提到自己與國內教育制度有多麼地格格不入,但深知出外留學是無力負擔的選擇,便決定以交換的方式,「起碼要趁學生時期體驗過」(受訪者 G)、過過乾癮也好。進一步問及畢業後的打算,他說海外工作或升學從來不在自己的規劃中;然而,一旦換一個方式提問,問說既然覺得國外是更適合自己個性的地方,為什麼不會考慮往國外發展,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不排斥但也沒有這樣的規劃。其實我有點想、可是我家人都在這邊。對我來講,就是家人其實比這些都還要,怎麼講......(受訪者G)

受訪者 G 在停頓之後沒有繼續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從他的語氣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繼續留在國外發展是有渴望的,但追求「安定」的拉力一直都在。

或許值得在此作為補充引述的,是受訪者 A 如何談論自己的學習態度。被問到大學是否曾經考慮過出國交換的時候,受訪者 A 沒有直接回應,反而是繞了一圈先說明自己大學的學習狀況,再以此說明自己當時的心態:

就是因為私校學費超貴,然後家裡的狀況自己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那你一定要去打工啊,那你去打工你時間就貢獻在打工上面。其實說真的,我大學重心都在賺錢,我沒有在顧課業。我可能考前兩個禮拜——在我們學校其實沒有人在唸書的——那我考前兩個禮拜準備唸書,其實我隨便念都可以唸得蠻前面的,就是認真的。就是你還有上課,本來就是習慣會抄筆記的人,那這只是延續我高中時期的上課情況,所以我在在校成績很好。

然後當初我還是會翹課,我也會作弊,反正就是都會。那只是說某些

大刀⁴⁰的課,就是可能例如說,可能會拿 100 分的課,大家都拿 100 分;但會拿及格的課,可能只有、一個班只有三個,我是那三個之 一,其他人都會不及格,我所以我的成績是這樣上來的。(受訪者 A)

他提到面對經濟的考量,大學時沒有把太大的重心放在課業上,進而也不曾考慮過出國交換。透過鋪陳作弊、翹課,甚至是自己消極的學習態度,他想要強調的是,儘管對違紀或不那麼積極的行為,他自有道德上的評價,但他也知道潔身自愛不如安身立命,而這毋寧也是犬儒展現的一個面向。

至此,犬儒思維讓他們和禁慾的康德真人拉開了距離⁴¹。以康德的判斷力來看,純然投入經濟場域的秉性,是無法將基本需求的驅力昇華,無非是飽暖思淫慾的狀態,難以追求真正高貴、有文化價值的素養:

所謂文化性愉悅和肉體性愉悅(或稱作原始狀態 [nature])間的對反,植基於所謂有素養的布爾喬亞與一般大眾間的對立——後者便是繁來代入未經教化之原始狀態的稻草人,他們在這樣的想像中野蠻地縱情於純粹的淫慾:「那種要靠額外魅惑成分和濫情才能滿足,更別說還把這些當成評判標準的品味,根本是種還沒脫離原始的野蠻。」42 (Bourdieu, 1979/1984, p. 490)

而這些受訪者僅管有著對文化場域的追求,卻無法完全擺脫經濟場域的拉扯, 進而完成「倫理優越性的試煉」,便也無法真正企及康德的「道德高度」。

他們的秉性可以讓他們讀懂康德的倡議,卻無法有效地達成。這同時讓他

_

⁴⁰ 意指授課老師評分比較嚴格,在打分數上比較「心狠手辣」的課程。

⁴¹ 在古希臘時期,犬儒 (Cynics) 學派實是主張禁慾的,他們希望藉由屏除欲望,來追求思想上的獨立自主。但在近世的語境中「犬儒主義」("cynicism") 產生了些許反轉,譬如在斯洛維尼亞哲學家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的詮釋中,便挪用了古典犬儒的普遍懷疑態度,來指陳近人的一種既瞭解資本主義體制之害,亦同時在深知無力反抗下更加深陷其中的狀態 (Žižek, 2008, p. 26) 。本文在此便是指涉此種當代犬儒主義。

⁴² 引號內引文為布赫迪厄引述康德的《判斷力批判》。

們為接納世界主義價值觀做好了準備,卻也使他們難以真正成為世界主義場域 中的優勢者。如果藉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來詮釋,一種大儒的心態毋寧是**藉由** 一個場域的幻象看穿另外一個場域的幻象後,卻依然無法同時走出兩者。兩相 對比就能發現,從最開始客觀社會位置開始,就不斷地在拉開這樣的「高下距 離」,他們從一開始便失格於一種理想上的世界公民了。

二、在限制下走入幻象:決定性的生命事件

回到我們在稍早之前提到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來說,從小在學校 教育中能接觸到世界主義思想的機會多不勝數,並充滿著各種學習世界主義秉 性的「儀式」。曾經經過這個階段的人,或許多多少少能夠重複他被賦予的操練 (按照課本的課文,用外語跟陌生人閒談天氣),但擁有知識——無論顯明或是 默會的——並不等同於已走入了幻象。舉例來說,設想一個能夠得體地參與部 落儀式的人類學家,他確實瞭解部落的各種內部邏輯,但在他真正相信祝禱儀 式確將帶來豐沛降雨以前,他並不能說真的已經走入了幻象之中——並不能說 他確有以部落內部的利害關係邏輯,理解自身參與儀式的行為本身。

相反地,走入幻象則意味著我們不僅投入了場域的利害,更表示我們有能 力重新組織過往取得(或曾無關痛癢)的知識,並用它來投入場域中的競逐遊 戲,讓它成為能過關斬將的利器——讓他們從原本毫無意義的冷知識,成為攸 關利害的熱知識。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知識,但不是每個 人都有機會讓沈睡的稟賦甦醒,使其成為他有機的秉性。

某些生命事件在此**帶著必然性地恰好發生了**,便有意無意地形成了一種 「成年禮 (rite of passage⁴³)」,讓他們取得了走入幻象的前提要件。

(一)經濟條件的解封

⁴³ 直譯即為「通過儀式」。

在本章開頭引文中提到,很多時候我們口語上說的「進入人生」(或是想像一種「開始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任」這樣的說法),指的就是選定一種(或多種) 社會遊戲,並開始能嚴肅投入其中的時刻,而這似乎也正是對走入幻象最好的 描寫。

然而,這樣的投入總是伴隨著成本,便也總是伴隨著關於投資的思考——無論是指純粹錢財經濟性,或是涉及多種不同資本的長短期匯兌——有關於這一切是否合算。也正是在此,我們發現到,對這些受訪者來說,能走入幻象的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是**經濟限制上的解封**。也就是因為各種不同狀況的發生,讓他們**重新審視**了關於經濟權力44的狀況,並產出了與過去斷裂的思量方式。

經濟條件曾經如何阻止他們走入幻象?一個最能解釋的情況是,這些受訪者至少在高中畢業以前,都未曾將出國就學納入考量過。事實上,受訪者中不乏全台各地明星高中的學生,以受訪者B、C、E、H來說,他們都就讀於成長縣市第一或第二志願的學校。不若緒論及本節開頭曾經提到的,明星高中學生及早選擇向外發展的例子,他們看重世界主義資本的時程可說是「大器晚成」。對此,所有的受訪者都解釋說,從小的認知就是認為出國就學是遙不可及的。一個例子可能是受訪者F的說法,他恰好提到自己曾就讀過雙語幼兒園,於是研究者便追問那為何大學以前沒有過出國的想法,他邊笑邊直白地說到,「因為就沒有錢啊!」(受訪者F)。這樣簡短的答覆儘管帶著笑意,但也訴說著這確實並非他們的家庭狀況可以「妄想」的。

而這樣的條件之所以能解封,其中一種狀況來自於一個令人略感意外的巧合,那就是不同受訪者生命中首次的自由行經驗,這發生在受訪者 A、D、F的身上。這些受訪者分別都在高中上大學前,或大學中的寒暑假展開了他們第一

76

⁴⁴ 本研究中「經濟權力 (le pouvoir économique [economic power]」一詞,同於布赫迪厄的用法,其經濟專指狹義財力方面的經濟,非指廣泛特殊資本的經濟。為免訛誤,在此說明。

次的海外自由行。被問到既然曾經覺得出國遙不可及,那是到了什麼時候開始 改變想法的,他們都提到了他們的那一場旅行。譬如受訪者 A 便說:

我覺得是因為大學去過日本也去過韓國。因為那時候真的有存到錢, 我就問找我的大學朋友說,「欸多少錢以內的預算啊?」那因為出國大 概三萬四萬,其實我打工三年四年下來,是可以存到那筆錢的……就 覺得這好像是不用靠跟家裡拿錢也可以辦得到的。(受訪者 A)

這使他們開始意識到,所謂接軌國際相關的實踐,是他們有機會可能參與的。 同時,這也是一個受實作感影響的時刻,作為一個在生命中缺乏跨境旅遊經 驗、在生活風格中缺乏這個面向的人,便是要等到被同儕詢問時,才會對此有 所關注並開始有所瞭解(以至於發生斷裂)。僅管這並不表示他們減少了對經濟 場域的投入,僅僅是他們重新認識了不同選擇背後的條件。

值得為此補充說明的是,無論他們後來前往交換的國家是中國、日本或捷克,這些受訪者首次自由行的經驗都是前往日本。而廉價日本航線在台灣的興起,他們恰好躬逢其盛。在 2013 年前後,數間日商廉價航空進駐,並刺激了廉價國航出現,自此開始有人視東京為台灣一日生活圈的範圍(甘芝萁,2015 年11 月 2 日)。所以也確實在客觀條件上,產生了他們能完成過去無法完成之實踐的機會。這樣的趨勢同樣發生在 2014 年中東航空公司來台拓點,令前往歐洲的航線開始有更多也更廉價的選擇(游琁如,2013 年 12 月 19 日)。這樣的社會背景為往後的交換之旅提前做好準備。

個人的旅遊經驗或許依然多多少少帶著隨機性色彩,但在進入大學後,開始有了交換本身作為選擇的認識,則可以一體適用於所有人身上,這同樣是一個受實作感影響的例子。在進入大學以前,他們缺乏對於交換可能性的想像, 受訪者 F 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他的例子:

小時候就覺得……可能還沒有真的交換這個概念。然後到了大學的時候,因為學長姐在分享 [交換經驗] 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分享的一個

環節就是生活費。然後那個時候算才覺得說,好像其實並沒有這麼困難。(受訪者F)

在增加了交換作為一種選擇,並意識到這種選擇有著相對寬鬆的經濟要求後, 他們便更有機會開始思索有關「接軌國際」的實踐。這是在實際生活需求下帶來的生活之風格化,而且只有在能夠發揮操練作用的這種生活出現在他們生命時,才會帶來這樣的發展。

這些案例說明的是,如何因為與實踐之間距離的改變,使得他們從原本無關痛癢的態度,開始有了對這些事物認真以待的可能。在此,這當然是一種廣義文化資本增長帶來的發展,又或許可說是一次文化資本對經濟資本換匯的時刻:正像是知道哪邊有特價商品,因而得以為自己省下幾分錢一樣。此外,這當然也要歸功於他們的教養方式,讓他們在文化場域的投入上可以預留空間。這些因素都為走入幻象提供了良好的先決條件。

最後,比較特別但依然有所關聯的案例是,受訪者 D、E 都有較年長、已經進入社會賺錢養家的手足,能夠提供協助。譬如像受訪者 D 便提到:

辦貸款的時候,其實我爸媽的狀況好像不符合資格,那剛好我姐已經 工作一陣子了,所以其實是拜託我姊幫我作保。(受訪者 D)

這也一部份不僅可以提供一份額外的奧援,也讓他們在投下經濟資本時可以稍加寬心,不會有壓垮家庭的罪惡感。這也客觀地減少了與實踐之間的距離。

(二)獲得秉性的契機

正如我們一再提到的,走入幻象最核心的徵象,依然在於一個人是否開始看重了場域中的利弊得失。而對此,走入幻象最基本的要求,是擁有能夠辨別利弊得失的秉性。當然這樣的秉性並不必然要和經濟權力掛鉤,沒錢出國也可以參與在世界主義場域當中,或許透過在國內關注國際大事這樣的方式。前面所談的,或許可以說是描述取得秉性之可能性提升的背景。而接下來則必須說

明這些秉性具體上從何而生。

旅遊的經驗依然是很能發揮說明功效的例子,受訪者 H 是這樣說的:

就是去了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吧!去了之後就想要看更多。然 後剛上大學就開始看,看還有沒有一些能夠出國的機會,因為就會覺 得出國好爽喔!(受訪者H)

對受訪者 H 來說,這趟旅行不僅讓他重新審視了接軌國際的合理花費,同時也讓他體驗到了世界主義場域中利益的甜美,認識到了探索異地未知事物能帶來的樂趣——用最通俗的語言來形容,這彷彿是讓他「開了葷」一般。

確實,對於不少受訪者來說,直到大學以前,都缺乏取得這種秉性的機會。正如我們曾在第貳章第二節的不同研究中看到的,自幼的耳濡目染是帶來這種秉性最普遍的方式。而這也可以反映在前一段中提到,中產階級家庭與勞動階級家庭教養方式的差異上:如果從未接觸過相關的環境,如果從未接觸這樣的生活,引致生活的風格化,那相關的利害自然無關痛癢。

至少,在生命歷程較近的時間點(大致可以說是進入大學前後),他們開始有更多機會在生活中接觸到相關的資訊。比較直接的例子是就讀外語學群的受訪者 E、F。作為一個實地演練並進一步增進外語技能的機會,出國交換是大多同儕會考量的選擇,也很容易接觸到學長姐的各種分享。所以除了相關資訊充分以外,確實在系上也會瀰漫著這樣的一種氛圍,這成了孕育他們相關秉性的良好環境,無論是對彼方的好奇或是對「移動力」的重視。

其實,就算不是語言科系,大部分的受訪者也同意,出國交換、遊學、留學,甚或較少的時候是打工度假,這些都是學生間閒談時常被提起的話題;或是回到受訪者 A 所提到的,大學校園中多有機會親身遭遇外籍學生,這都讓大校園裡充滿著鼓勵培養秉性的機會。需要額外說明的是,確實也有例外,譬如像受訪者 H 就明確地說:

我不知道其他科系的狀況耶,但像我們其實大家想的大概就是趕快把

學分修完、趕快畢業。我自己、我印象中班上好像沒有其他人有在準備交換的。

•••••

那時候其實就會變成說,可能很多系上的活動我就參與的比較少,因 為我要自己花時間準備交換這樣。(受訪者 H)

作為一個出路十分明確的科系,他所接觸到的同儕大多專注於課堂學業,念茲 在茲的都是畢業後直接進入一份優渥薪水的工作。他說對接軌國際有想像的自 己,是同儕中的少數。

當然,也有一些案例是受到更隨機的事件所影響。以受訪者 G 來說,儘管自幼深知自己與國內的教育體制有所衝突,但或許正因為覺得遙不可及(連彼方的模樣都無法想像),在高中以前對接軌國際不曾有太多的想望。說到真正有幻想的契機,他是這麼說的:

應該是高中開始,國中我還不懂,應該是高中。[研究者:所以有特別接觸到什麼資訊嗎?] 我想一下喔、我不太確定是什麼時候開始耶。可能就是比如說看電影、像是、像是、喔《歌舞青春》!那種感覺!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很想去美國,再來就是又看很多電影,裡面都會有那種校園場景。(受訪者G)

如此,在高中的課堂上,因為意外接觸到了美國青春校園喜劇《歌舞青春》,那對他來說便是一次衝擊。他意識到原來在不一樣的國度,確實有著不一樣且可能更適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識到原來在生養自己的土地以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是因此,才鼓舞了他在上大學以後開始探索向外發展的可能,開始認真注意海外事務。

這和受訪者 B 的景況有些類似,說起起心動念對異地生活開始產生好奇, 他明確地回憶到一本高中時在圖書館意外翻到的書《卡夫卡今天不在家-奧地 利匈牙利捷克》,這本書是一對母子倆共同完成的,媽媽年輕時就有出國唸書的經驗,而兒子則是在高中的時候到了德國進行交換,這是他們描寫探索異地之喜悅的旅遊寫作。就在這本書後又接連看了好幾本相關類型的書,受訪者 B 可說一頭栽進了跨足海外的想像中。這也讓他做了一個特別的決定,選擇一個必須要出國的大學科系就讀:他所就讀的工商管理學系在他就讀的幾年間曾規定,將出國交換設為學生的畢業門檻。因為高中的契機開始關注國際生活,又因大學的氛圍讓他更瞭解國際生活的利害,以及成為一名國際菁英是如何地具有吸引力。

整體來說,儘管他們無法從小便時時刻刻地活在一個真正有國際意識的環境,但隨著成長、進入不一樣的環境、遭遇不一樣的事物,沿路上依然有許許多多獲得明辨世界主義素養之秉性的機會。也可以說,出身背景僅管無法讓他們贏在起跑點,但教養方式中為文化投入所預留的空間,則讓他們與出身更缺乏經濟資本家庭的人們相比,更有機會把握後續人生遭遇中的不同契機。而從這些狀況中,我們也多少能看到文化場域與經濟場域之間投入比例的變動。

(三)接軌國際的幻象

因為在台灣人口的組成比較單一嘛,你很難遇到真的形形色色的人。 但你在歐洲的話,至少我在斯洛伐克可以遇到比如說:斯洛伐克人、 歐盟的人,或是非歐盟的人,然後各種不同種族或顏色,或是吉普賽 人等等。他可能因為地理位置就在那邊的關係;而且台灣就是海島 嘛,他其實沒有那麼開放,在地理位置上。(受訪者B)

當這些受訪者開始在意國際事務之後,他們便「**醒悟**」到了某些事情,這 也成了他們說明為什麼要出去交換時會使用的說詞。受訪者 B 在這裡使用的這 種「島國修辭」,其實在不同受訪者的回應中大都會出現,也正是他們主張有必 要「出去看看」的理由。這種醒悟就是反身性的醒悟,也顯明他們接受了康德 式的倡議,致力於改善自己「短視直觀」的視野,開始追求反身的世界主義。

一旦他們接收了反身的世界主義心態,也就不得不擁有一種參與式的世界主義——將世界二字本身的定義,置換為某一種特定視野所賦予的定義。比如 說當問到受訪者 A,關於他在交換期間造訪中國的一線城市時有的感想,他是 這麼回答的:

這種感覺有點像是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去日本——有的感覺。就 覺得,喔,原來,那個日本的地鐵是這樣、高鐵是這樣,「好快喔!原 來是 JR 線!」就覺得日本那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其實在上海就比較還 好,你都已經就都知道:上海、東方明珠、上海外灘,所以沒有太大 的感覺。

可是如果——我剛又想到——如果今天去的是法國巴黎鐵塔,我到了 巴黎鐵塔現場我會不會興奮?我覺得我會。[研究者:你覺得還是有 差?]我覺得對,但我不太知道說,為什麼我去上海看到東方明珠, 沒有那種興奮的感覺,但是有可能去巴黎鐵塔我可能就會「哇靠!這 是巴黎鐵塔!或是「這是比薩斜塔!就是很多人在推的那個!那我也 想要推一下!那我也要推一下,拍個照片。」總覺得我好像在上海不 會有這種感覺。

.

有可能是文化上的距離,你就覺得那些東西就是很常見。(受訪者 A)

在此,對受訪者 A 來說,要構成「世界」的條件一定是差異化的、陌生的、遠離自己的。這樣的定義從何而來?或說具備世界意義與否的階序是如何被建立的?為什麼必定只能擁有參與式的世界主義?這正如第貳章第一段中提到,世界主義譯介的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這就是一個已經形成的既成歷史事實:

所有內化了場域的邏輯與必然性的人,都被迫接受了這個可能性的空

間,場域對他們來說是某種歷史的超驗,也是關於感知與評價的、關於可能性與正當性之社會條件的某種(社會)範疇體系(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365)

也因此,當我們所參照、建立起場域的幻象孕育自世界主義,這種評判標準就算並非不可撼動,卻已經是公認的座標。

最能說明這點的,或許是同樣談到異地能如何提供「多樣化」風景時,受 訪者 F 一番更**露骨**的表白:

就想要出去看一下外面的風景,然後日本真的跟台灣不一樣的是,日本真的算是亞洲蠻厲害的國家,所以他會聚集很多不同的,你可能沒有聽過國家的人。

.....

[這樣算是] 脫亞入歐?哈哈哈。(受訪者F)

藉由「脫亞人歐」四個字,他說明了日本與台灣間的現代性高度落差是如何的不言自明,還同時默認了現代性本身作為審視標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這莞爾一笑,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他是如何帶有雙面性地使用「脫亞人歐」一詞。一方面,刻意引用這樣的措辭,正是他在試圖展示,將其它場域對於同一件事的評價標準(譬如設想一位反帝國主義者可以有的批判)同時引入參照體系的話,對於理解會帶來什麼樣的斷裂。但另一方面,他又透過語後的笑意來暗示,要是認真看待這樣的指控未免太無限上網了,進而虛無化自己提出的指控,並暗示自己恰是如何真實、不帶批判地相信「脫亞人歐」這四個字字面上的邏輯。這樣的雙面性毋寧顯示出,場域內合法性的樣態或許在外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悖論,卻對場域中人顯示為不容爭辯的事實。

第肆章 活出自我:結構性限制下生成的實踐

第一節 實踐的生成本身

實踐是一種「受到束縛的自由」(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 2016, 頁 364), 而實作感、場域的規範,以及客觀資本條件的限制,在在都是引導之的引力,也都是實踐並非絕對開放的緣故。在他們進行創造性地揮灑並試著活出自我時,他們始終需要依賴他們手邊擁有的材料。

正如前文所及,實踐並非鐵板一塊,所謂的貸款赴外交換是由其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轉折,或說每一個直覺反應加總而成的,而不同引力發揮的作用,正是在每一個時刻去中介這些細節的發生。也因此透過分別看待赴外交換中的不同環節,才能真正地援引受訪者身上的客觀因素來解釋實踐的發生。

這樣的分析將檢視實際發生的事蹟,來回過頭來尋找有什麼客觀因素引致 其生成。以下藉受訪者所描述的客觀事實進行分析。

(一) 折衷下的划算之選?

在能夠出發並完成一趟旅行的最早以前,成為交換學生是如何成為被選中的選項的?依然受到經濟權力詛咒的他們,首先發揮作用的當然是經濟條件。 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提到的相同說法是,會想去交換是因為這是在國外體驗生活 最便官的方式:

相比起來,去交換真的就是一個比較負擔得起、CP值比較高的選擇,可以體驗當地的生活。如果有人問我就是說,花這些錢去交換,其實也沒有學歷,這樣子值不值得。我覺得應該還是值得,因為我覺得只要你未來不去國外就業,能夠這樣輕鬆的申請到一個簽證,就是在那個地方生活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就只有我們現在身為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這段期間 [有辦法做到],畢業的話就真的沒有了。怎麼說呢?就有

實現的事情會覺得變成說,錯過了的話,以後想起來就會很後悔,就 再也沒有機會了。(受訪者 E)

能用學生身份旅居當地,令彼岸的生活成本變得相對可以承受,自是相當可欲。而考量到國外高額的學費,學校能幫忙負擔真的是划算不少。

但隱而不宣的不僅是旅居當地的生活開銷(那或許還是較能審慎思考的層面)——實際上交換是一條容易進入卻難以逃開的路,其中的隱藏成本往往會出奇不意地影響著申請者。成為交換學生的步驟看似簡單,但實際鋪排開來卻並不是一蹴即成的。首先要面對的,是各校要求的外語檢定成績,而單次成千近萬的檢定費用本已可觀,如要再加上事前補習準備的話,這補習費依行情亦是萬元起跳。其次,等到確定取得交換學生資格後,便要開始辦理簽證,而異國簽證的雜項,諸如健康檢查、證明公證書以及簽證本身,亦分別需要數千元不等,此外後面還有諸如房租、押金等在正式出國前需要預付的開銷。被問及貸款的過程中有沒有過任何遲疑,受訪者 D 這樣回應:

在辦貸款的時候其實沒有猶豫耶,畢竟前面都已經花了那麼多錢了, 也不太可能反悔說不去。畢竟我整個申請的過程,我最開始應該是前 一年就先考了托福,然後再有繳學校保證金那些。然後我有點忘了, 但應該辦貸款的時候,也已經付了一些簽證的費用了,畢竟那個我記 得是辦貸款的時候要附上去的文件。(受訪者D)

選擇出國交換以及選擇以貸款來支應,這些選擇都是事到臨頭時已無法回頭的選項。在此,貸款赴外交換的選擇,確實沒有辦法劃定一個具體的時間點,而是許許多多時間點的彼此影響而形成。正因為一次一次投入了說多不多卻又說少不少的錢,於是每一次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投入成本,卻也在每次投入成本後,讓離開所需要承擔的虧損加重。於是,開始是看似輕鬆可以承受的選擇,後續精神上的投入卻因為經濟投入而持續增加,使得實踐的緣由越來越多來自於難以負擔的蝕本可能性。

一方面,這是雙重否定的教養風格帶來的詛咒,做決定的時候無法不去考量經濟資本的投入,讓他們選擇看來簡單卻難以離開的路。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教養風格卻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勇氣,願意拋下唾手可得的利益,去尋求遠期可能更多元的報酬。譬如受訪者 H,或許是帶點反諷意味在挪用前面所提到,同學大部分以畢業、開始工作為目標這件事當作一個哏,他邊笑邊說:「如果沒出去交換,應該就是像大家一樣穩定求畢業,趕快進台積電工作」(受訪者H)。或是像受訪者 D,當他被問到為什麼有勇氣投下經濟資本,便說:

其實我不會太擔心耶,貸款的錢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多,但真正開始、 開始工作沒幾個月就賺回來了。(受訪者D)

(二)純粹地生活在他方

會想出來交換是因為我覺得系上好像真的沒辦法給我太多——怎麼說——技能吧!我就覺得如果沒學到什麼東西,那就要靠交換來讓我的履歷更好看一點。(受訪者 D)

這是談到交換的目的,受訪者 D 的說法。但在一輪談話之後,他又換了一個方式來描述出來交換的目的:

這趟選擇比較近的國家就是因為不想太累,這趟我設定就是出來玩的。(受訪者 D)

要舉出一個所有受訪者——甚至可能是對大部分的交換學生來說——必定 會嘗試完成的作為,那肯定是積極地到處去玩了。受訪者 D 在訪談的開始,便 強調自己就讀的科系,因為是不分系做法的草創階段,自認難以提供未來就業 所需的一技之長,並強調這是自己選擇出去交換的最大理由:為自己加值。但 同時,他卻也在稍後的回應中提到,這趟交換對他來說最大的目的便是出來 玩。乍看之下矛悖的說法,其實也正點出了交換學生這個選項的純粹性。 回到最初我們提到的打工度假案例中,確實不同研究者都道出了,這些青年赴外打工者所追求的內涵之一,正是試著模仿現代西方的「空檔年」以及「壯遊」。這便解釋了,為什麼看似隨意地雲遊四方,實為認真投入其中的產物:因為實際地去增加自己認知中的版圖、去體驗異國文化,便是實踐了參與式的世界主義,並且是積累世界主義資本最好、最純粹的方式。

其實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受訪者 E 在回應交換為什麼划算時的說法,他認為交換學生正是一種最沒有額外要求,能夠**純粹生活在他方**的一種機會。這樣的純粹性便在在地顯示出,為什麼交換學生是一個吸引人的選項。受訪者 G 也 提供了一個類似的經驗談:

那時候雖然覺得有點可惜,但現在想想也還好那時候沒有申請到獎學金。[研究者:因為獎學金有課業要求?] 對,我其實真的沒有花什麼心思在課業上。(受訪者G)

與此同時,他在稍後的談話中,當談到當地課堂體驗到的差異時,他大加稱讚 當地學生的學習態度: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我覺得他們好像跟台灣人比起來比較不那麼功利,就是上課時候給我的感覺。[研究者:可能有點像是他們上課就是為了上課本身?]對,就感覺他們不會是為了學分所以去上課,而是真的想學東西。(受訪者G)

這裡便呈現出一種和受訪者 D 相似的雙重性,乍看之下兩段話似乎用不同的道德標準自況,然而實是因為不花心思在課業上,也可以是一種**脫俗**的表現。

而從這樣的追求中,便也能意識到他們所追求的某種內涵(分析後會發現那即是世界主義資本),或許確實有著為未來工作加值(一份跨國互動的能力)的能力,但其兌現方式卻也不侷限於人力資本:它可以純粹是一份反思、一份認識,可以純粹就是一種昇華後的世界主義。這也間接回應著為何接軌國際的

承諾中,似有存而不論的矛悖之處,卻絲毫不減世界主義資本的吸引力。

(三) 秀異的策略

出國交換意味著的不僅是前往異地,也代表著前往**某一個**異地,這亦然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在一個世界主義的場域中,既然世界大學排名可以產生階序 意義,則選擇不同的國家前往,自然也將產生不同的高下之分。

儘管擁有相似的秉性,但或許在經濟場域與文化場域的投入比例上依然存在差異,致使這些受訪者在金錢考量與排名考量上有不同的取捨(同樣值得思考的是,這兩者似乎恰好呈現反比關係)。以兩位選擇前往中國的受訪者來說,他們便指出中國是一個經過取捨後的選擇,畢竟無論是直接的經濟投入,或是語言相近性所省下的一些間接投入,都令中國看來有更高的可近性。受訪者 A 有過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像剛講到巴黎鐵塔、比薩斜塔,你真的要問我的話,我覺得我 有機會還是會想去歐美國家看看耶。(受訪者A)

儘管沒有直接指出一個特定國家,但受訪者 A 認為再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造 訪「歐美國家」。

在選擇上的許多不同做法,也都能體現出這樣一種階序的存在。譬如前文曾經提到的,受訪者 F 選擇日本的因素就是一個例子。同樣有趣的,或許是幾位選擇中、東歐國家的受訪者。一方面,其中受訪者 B 和 H 都表示,選擇斯洛伐克或捷克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選擇課程上方便抵免學分的學校;但在此之前,這兩個國家分別會浮出檯面,是因為他們都先將歐陸國家視為選擇的範圍。以受訪者 H 來說,選擇捷克是因為離他嚮往的德國更靠近:

其實我那時候會選捷克有蠻多原因的,我那時候最想去的其實是德國,所以後來就是在德國附近找周圍國家。然後一方面是因為比德國來的好申請上,捷克的話,然後當然錢這方面——因為捷克物價其實

跟台灣比較接近。但後來想想去捷克也不錯,我另外一個去德國的朋友反而過得沒很開心。因為捷克路上大家不會期待你會說他們的語言,你講英文還是繼方便的,德國好像就比較不是這樣。(受訪者 H)

而以受訪者 B 來說,他認為斯洛伐克是一個相對容易找到實習、工作機會的地方,甚有機會成為他後續前往西歐國家發展的跳板:

畢竟你是一個大學新鮮人,你在歐洲從來也沒有什麼工作或實習的機會,所以我覺得先——像是一塊敲門磚嗎?像我現在的計畫,可能是我會想要換別的國家工作、換別的歐洲國家工作,那就會相對容易許多。(受訪者B)

或許值得額外補充的是,儘管在斯洛伐克,受訪者 B 並沒有選擇學習斯洛伐克語, 反倒參加了韓國政府在當地提供的韓語課程。這正是因為他認為韓語在國際的互動上, 是更有優勢的一種語言。

此外,正如反身的世界主義所標榜的,世界主義的宏觀始終有一個構面,是能夠深入當地文化,甚而像當地人一般地活著 (live like a local)。這些受訪者也都在不同的舉動中,試著追求一種道地性 (authenticity)。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受訪者 F 所提到的,他說他曾聽學長姐提過,一次最好的交換經驗要追求的三個目標,分別是「找到一份校外打工、結交一位當地摯友,以及譜寫一場異國戀曲」。在追問下他也略帶成就感地說,他相當有幸能完成這三項,認為自己算是有深入地體驗了當地文化。而受訪者 G 則是積極地參與當地的戶外社團、與當地人一同出遊,他略帶驕傲地談到:

我那時候有參加一個社團,那個社團算是蠻喜歡往外跑的,像我那時候有跟他們去一個湖邊露營,我應該算是我們這群交換生裡面蠻有體驗瑞典生活的。[那個社團算是比較多瑞典當地人?]對、比較多是瑞典當地人。因為就是後來,我跟一個台灣人,跟他女朋友是瑞典人,

住在一起,那我就有問很多他們瑞典當地的事情 [,那些事情我都有體驗到。](受訪者 G)

另外,異域性 (exoticity) 也時常是道地性的換喻,受訪者 H 直白地說,他在當地其實比較少跟台灣人或是中文母語使用者相處:

我那時候大概只有一些節日,像國慶日或是過年那些的,才會跟他們 聚在一起。[國慶日?] 對,雙十節。就我不是特別排斥他們,但就比 較不會主動去找他們,還是比較多跟其他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畢竟 出來就是來學語言、體驗文化的。(受訪者H)

世界主義素養之所以能作為資本存在,一部分也正在於其稀缺性。試圖體 現出合於場域合法性的獨特作為,亦是逐利的一種手段。以上這些選擇與舉 措,便也都是試圖標榜自身的獨特性,進而獲取更豐厚的世界主義資本。

(四)始終中介著實踐的經濟條件

最後,實質的經濟條件依然持續地影響各種不同舉措的生成。儘管已經成功地在異地上岸,這些受訪者依然要在有限的經濟資本裡思考如何換取所需。

譬如受訪者 G 便提到,他可以感覺到交換當地的同儕大多比自己擁有更優 渥的經濟條件,無論食衣住行上似乎都更隨心地行事:

我那時候有問之前去瑞典的,問說花多少錢,他就說「不知道耶、我沒有管耶」,我就「嗯……」對他們來講,這個錢可能就是,「好啊,那就去」對我來講就不是。

然後在那邊遇到的人,你就可以從他們日常生活的買東西就可以看得 出來,他們就家境其實都沒有問題,他們買東西都不看價錢啊,但我 可能就不能這樣。(受訪者 G)

相似地,受訪者D則提到生活中用餐的經驗,為了控制預算盡可能地把錢留在

四處遊歷上,他總是盡可能地在一般的日子裡自炊,卻也因此喪失了許多與各國交換生同儕交流的機會:

其實像我那時候一起的同學常會問我要不要去吃飯,像他們一些從別的地方來的人,可能就會想把握機會吃一些韓國的東西,但我可能就沒辦法每餐都那麼揮霍。就也會覺得少了一些跟他們一起相處的機會有點可惜吧。(受訪者D)

類似的例子還有受訪者 A,他對錢有一樣的安排,而他看重的則是喪失了遍嚐當地美食的機會。無論如何,如果財力更豐厚的話會想要玩更多,是所有人都有的想法。

在出身背景尚未扭轉之前,這是無法避免的狀態——無論是在實質的限制上,或是投資時的思量上。而這也是在試圖在此行中最大化世界主義資本會遇到的最大挑戰。

第二節 佔位的後續效果

在不同的案例上確實可以發現,交換就鉅觀的層面來說始終是一種折衷,是因為追求不到明知更好的東西,退而求其次的選擇。然而,交換所換得的不同利潤,卻依然有機會在接下來的人生博弈中開創出新局。要瞭解到整體來說,參與交換到底是一項利多還是利空,或許可以看向這些受訪者完成交換後,社會軌跡將如何繼續移動。具體而言,有些人在結束了這場賭局後,見好就收、決定以安穩的方式慢慢地將這些收益兌現;但也有人發覺錢滾錢的妙不可言,準備投下更多資本、參與新一次的逐利冒險 (venture)。

(一)安穩地向其它場域兌現

或許多或許少,這樣的實踐始終能為他們提供世界主義場域內的回報。而這些回報正如第貳章談過的,能夠產生跨越場域的效應。

他首先可以由子場域資本形成母場域的廣義文化資本,這有可能是一種特定的人力資本,在特定形式的求職上有特定的助益。譬如前往日本交換的受訪者 E 說到,自己計畫進入日商貿易公司工作,日本的經歷應該能在面試時發揮作用。另外,世界主義資本當然可以向同樣帶有世界主義幻象的場域中人兜售,受訪者 G 在回國後不久,便辦了一場名為「貸款交換人生:從勇氣開始」的經驗分享座談會,這不僅是一個獲取社會資本的機會,同時也可以說明這樣的經驗,或許也能直接兌換出經濟資本(譬如一場售票的演說)。

也正像是打工度假者所實現的「自我變身」(阮靖權,2015,頁64)一樣,這樣讓實作感上自己成為一個更有自信的人。從子場域上升後的文化資本存量提升,能夠讓他們彌補經濟場域上的缺乏,獲得一種更從容行事的秉性。 受訪者 A 便說道,這樣的經驗確實讓他變得更有自信了,他會覺得跟一些同儕相比,自己確實有相較之下不同的**見識**:。

我覺得真的是視野,就是我有發現一些朋友,他們沒有——有交換過跟沒交換過的人——例如說以工作來,假設以上一份工作來說好了,很多人就會跟我說要不要不要離職、就是繼續做。可是我就會——因為他們可能就覺得,你可能就撐一下,撐個半年嘛或撐個一年,然後你再跳槽薪水會長很快,你就忍一下——那時候我就覺得撐不住,然後因為我就會覺得我不是一定要待在這邊啊!還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啊,就是我會覺得給自己的一個,就會覺得說世界很大,還有很多地方我沒去。(受訪者A)

值得補充的是,這樣的獲益可能也將在代間傳承時發揮作用。世界主義資本的持有,讓他們更有機會為後代賦予親職場域中第一象限的教育。

(二) 走向下一次的冒險

資本投資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便在於它是可以「錢滾錢」的。正如第貳章

中提過的不同案例,世界主義資本當然也可以繼續滾動出更多的世界主義資本。另一方面,一旦有了更充裕的資本,人們自然會做出與以往不同的決定。布赫迪厄將實作感中的其中一個構面,亦即一個人依自身身處的場域位置與資本存量來作出佔位決定的基模,稱為「定位感 (sens du placement [sense of placement])」,並指這項術語同樣藉由一種投資的比喻來理解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或可將其理解為一種「投資佈局直覺」。所以同樣在市場中打滾,但他們現在有機會做出全然不同的策略。

在受訪者 H 以及受訪者 D 身上,似乎重演著首次出國旅遊所帶來的經濟條件鬆動,在交換後他們都開始意識到,實際上出國的支出相比可得的回報。而且,此時的他們不僅更瞭解出國的開支(「我其實是那時候去找我在德國交換的朋友,才發現原來德國不用學費」[受訪者 H]),也更深陷世界主義場域中,開始認知這並不是一筆瘋狂的投資。他們都在回國後規劃了實際前往異地留學的計畫,其中受訪者 H 目前已入讀德國研究所,而受訪者 D 也將在疫情中前往韓國攻讀碩士學位。以受訪者 D 來說,他這次毫不猶豫地貸下了教育部提供的百萬助學金。而受訪者 B 成功在斯洛伐克當地尋獲實習的他,便在短暫回國辦理畢業手續後,再赴當地成了正職職員。他目前依然在規劃各種向西歐國家發展的可能性。

這可說是一個超克教養所帶來的犬儒心態的時刻,在一次一次的遭遇中, 秉性似乎會選擇性地滾動增加,也致使他們有機會擴大文化場域對經濟場域的 投入比例,讓他們更有機會獲得遠期更大的收益。

儘管如此,以上數名採取利滾利做法的受訪者依然表示,將來工作後並不 考慮長期停留海外。對於成家立業的想像,他們依然認為自己在中年以前會回 到台灣,在台灣落葉生根。或許在這方面,第一代大學生的一種缺乏患難精神 的秉性依然無法完全被屏除。

第伍章 結論

疫情讓不少外籍學生回不來,台灣學生也出不去,不少學生原本要出國教育交流、海外實習,不是被召喚回台,就是保留名額到明年六月,大學也視明年海外疫情決定是否執行相關計畫,但不少學生仍充滿期待,希望能在畢業前成行,即使延畢也無妨。(簡慧珍、潘乃欣,2020年10月3日)

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是無庸質疑的人生進路?本研究的觀察起源於 2020 全球疫情開始以前,我們發現到全球國際學生持續增長,而國內學生出外就學的趨勢亦方興未艾。在經歷了因疫情而來的全球封鎖後,受到虛擬互動蓬勃發展的啟發,或有論者認為,人與人實體實地互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跨國移動的必要性終於被完全削弱了。實際上,無論是在新聞中呈現出的趨勢,或是本研究受訪者們表現出的態度,「生活在他方」的吸引力可說有增無減,出國的實踐甚有在疫情緩解後反彈之可能。

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研究貸款的投資邏輯或是交換學生增廣見聞的文化動機。藉由觀察一項矛盾於文化場域與經濟場域間投入的活動,這樣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希望瞭解這種當代感性的成因與邏輯——亦即我們在最初幾行字便提到的,這種判斷力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

前文主要透過社會軌跡提供的資料,藉由布赫迪厄式的慣習與場域概念,歸納出抱負與策略廣狹兩種動機的成因,幫助我們瞭解構成判斷力的元素以及構成的步驟。下文將詳述分析所帶來的研究發現。

同時,無可避免地,這樣的分析也是一種**判斷力批判**,同樣是一種康德意義上的禁慾——完成一種自直覺理解中抽離的昇華。也因此,我們亦有必要在下文用同於解構康德的態度來解釋自身的立場,「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20)。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共謀的基礎從何而來

正如前文所說,「接軌國際的遊戲之所以玩得下去,正是因為前仆後繼地不斷有人投入其中並承認其價值,令其得以運行不悖。」也就是說場域本身的存在,始終仰賴一群擁有幻象的人同時存在。我們可以說共謀觀點賦予的洞見在於,必須試著去探詢為什麼客觀的社會樣態,會持續為不同人提供獲得世界主義幻象的機會,才能真正理解這門遊戲。也就是,為什麼接軌國際的遊戲能持續吸引人們進場遊玩(並服從規則),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問題一中探問的。

研究的分析指出,就算在高中以前無法藉出身背景步入幻象,只要能有機會進入大學校園,依然有機會在較晚的階段走入幻象。於是我們便會發現到,在一生中斷斷續續都存在著不同習得認識幻象之秉性的機會。而對照第貳章中不同文獻對教育體系的研究,確實無論國際或國內的研究都指出,各國教育體制早已將世界主義視為一種合法的文化資本(這自然也是我們一開始能將其列為文化場域子場域的理由),按照布赫迪厄的說法便是發揮了「認證45(consecration)」的效果。這自然便是從基本教育到高等教育裡,持續存在著世界主義相關事務,且不斷提供入門機會的原因。

進一步往上、看向更加源頭的地方,根據反身的世界主義理論發展的歷史,或許確實可以說不同的全球性社會經濟事件成就了這種思想的誕生。但與此同時,正如布赫迪厄所說的「利益就是一種歷史上的任意武斷性……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85),真正產生幻象的,是康德啓蒙式地將某一種隨機產生的感性普遍化,將某一種優劣利害之別普世化。而這也和參與式和反省式的世界主義之對比一樣,本是一種歷史隨機性的產物。

共謀的核心意義是「每一個行為者都從其同儕的舉措中,承認並合法化己

⁴⁵ 或譯「祝聖」,更能賦予一種幻象背後所帶有的宗教性意涵。

身舉措,與此同時,這重又承認——且在必要之時糾正——他人之舉措」 (Bourdieu, 1997/2000, p.145), 這告訴我們場域的持存仰賴場域中人存在一種 儘管相互爭鬥,卻又和諧相處的狀態。為什麼在鬥爭的同時卻不會撕破臉,指 摘彼此之前潛在的不對等呢?事實上,我們所舉隅的不同個人主義式言說範 本,正是不斷地在賦予世界主義資本象徵性,讓我們忘卻背後(場域之外)的 客觀條件,正像是我們會相信學歷高低純粹是實力或是天賦的差異一般。與此 同時,前面所提到教育體制,其發揮的認證功能自也不在話下。也正如同藍佩 嘉(2014)提到的:

「全人教育」、「國際化」等學習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主流教育體 制所認可(雖然未必落實),成為具有象徵支配效果的教養論述。(頁 135)

象徵性同時為親職場域中懸殊落差極大的不同教養提供合法性。

或許生命經驗依然有其隨機性,但就像不同前提對實踐發揮的「引力作 用」,身處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中,我們依然會看到一定程度的傾向存在。而這說 到底,都是判斷力的由來。 Chengchi Unive

(二)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

整體來說,世界主義場域的存在構成了機會開放或是結構限制嗎?場域本 身的存在與擴張,確實在社會中開啟了一種不同以往的遊戲。只要是遊戲便必 定涉及客觀條件,影響著開局狀態的差異;而只要是遊戲,也必定會由於資本 的稀缺性,產生高下之分。就這個層面來看,所有的遊戲都是一種機會開放和 結構限制。

在諸多對世界主義甚或全球化概念進行的研究中,包含 Igarashi 及 Saito (2014) 的世界主義資本研究裡,都預言世界主義場域的存在,會導致(或已經 導致)—個跨國性的世界主義菁英階級出現。不過回到柯斯特對於全球性勞動

市場的描述,確實也說明了跨國菁英並不存在這麼大的需求。據此我們認為,世界主義場域——起碼在本地——就現階段而言,帶來的機會開放是大於結構限制的,但也僅止於分析的這個當下。從不同受訪者的說法及經歷中可以發現,按部就班地順應本地的教育體制升學時,世界主義資本介入的空間並不大,就算不是場域中人也有機會往一個更好的社會位置前進(或許公平或許不公平,但是按照世界主義場域以外的規則行事)。但與此同時,如果教育體制擴大對世界主義的認證,甚或將其視為優劣評等的標準時(譬如將世界主義相關事務列為一門考試科目),便有機會造成結構限制效果的出現。而這在未來並非不可能發生的景況。

(三)所以,貸款赴外交換是不是一條黃金之路?

根據以上的不同描述可以知道,世界主義資本就像是比特幣 (Bitcoin) 一樣,從一個單純的願景到現在,已經開始在越來越多地方被承認——甚至能夠 兌現。我們無法透過質化的方式去分析在量化意義上,花下去的經濟資本是否可以完全透過世界主義資本來回收,甚至產生利潤。但我們確實可以說,到一個異地交換——無論遠或是近,都能預期世界主義資本的進帳,而它確實有進一步兌現的可能性。

對某些人來說,出國也確實讓他的慣習往不同的地方開始滾動。如果我們確實視社會位置的向上流動為人生依歸的話,那貸款赴外交換確實有進一步讓他們獲得上層階級秉性,進而產生階級逆轉的可能,而這也正是研究問題二的答案。然而,人生目的本身為何,始終都是社會場域中階級鬥爭最核心的內涵。(Bourdieu, 1983)

第二節 研究意涵

到頭來,一篇研究可能是自說自話,甚至是原地踏步。以本研究來說,儘管始於對純粹文化場域投入的質疑,卻止於看到報酬存在的可能性,這反而化解了原初的質疑。當然,我們從來毋須為批評而批評,但這一切不免引人有「重重拿起,輕輕放下」之感。

也因此,在研究的最後說明研究意涵,除了為完成前文提到的「研究者自身的客觀化」,目的也在於說明做成本研究的**意義**何在。

一、研究/研究者的客觀化

(一)研究本身的「佔位」

當我們試圖從直覺理解中抽離時,本研究最核心的參照,是將自身視為對過往實證研究的一項批判研究。

批評理論的真理觀,與實證論有實存客觀真理的觀點相異,批判理論 指出真理受特定歷史條件限制,相對隨歷史發展,但真理的相對性不 能被主觀地絕對化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真理由當時、當地的實踐所 確定,不能因不同人主觀意念而改變。(劉駿州,1994)

在本研究中大量使用布赫迪厄的方法論,便是在試圖為主觀實踐進行客觀 化的同時,也還原並分析奠基過往實證典範研究的特定主觀性。正如我們在說 明研究方法時提過的,我們不能把實踐當成鐵板一塊。而實證研究在講求可重 複性、假設驗證的同時,便無可避免地可能踩入主觀假設的誤區,誤將「將邏 輯的事物,當成事物的邏輯」。

當然,批判研究並不應主張自身唯一的科學性。事實上正如布赫迪厄同樣 指出的,只要伽利略在假設驗證以外,願意為自己的自由落體實驗做出完整的 說明,去解釋自己的假設所為何來,那他依然可以成就一項完成自我客觀化的 實證研究。(李猛、李康譯, 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實際上,作為批判研究,在研究本文開始以前,研究者最初是試圖認識「接軌國際」如何作為一種當代的意識形態瀰漫在社會當中。原始的目標,是藉由文本分析式的意識形態研究,期望透過分析各式各樣「接軌國際」的言說,瞭解到世界主義思維如何存在今時今日的普遍成見 (doxa) 中。但正因為意識到本研究中所不斷提到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大敘事與個人想法之間的落差,便意識到另闢蹊徑的必要性。布赫迪厄認為,

只要你用意識、虛假意識、無意識等等這些方式思量,你就沒辦法全盤理解主要的意識形態效應,那種效應往往是透過身體傳遞的。支配的主要機制是透過身體的無意識支配達成的。(Eagleton and Bourdieu, p. 115)

以登山的術語來說,這或許是一種高繞的做法,在這個被稱為意識形態終結以 後的時代,藉由一條較蜿蜒甚至陡峭的路,來抵達意識形態分析的彼端。

最後,作為身處傳播學門中的研究者,藉由瞭解投入其中的實踐者、理解他們實踐的來龍去脈,在試圖認識意識形態效果的這個意義上,本研究正是希望藉由類似 Janice A. Radway (1991) 研究羅曼史小說讀者,或 Ien Ang (1982) 研究肥皂劇觀眾的方式,來完成一次類似於效果研究的研究:瞭解接軌國際的想法如何辯證式地為人們接受,甚而影響實踐。

(二)據實以觀的努力

要將一門真正反思性研究的這些結果傳達出去,有時是如此艱難,這是因為,在這項或可算是分析的分析之中,我們需要每一位讀者都不求從中看見一般意義上的某種「攻擊」或某種「批判」(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320)

一方面,座落在學術場域中,我們必須重複強調這不是為了「批判」而生 的批判研究——特別是在我們多方引用了場域內的不同論述時。

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是,正如同世界主義作為會被具有秉性的場域中人辨認出來,並以場域的觀點加以評判——或許施予褒揚或加以攻訐,一篇論述同樣會被不同的讀者放入不同場域中審視,各自取其秉性得以辨識的部分加以理解(就像是受訪者 F 談到脫亞入歐時,同一個語句在不同場域發生效應一樣)。最明顯的問題莫過於,使用犬儒、幻象或是共謀這樣的說詞,我們無法要求所有的讀者(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其視為後設語言,這些詞彙依然可能被透過其日常生活意涵被理解,也自然會被理解成對特定群體毫不留情地批判。(儘管我們應該補充強調的是,不僅遠遠不是批判,在使用犬儒一詞的時候這實是對這種「批判語言」的批判。)然而,正如賴曉黎(2013)在論述布赫迪厄的幻象概念時的自我反思:

就社會學的傳統立場而言,本文容易有美化支配者以及責備受害者的批評。然而,一方面,不能一昧妖魔化支配者,並樂觀地相信只要打倒支配者就會迎來公平正義的社會;另一方面,賦予被支配者道德光環甚至精神上的優越性,並悲觀地以為被支配者的處境反映出社會淪喪的危機[,也不能解決問題]。

.

因而,據實以報、如實呈現,才是本文想要達成的真正目標:既不悲觀,又非樂觀,而要實觀。(頁8,註19)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抱持同樣的目標呈現分析的內容,致力於呈現實觀的一面:既是批判亦非「批判」。

二、完成一項批判性研究

在致力於實觀以後,反思可以達成什麼樣的效益?布赫迪厄的反思社會學 作為理論工具箱,促使我們連同分析本身一起納入分析,盡可能達成透徹的觀 察。若僅僅作為一次社會學研究,接近實觀的努力或許已然足夠,但倘若自稱 為批判研究的話,似乎還缺少批判結束後所應指出的**方向**。

至此,研究結果令我們「瞭解到世界主義思維如何存在今時今日的普遍成 見中」;換句話說,我們做的是去批判一套**將特定倫理觀誤認為普世邏輯的想法** (亦即我們重複提到的康德式判斷力)。然而,藉此我們僅僅只是消極地指出, 特定倫理觀不等於全部的真理,人們沒有信奉這套價值的義務。於是,剩下的 問題是,在得知這一切後,個體該如何選擇屬於自己的倫理觀,並據以實踐一 一甚至,如何從視一切理所當然的*自在*,走向自我認識後再行實踐的*自為*。

布赫迪厄的理論確實於實觀見長,卻未能向個體提供更多的倫理指引。事實上,並不純粹是因為這超出了社會學研究的範疇,同時也是布赫迪厄在理論中刻意為之。儘管布赫迪厄本人介入社會不遺餘力,亦多有社會評論著述,但純粹就做學而言,其理論講究經驗性的理論生成勝過批判——甚至可說,他比同輩的法國理論家都來得更是如此。在一篇論文結束之前,我們要做最後一次的繞路,開啟一個對結論的拾遺來說長得有點不合時宜的小段,藉由還原布赫迪厄理論中被去除的倫理基礎,來成就批判研究。

我們將在本段指出,精神分析的倫理可以被挪用作我們的指南。正如 George Steinmetz (2014) 所巧妙點出的,在慣習、資本、場域等等追求結構與 個體間平衡的分析方式上,布赫迪厄與拉岡精神分析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的做法有著一定程度的親緣關係,並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尚且,受到兩人共同 青睞的「誤認 (méconnaissance)」概念,也鼓勵我們採用拉岡對精神分析的最終目標作為研究欲達成的目的,亦即「穿越幻見 (traversée du fantasme)」 (Feldstein, Fink, and Jaanus, 1995)。

當我們提到將援引精神分析理論,事實上,布赫迪厄曾被形容是「和佛洛伊德沾不上邊的一位理論家。」(Witz, 2004, p. 217) 從理論家 (theorist) 與精神分析這兩條線索出發,能幫助我們釐清並還原布赫迪厄理論中被略去的部分。

(一)作為理論家的布赫迪厄:理論/哲學的界線

回望數十年來促成後現代主義發展的不同理論,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巧妙地藉理論與哲學的二分,點出了所謂「理論 (theory)」的特徵 (Baumbach, Young and Yue, 2016)。他指出,但凡帶有形上學色彩者便是哲學,此外:

試著回答兩種問題,便足以構成形上學討論:生而在世的意義為何,以及天地、世界或其他具此等含義之實體的意義為何。而回答這些問題的努力,自然便將帶有形而上色彩——或換句話說,充滿意識形態 [ideological]。

.....

與此同時,理論可說是某種迴避這些色彩的徒勞嘗試,有鑒於我們或 許從來無法避免意識形態或形上學。 (ibid, pp. 146-147)

换言之,理論是一種拒絕成為哲學的哲學,是一種避免觸及超驗的討論。 而這樣的意圖(或說是一種意志),確實可以在布赫迪厄的理論中察覺,起碼在 他的社會學研究中可以看到。當他提到他「從來就不太欣賞那種『宏大理論』」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278),他想要說的 是,他認為理論、事物的邏輯,應該是生成性地從觀察中提取出來,而不是先 建立起一套無所不包的想法(人事物的形上答案),再挪用各式各樣的實證觀察 來服務之。他始終避免形成一套僵化的體系,希望學說是一套具有開放性的方 法(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一方面,藉由自身人類學背景賦予的思維,他致力於指出各種未受注意的 先驗假設,據此揭露並穿越各種意識形態思維;另一方面,藉由反思這項主 張,亦先一步為自身論述可能產生的立場賦予開放性(或許可以說是提供一種可問責性 [accountability]),來避免立場進一步地意識形態化⁴⁶。

也正因如此,超越生成性的部分是他避不討論的(起碼在早期著述中如此),這卻也使得我們無法直接獲得所需的倫理指引。在此,沙特的咖啡侍者論述,作為布赫迪厄的批判對象與對立面,依然是很好的例子:認為主體是被拋擲進虛無的存在,存在主義式沙特的形上學答案是,人類沒有形上預設的準繩存在,個體意義的正是透過建立起自己行事標準、倫理法則而來,這也令沙特擁有一套可在分析使用後的批判性指引——亦即,只要我想要我就應該可以賴床,不尋求自己想要的意義便是逃避。然而布赫迪厄卻只能生成性地藉由事例來說明,個體是如何在社會中客觀地滾動出慣習、客觀地建立起自身倫理觀。正因為沒有形上學假設存在,他無法回答人們有什麼應該去的地方:他只有「實然 (is)」的說法而沒有「應然 (ought to be)」答案。

質言之,相較於沙特的視自由為本質的答案,以及把逃避當作問題的說法,布赫迪厄無法說明的是,人們擁有什麼樣的原初狀態,並且是受到什麼動力驅使而開始擁有慣習,以至於我們深入討論的幻象。正因為他沒有形上學的答案可以代入,便也無法根據空有的方程式來求得未知數。

就像詹明信說的,我們從來無法避免形上學。儘管我們可以替前提假設保留開放性,並避免為這些假設提出絕對的答案。但在推論的過程中,始終仰賴想法的基礎才能進行思考。在此,布赫迪厄的被隱藏的思考前提,正是精神分析的主體化 (subjectivation) 理論。

(二) 壓抑之物的回歸:象徵閹割作為布赫迪厄理論的主體化過程

布赫迪厄理論中不曾觸及或刻意忽略的是,為什麼無論支配階級或被支配

103

⁴⁶ 這也是他與阿圖塞(布赫迪厄最大的批判對象之一)拉開距離的手段。布赫迪厄認為阿圖塞 執迷於尋找一種不可能存在的前意識形態立場,而布赫迪厄自身則藉由保留自身立場的反思空 間,來試圖迴避這種困境。

階級,無不服從於普遍場域與特定場域的內在階序規則。換言之,儘管不同經歷帶來的社會性的操練,確實讓我們獲得不同的秉性而進入不同的場域,但在原初的時刻,為什麼人們會有進入場域的需求?其實布赫迪厄在其晚期著作中給出了答案:

社會學與心理學應合縱連橫(不過這會需要先拋下對彼此的成見),一同分析人們對社會關係場域之投入的誕生時刻,那正是將場域形塑成投入與著迷對象 (object) 的時刻。孩童會在其中越陷越深,藉此也將形成社會遊戲的範式以及投入原則。最初,是自戀地組織力比多,孩童將自身視作慾望的客體;接著,他會開始將注意力投向他人,從而進入「客體關係 (object relations)」的世界,這會以原初社會縮影的形式表現,並將這些關係化身成幾位主人翁在那樣的劇碼中上演——這種佛洛伊德筆下的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Bourdieu, 2000, p. 166)

布赫迪厄並認為,人們或許還在其中「被灌輸了驅使他們投入社會遊戲的恆久 秉性。」(Bourdieu, 2000, p. 166)

前文提到,作為理論家的布赫迪厄迴避討論超驗的問題(也可以理解成價 習與場域的超驗狀態),但這主要是指早期布赫迪厄。早期布赫迪厄聚焦於其論 述的特例探討(例如生活風格場域、學術場域),帶有較強的社會學性質,並以 較強的經驗實證做法來立論。相較之下,晚期布赫迪厄曾發生轉向,討論更多 後設場域(例如性別場域、國家場域),或也因討論需求而不得不開始嘗試回答 更多理論的基礎假設(儘管從引文中可以發現,這仍是以問題的形式表述,且 以推論式的語氣回應,並不願在其上投入其信念)。

布赫迪厄之所以被認為是與精神分析扯不上邊的理論家,或許有兩點原因。一方面,基於前述理由,從事個案研究的布赫迪厄不僅迴避超驗問題,也對涉及這些超驗問題的討論帶有一定程度的敵意。除了前述沙特的例子外,在 奠基其學說的人類學研究中,他曾將精神分析貶為「生理化約主義 (biology reductionism)」的學說 (Bourdieu, 1972/1977)。另一方面,這也源於英美學界對布赫迪厄的接收:一部分基本教義派的分析哲學學者,對歐陸學者慣常使用、被他們稱作「反啟蒙隱晦主義 (obscurantism)」的風格相當感冒,而援引精神分析的學說或拉岡本人一向是箭靶之一。與此同時,布赫迪厄早期的實證傾向,則令他當成某種「模範法國人」來看待。與精神分析扯不上邊,似也是在引申他從不談論這種被視為「偽科學」的學說⁴⁷。

然而,我們或許可以說,精神分析理論實是在布赫迪厄學說中被壓抑的根源。回到前文布赫迪厄給出的說法,援引精神分析式的理解,確實能夠說明人們如何獲得一種投入社會關係場域的秉性。而布赫迪厄在此所描述的事件,如同 Steinmetz (2014) 所指出,正是佛洛伊德式的原初伊底帕斯關係之運作,或是拉岡據此抽象化後所提出的「象徵閹割時刻 (symbolic castration)」。

如果以拉岡的模型來表述,象徵閹割發生於個體意識到,無條件滋養自己的母親(廣義照顧者的象徵)總有缺席的時候,並意識到母親之所以缺席,是因為他需要時不時去滿足擁有陽性 (phallic)力量、比自身存在強大的社會遊戲(象徵的父親,或曰閹割者,例如母親的工作作為一個實例)。所以我們必須要服從於社會遊戲、跟從他的規則,我們才能在某些時候多少擁有陽性力量,多少繼續享受到母親的滋養(Bailly, 2009)。換句話說,生理需求甚至是愛的需求,是驅使我們進入社會遊戲的根本原因。

完成象徵閹割後,個體便開始對於不同的規範與體制——亦即人們將遭遇的種種場域——產生認同。拉岡術語中的「大寫他者 (l'Autre/ le grand Autre [the big Other])」,即是將這一切體制與規範視作整體的抽象客體,而人們將服從之視為得到幸福的唯一法則。

_

⁴⁷ 這樣一種部分英美學者與歐陸學者間的緊張關係,請參考 Sokal, A., Bricmont, J. (1998). Fashionable Nonsense. New York, NY: Picador. 另外,分析語言哲學家希爾 (John Searle) 在一次談話中提及的軼事,則能舉隅布赫迪厄以及傅柯 (Michel Foucault) 如何被當作歐陸學者的乖寶寶樣板,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whEIhv3N0。

這便是個體成為主體——具有客體思考能力的實體——的過程。藉由這樣的連結,我們便能還原幻象產生的機制;而藉由對生成機制的把握,我們便有可能掌握自我改變的能力。

(三) 幻見即幻象

幻見是上演大寫他者慾望的螢幕……慾望在幻見佈景中不會被填補或「滿足」,反而是藉此被建構起來(給出慾望的客體之類的)——是藉由幻見,讓我們學會「如何去慾望些什麼」。(Žižek, 2008, p. 132)

具體來說,這樣一種對大寫他者的服從,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驅使我們行動?在布赫迪厄的理論中,幻象與共謀兩者中介並造就了人們對不同場域的投入;而在拉岡精神分析之中,我們則可以說是幻見 (fantasme [fantasy]) 扮演著這樣的角色。正如引文所述,一旦我們和大寫他者建立起關係後,大寫他者就開始透過幻見來供應我們欲求的對象,告訴我們要追索的事物。我們可以說,不同場域(作為廣義規範的不同實例)正是大寫他者的不同成分。此處的幻見以及幻見所帶出的慾望可以是什麼?譬如說接軌國際的幻象。

螢幕這樣的比喻訴說的是,幻見給出的是一種濾鏡般、電影故事般的效益。更直接的說法是,幻見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將各種客觀存在但不必然相關更不必然帶有意義的元素,揉合成一段有首有尾甚至首尾相連的故事。最好的例子,正是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的冰島火山論述,那便是藉由有機地拼凑客觀現實中發生的不同現象,來為一種特定的世界主義帶來顯著性。這樣的拼湊,便也產出了一則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意識到世界之休戚與共性的寓言故事,而這正是幻見教導我們慾望的方式。我們也發現到,幻見正是幻象概念更完整的詮釋,幻見提供了主體對場域投入的完整來龍去脈,因此理解幻見正是穿越幻象的重要關鍵。

就像主體存在著閹割後的空洞,渴望藉由愛、藉由慾望來填補一般,大寫

他者其實和主體一樣地匱乏 (ibid)。事實上,幻見正是一種大寫他者虛掩自身無力之處的機制,是大寫他者將自身匱乏轉嫁到主體身上藉以逃逸的手法。與我們在此的目標相同,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提出了一套相當實用的格言指出,看穿這樣的手法正是穿越幻見並抵達意識形態批判彼端的關鍵:「幻見是意識形態為自身潛在失靈打預防針的方式。」(Žižek, 2008, p. 142)

回到接軌國際的幻象/幻見,不正是因為主體認為反身的世界主義之缺乏,是為正義、和平、公理失落的理由,而忽視了接軌國際背後藏有的內在問題——無論是秉性分配本身,或是秉性萌芽可能性的雙重不均等?我們會發現,或許「脫亞入歐」的說辭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但正因為這被理解為不可避免的(東西方關係之歷史超驗),於是場域中人依然認為當務之急是追求國際觀;我們也會發現,正因為某些事物可以當作內在必然性,所以世界主義的學者可以指出:「在一個後殖民的世界中並沒有純粹、前殖民的國度能夠復歸」(Beck, 2003, p. 27),唯一重要的是走向超越一切的世界主義世界。我們還會發現到,同樣的例子其實也是馬克思的例子:

馬克思的一大成就正是去證陳,所有那些會被布爾喬亞主體視為社會「正常」運作就會發生的小差池、意外甚至結構崩壞等等現象(也因此都是可以透過體制改革去導正的),其實都是體制的必然產物。(Žižek, 2008, p. 144)

可以說,幻見的效果不僅是把隨機性的事物視作內在必然性,也是不斷地把**內 在必然性給外部化**,並強加在主體身上。

(四)精神分析的結束:提出批判性指引

文化正是最能成就誤認的場所 (Bourdieu, 1979/1984, p.86)

拉岡所提的精神分析倫理準則(「毋縱容人的慾望」),實與精神分析實

作的終結時刻,所謂「穿越幻見」不謀而合:我們所不應「縱容」的 慾望,不單只是幻見所支撐起的慾望,更是幻見之外造就幻見的大寫 他者慾望。「毋縱容慾望」因此便意味著根本地克制自己,不再被幻見 場景為慾望形塑出的富裕多變特質給迷惑。(Žižek, 2008, p. 132)

我思,故我不在;故我在我不思之處。(Lacan, 1966/1977, p. 166)

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我們在實踐時總是以客觀社會環境中形塑出的幻見來觀看,這也使得我們總是忽略隨機性中的隱藏訊息,不斷按照幻見的指示去創造自己的慾望。世界主義場域的象徵性便是在維持場域中人這樣的一種誤認,將所以的個體差異都視為隨機事件,而非值得質疑的不平等狀況。

我們要做的,正是去體會大寫他者之與我們同樣匱乏。這樣一篇冗長的研究,或許最大的目的正是努力地去削弱大寫他者的陽姓力量,並意識到我們自身的徵候(貸款赴外交換)不過是大寫他者虛掩措施下的產物。

就像一段精神分析的療程一樣,這樣的旅程將終結在我們終於能夠明辨並 承認自身徵候,意識到我們不必然得要歇斯底里地重複這麼做。也就是說,單 純地認知到行為從何而來必不夠,我們必須要達成的目標是,認知到大寫他者 為我們帶來的慾望,並不能為我們帶來滿足甚至是解決我們自身的任何問題。

這樣的目標,在實務上應該怎麼達成?引文中拉岡改寫我思主體,透過對笛卡爾主體的參照,拉岡想要指出的恰好與布赫迪厄的實踐理論相同,亦即實踐往往不是主體深思熟慮的作為,作為所思的主體與作為能思的主體往往是身首異處的,我們往往只能回顧性地看待已經發生的實踐。也就是說,我們所要達成的不是一種不存在的理性思考,或一種不存在的前意識形態位置。而是藉由反思我們已經做出的一切,來為自己帶來一次自我催眠。

實際上,這或許可以像是對大寫他者進行一次韌體更新。精神分析同樣不是一門樂觀的學說,但它同樣要求據實以告。我們或許永遠無法避免象徵閹割的發生,也因此無法避免受到大寫他者的掌控(畢竟正如精神分析所說的,象

徵閹割是取得語言能力,成為能夠反思之主體的關鍵 [Bailly, 2009)])。但我們可以主動地介入大寫他者的狀態,我們可以主動地介入場域的鬥爭,試著搗毀世界主義場域中既有階序的現狀。

也就是說,我們母須急於數落現有幻象的不是,相反地,我們會生產出有別於現有的、根植於客觀限制的世界主義論述,並藉由有意義地參與進場域鬥爭,來讓具基進意義的論述(佔位)得勢——這樣的論述舉例來說可以是解除康德真人信仰設下的門檻,讓草根群眾也能不設限地進行跨國交流,亦即一種國際主義的實現——試圖改變場域中的特殊資本定義。這樣一種將想法傳遞出去的努力,這樣一種改變大寫他者內涵的嘗試,毋寧正是一種自我催眠:不是說服自己或對自己進行嚴苛的道德勒索,而是改變能夠說服自己的外在他者。

對這個過程機制的「揭露」或者「解蔽」(revealing or uncovering),並不是讓行動者陷入虛無,而是讓人看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以自己的方式獲得「解放」(liberation)。(張恩源,2016,段8)

而這也正是一種穿越幻見的方式。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其中一個最大的限制在於,關於貸款赴外交換學生這樣的群體,我們無法取得母體的資訊。有鑒於申請貸款的資料有其私密性,自難以向金融機構或各單位申請資料。況且,在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到貸款的方式其實百百種,除非預設立場、預先設定某一種貸款方式,不然理論上也無法窮盡,便也無法鎖定資料來源。

也因為這個原因,本研究在受訪者的搜集上,難以照原先預想的滾雪球方式進行。這主要是因為選擇貸款來支應開銷,不像參加交換學生計畫一樣,是在公開的場合進行公開的申請,且貸款者亦只佔出國交換者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們可以想像,大多貸款者都是依照自己的需求自行申請(這同樣在貸款方式的多樣性上得到映證)——除非兩個貸款者在恰好的機緣下,恰好向彼此吐露自己的經濟來源,否則難以想像雪球將如何滾動。

當然,這一方面讓抽樣更具隨機性,較能避免受訪者之間存在未預料到的相同中介變項。然而,這也令受訪者的招募上較為困難,令受訪者的數量受到局限。然則,我們依然認為以一個紮根理論的觀點來說,目前的受訪者數量已足夠達成理論飽和。

儘管如此,雖然並沒有在抽樣上預設立場,但選出的受訪者依然以國立大學生為主,也甚少出身偏鄉的學子。或許可以直觀地認為,這與這樣一種特殊的實踐存在正相關性。但在缺乏樣本母體資訊的狀況下,這樣的推論無法獲得驗證。

(二)研究展望

在方法論上,布赫迪厄亦曾自述其願景是「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整合(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前者或許更偏向經粹閱讀外顯的數據(這也是多數變因反應式的量化研究長相),而後者則是藉拆解、理解文本(無論是訪談資料或是各類媒介文本)內部意涵的一種詮釋典範閱讀(譬如敘事分析或符號學研究)。也因此,當我們提到「客觀化」時,那正是一種致力於藉外顯數據來奠基內部詮釋的理解;而當我們致力於這樣一種「客觀化」時,正是所謂藉高繞的方式來完成意識形態分析。

也因此,資料的完整性,不僅影響著抽樣的有效性、可信賴程度這些量化 面向——實際上,每一筆額外的資料,也都可以讓本研究更靠近客觀化,也都 是可以令詮釋更臻完美的基石。舉例來說,如果可以取得更多有關於辦理貸款 的資料,我們不僅可以對貸款這個決定的社會意義有更多客觀的理解,也可以 對比實踐中被實體化的客觀存在(譬如學生向銀行提出的貸款企劃書),與受訪 者自身自述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場域中任何位置的意義,都是透過不同位置的對比所產生的。如果我們能夠有更精確的數據,瞭解到本研究中的不同訪談者,座落在社會位置空間中的明確座標,我們便能夠更有依據地分析他們的每一句話,更有依據地去辨明每一句話生成的背景——譬如去理解「放任的教養」、「受限的經濟條件」、「出走的勇氣」這些說法,對比身處的社會群體來說,是多大程度上的「放任」、「受限」與「勇氣」。這部分,或許在往後可以參酌大型調查的數據(譬如《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來完善。

最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儘管布赫迪厄的不同概念深受質性研究青睞,但其多數研究實倚重量化方法參與。因為反對武斷建立因果關係,布赫迪厄對基於應變項、自變項的傳統量化分析方式頗有微詞 (Bourdieu, 1983),但透過諸如「多重對應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⁴⁸」等當時較不受主流重視的方法,他得以藉關係性思維描繪《區判》等作品中,不同社會現象間的複雜交互關係。按照經典的布赫迪厄研究方法,其實可以完成一項譬如《區判》這樣更大型的研究。對往後可能的大型研究來說,本研究可以是一個大型研究的小型分支或是前導研究,藉由一群具代表性的受訪者,來大致描繪出場域可能有的樣態。誠如 Igarashi 與 Saito (2014) 所建議的,對世界主義觀點的布赫迪厄式分析,值得從深入的質化分析開展,為往後的量化研究打好基礎。

_

⁴⁸ 由於其利於圖像化的特性,以及適用之程式語言的推出,多重對應分析在大數據時代漸受主 流學界重視。相關使用見譬如 劉正山,2016,〈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異的圖像:以多重對應分 析結合習慣領域視野進行的探索〉,《習慣領域期刊》,7(2): 27-5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Clayton, Rebekah (無日期)。〈為什麼要出國留學?〉。取自英莩留學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EF Academy Blog 網頁 https://www.ef.com.tw/blog/efacademyblog/ 為什麼要出國留學?
- 王志弘譯(2003)。〈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斷與文化的商品化〉。《城市與設計學報》,15、16:1-19。(原文 Harvey, D. [2002].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In Panitch, L and Leys, C. [Eds.], *A World of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NY: NYU Press.)
- 外交部(2012年9月15日)。〈外交部關心國人赴國外打工度假的安全,並盼國人瞭解打工度假措施的積極意義〉【公告】。台北市:外交部。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8742DCE7A2A28761&sms=4 91D0E5BF5F4BC36&s=88272FBDFF101A20
- 甘芝萁 (2015 年 11 月 2 日)。〈日客來台零成長 國人赴日破紀錄〉,《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28715
- 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原書 Bourdieu, P. [1992].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Paris, France: Éditions du Seuil.)
- 吳嘉苓(2012)。〈訪談法〉,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 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頁 33-60。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
- 李沅珈譯(2019)。《學術人》,台北:時報。(原書 Bourdieu, P.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France: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台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 過程中的 Yo-Yo 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7:105-152。
- 李猛、李康譯(2008)。《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台北:麥田。(原書

-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阮靖權(2015)。《「壯遊」的建構、挑戰與現實-以台灣赴澳打工旅遊青年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市。
- 周何、邱德修編(2015)。《五南國語活用辭典》(第3版)。臺北:五南。
- 林文瑛、王震武(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 學研究》,3:2-92。
- 林佳賢(2016 年 5 月 5 日)。〈交換學生男性女性偏好大不同? 3 張圖表帶你看台灣大學生交換出國選擇〉,《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8822。
- 林健生、彭煥群(2019 年 5 月 10 日)。〈大學生赴東南亞當交換生 大幅成長近 1 倍〉,《公視新聞網》。取自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31361。
-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原書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Oxford, UK: Blackwell.)
- 孫文彬(2020年4月16日)。〈個人化推薦如何每月吸睛15億次,先得撐過3 千次午夜爆量挑戰〉,《iThome》。取自

https://www.ithome.com.tw/people/136905

- 翁康容、謝雨生(2018)。〈台灣民眾轉至成人發展歷程之類型與變遷〉。《台灣 社會學》,36:111-166。
-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0)。《2019 台灣網路報告》。取自 https://report.twnic.tw/2019
- 張立蓁 (2016 年 3 月 28 日)。〈交換生在美國:先別一頭熱,文化交流沒有想 像中這麼容易〉,《換日線》。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6265
- 張君玟譯(2001)。《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原書 Bauman, Z.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張君玫(2006)。〈「世界」的翻譯興建構-中國西化論述中的幾種「世界主義」〉。《東吳社會學報》,20:59-108。
- 張恩源(2016)。〈為甚麼理論解釋不了生活?布迪厄告訴你的實踐、場域與慣習〉,《01哲學》。取自 https://www.hk01.com/哲學/59829
- 張慧慈(2014)。當打工變成體驗西方:台灣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的研究。國立 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教育部(2011)。《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台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2016)。《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台北市:教育部。
- 章凱閎(2020年9月17日)。〈國際教育2.0推中小學認證 教團提醒別淪表面化〉,《聯合報》。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866154
- 莊春暖(2013)。《臺灣的大學生出國研修一年的經驗及其影響之研究——以淡 江大學為例》。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亭羽(2015年11月5日)。〈20歲的我們,為什麼要出走?〉,《換日線》。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5734
- 陳建州、劉正(2004)。〈論多元入學方案之教育機會均等性〉。《教育研究集刊》,50(4):115-146。
- 陳麗安(2019)。《大專生參與交換學生計畫與就業能力關係之研究》。成功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 傅仰止(201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8 第七期第四次:全球與文化 組(D00170_2)〉。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 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 游琔如(2013年12月19日)。〈阿拉伯籍航空2月進入台灣 飛歐洲中轉杜拜2萬6 含稅〉,《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308567.htm

馮靖惠(2019年3月20日)。〈私中生出國留學最多〉,《聯合晚報》。取自

-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3708246
- 黄文定(2018)。〈論國際教育中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矛盾與出路〉。《教育研究集刊》,64(3):41-78。
- 廖育正(2019)。〈「幻化遊戲」與「懸置遊玩」: 論洪席耶對布爾迪厄的批評〉。《中外文學》,48(1):127-162。
- 劉若蘭、林大森(2012)。〈家中第一代大學生的就學經驗、學習成果與畢業流向:與非第一代相比〉。《教育實踐與研究》,25(2):97-130。
- 劉駿州(1994)。〈實證、批判、詮釋——三大方法典範之初探〉。《新聞學研究》,48:153-167。
- 賴曉黎(2013)。〈幻象與共謀:布赫迪厄論秩序的自我持存〉。《台灣社會學》, 26:1-36。
- 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97-140。
- 關郁庭(2020年3月4日)。〈「暫停申請新帳號」時隔一年半!PTT 站方終於公告:開放 NTU 信箱註冊〉,《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304/1659455.htm

- 魏家良、王煌忠(2019年10月26日)。〈韓國瑜喊「國外遊學1年做交換學生」 代辦業者:每人至少100萬〉,《蘋果日報》。取自
 -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1026/TUP47BPTM76A7PYUBJYSQH5
- 魏家良、唐鎮宇(2019年10月25日)。〈韓國瑜開支票!大學與研究生國外遊學1年「費用我想辦法」〉,《蘋果日報》。取自
 -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1025/VG42ONXFU24U64ZTNUVCFLGYHE
- 譚心莛(2014)。《旅行的意義:打工度假與自我認同的形塑》。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

英文部分

- Ang, I. (1982).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aumbach, N., Young, D. R. & Yue, G. (2016). Revisiting Postmodernism: 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 *Social Text* 34(2): 143–160.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Beck, U. (2000).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79-105.
- Beck, U. (2002).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17–44.
- Beck, U. (2003) 'Rooted Cosmopolitanism', In Beck, U., Sznaider, N., & Winter, R. (Eds.), Global America?: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Liverpool, UK: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Beck, U. (2006).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eck, U., & Lau, C. (2005).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4), 525 557.
- Blok, A. and Selchow, S. (2017). Risk Society. In B.S. Turner (Eds.),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 Börjesson, M. and Broady, D. (2016). "Elite Strategies in a Unified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ase of Sweden." *L'Année sociologique* 66(1): 115-146.
- Bourdieu, P. (1970/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R. Nice, Trans.).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Bourdieu, P. (1972/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79/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0/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1). Men and Machines. In K. Knorr-Cetina and A.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 (pp. 304-317). London, UK: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82/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Adamson and G. Raymond,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311-356.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Westport, CT: Greenwood.
- Bourdieu, P. (1992/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R. Nice, Trans.).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Bourdieu, P. (1997/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R. Nice,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and Lamaison, P. (1986). From Rules to Strategies: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 110-120.
- Bourdieu, P. and Eagleton, T. (1992). Doxa and common life. *New Left Review,* 191: 111–121
- Calhoun, C. (2008).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social imaginary. *Daedalus*, *137*(3), 105-114.

- Calhoun, C. (2010). Beck, 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597-619.
- Chaney, E. (1982). Richard Lasse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and Tour:

 Catholic cosmopolitans and royalists in exile, 1630-166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UK.
- Chang, K-S. (2010).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444-464.
- Cheng, Y. (2018) Educated non-elites' pathways to cosmopolitanism: the case of private degree students in Singapore.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9(2): 151-170.
- Delanty, G. (2012). Introduction. In G. Delanty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smopolitanism Studies* (pp. 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ingwall, R. (1999). "Risk Society": The Cult of Theory and the Millennium?.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3: 474-491.
- Feldstein, R., Fink, B., & Jaanus, M. (1995).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Heath, S. (2007). Widening the gap: Pre-university gap years and the 'economy of exper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8(1): 89-103.
- Igarashi, H. and Saito, H. (2014). Cosmopolitanism as Cultur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Sociology*, 8(3): 222–239.
- Ignatow, G. and Robinson, L. (2017). Pierre Bourdieu: theorizing the digital.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7): 950-966.
- James, P. (2006). *Globalism, nationalism, tribalism: Bringing theory back in*.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Jarvis, D. S. L. (2008). Ulrich Beck,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risk society: A critical exegetic analysis.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 LKYSPP08-003.
- Kim, J. (2011). Aspiration for global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stratified realm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Why do Korean students go to US graduate school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2(1): 109-126.
- Lacan, J. (1966/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U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Lassels, R. (2016). An Italian Voyage, or, a complete journey through Italy in two parts: With the Characte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ief Towns, Churches, Monasteries, Tombs, Libraries, Pallaces, Villa's, Gardens, Pictures, Statues and Antiquities. Norderstedt, Germany: Hansebooks.
- Lindell, J. and Danielsson, M. (2017). Moulding Cultural Capital into Cosmopolitan Capital. *Nordicom Review*, 38(2): 51.
- Lopes, P. (2000). Pierre Bourdieu's Field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Modern Jazz. In N. Brown; I. Lanham (Eds.), *Pierre Bourdieu: Fieldwork in Culture* (pp. 165-185). Lanham, M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Radway, J. (1991).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aito, H. (2011). An actor-network-theory of cosmopolitanism. *Sociological Theory* 29(2): 124–149.
- Szerszynski, B. and Urry, J. (2006). Visuality, mobil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Inhabiting the world from afa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7(1): 113–131.

- Threadgold, S. (2018). Bourdieu is not a determinist: Illusio, aspiration, reflexivity and affect. In C. Burke, G. Stahi, S. Threadgold, and D. Wallance.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orizing Aspirations:*
- Weenink, D. (2007). Cosmopolitan and Established Resources of Power in the Education Are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2(4): 492-516.

Applying Bourdieu's Tools (pp. 36-50). London, UK: Bloomsbury.

- Weenink, D. (2008). Cosmopolitanism as a form of capital: Parents preparing their children for a globalized world. *Sociology*, 42(6): 1089-1106.
- Weiss, A. (2005).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Conceptualizing Social Positions on a World Scale. *Current Sociology*, 53(4): 707-728.
- Witz, A. (2004). Anamnesis and Amnesis in Bourdieu's Work: The Case for a Feminist Anamnesis. *Sociological Review* 52: 211–223.

Zarional Chengchi Univer

Žižek, S. (2008).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UK: Verso.

附錄 訪談大綱設計

- (一)初步認識:各項資本的基本探知
 - 1. 自我介紹
 - 2. 個人與家庭狀況 (應包含父母職業、自身及家庭經濟狀況)
 - 3. 交換當時就學狀況及目前就學/業狀況
- (二)廣泛的國際觀觀點:世界主義觀點的定位
 - 1. 在你看來,什麼是國際觀?它和你的關係又是什麼?
 - 2. 就你所身處的社會來看,國際觀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它普及嗎?
 - 3. 在你看來,世界上其他地區以及那些地方的居民和我們的關係是? 如果可能的話,進一步詢問受訪者是否能詳述對於我國國際政策的看法,諸如現行政策對外 來者友善程度、是否有改善空間等;並選採重大國際新聞,瞭解受訪者國際觀的具體立場
 - 3. 在你看來,什麼是獲得國際觀的不二法門?
 - 4. 整體來說,你認為國際觀是你擁有的特質嗎?
- (三)過往經歷:對社會軌跡的聚焦
- で ngchi 制、學校 1. 過往求學歷程:歷來就讀學制、學校
 - 2. 課外活動發展: 曾參與的校內外社團、校內外實習, 才藝與興趣自述
 - 3. 家庭關係影響:家庭關係、長輩期許等自述。
- 4. 文化消費習慣:長期關注的國內外文化作品(舉凡各種電影、戲劇、音 樂、書籍等)
 - 5. 媒體使用習慣:經常性使用的資訊獲取管道及關注內容
- 6. 自己或家人是否有長期保持聯繫,旅居或出身國外的朋友(一年起碼有 一次無論是否當面的聯繫)

(四)交換經歷:佔位的作為

出發前

- 1. 外語能力自評
- 2. 前往國家別/地區、停留時間以及選擇的理由
- 3. 身邊師長、同儕與家人等如何看待這項決定?
- 4. 下決定前搜集了哪些資訊?如何獲取?是否能夠按時間序描繪過程?
- 5. 在你看來,選擇交換最大的理由為何?
- 6. 實際決定前曾遭遇的阻礙?
- 7. 經濟上的支出對這項決定有什麼影響嗎?
- 7. 如果沒有參與交換計畫,原本在兩年內是否有出國打算?

行程中

- 1. 出發前搜集了哪些資訊?
- 2. 簡述籌措經費的過程(是否能夠按時間序描繪過程?)
- 3. 學習狀況自述(包括選課的方針、實際課堂學習成效)
- 4. 課外生活狀況(舉凡旅遊、應酬等各項非課堂活動)
- 5. 簡單介紹當時密切往來的對象
- 6. 當時曾遭遇最大的困難或危機,以及針對這樣困難或危機作出的應對
- 7. 開支狀況自述
- 8. 拾遺:是否有什麼其它值得一提的趣事,或銘記在心的特殊遭遇

(五)整體反思:主觀與客觀的差異

- 1. 在你看來,這次經驗是否影響了往後的人生規劃?
- 2. 在你看來,三項你認為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 3. 在你看來,這次經驗是否對個人不管外表或內在造成了改變?